

民間宗教与結社

主編 刘心武

副主編

张仲 张春生

王玉樹 张凤珠

(京)新登字 173 号

民间宗教与结社

濮文起 著

*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5 印张 100 千字

1994 年 4 月第 1 版 199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0000 册

ISBN 7-80105-068-8/G·479 定价：4.80 元

总 序

DH89 / 3313

闲来无事，翻翻书总是好的。

如今市面上书可真多！我们这套，也来凑凑热闹。

这套书怎么样？作为主编，卖瓜夸瓜，想来读者朋友们也不会见怪。不过，我不想夸得离谱，只打算一是一、二是二地说说。

先说我为什么来主编这套书。有读者问：你这个刘心武，是不是就是写《班主任》的那个刘心武？还有《钟鼓楼》、《公共汽车咏叹调》、《风过耳》什么的——你不是写小说的吗？怎么又主编上这么一套书了？挂名儿的吧？

在下就是那个小说家刘心武，编这套书并非挂名。

我自己写书，也读别人写的书。在读书上，我大概是一个最普通的最有代表性的读者：过分专业化的、正儿八经的书，带着明确的目的读——不多，也不必多；完全没意义的、

仅仅供消遣消闲解闷驱乏的书，偶尔也翻翻，但翻完常常后悔——瞎耽误工夫！比较喜欢的、读得多的，是既有趣味性又有知识性的书，最好那趣味挺浓酽却又不庸俗，那知识能深入浅出而且可靠，篇幅也别太大，看完了，高兴的时候还能跟家人朋友侃侃，那书买了，看完也还有保留的价值。

恰可好一拨文化界的朋友，写了这么一套书，他们推我当主编，我把书稿一看，满心欢喜，因为这些书就属于读起来既轻松，读完又能长真见识的那一类。每本书的作者，要么他本行就是研究那号问题的——是学有专长、有高级职称的民俗学家、社会学家，要么他就是潜心琢磨那学问的能人；他们写出的书，也许有的更精彩一些，也许有的选题更热门一些，如一个树林，每棵树的粗细姿态容有差异，但我保证绝无伪劣假劣之作，绝非从报刊和别人现成的书上用笔一抄用剪刀浆糊一较一贴的、“萝卜快了不洗泥”的制作（坦率地说，这类的书市面上不少），所以我不仅欣然应主编之命，也坦然向读者们推荐这套丛书。

这首先是一套关于中华文化的书。宽泛的文化概念，应包括人类社会所创造的全部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以及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生活方式及思维方式；中华文化不仅存在于中国大陆，存在于中国的台湾和香港，也存在于新加坡那样的国家，存在于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华人社区，因此这是一个大题目。我们将大题小作——选取了一个从社会风情切入的角度，这是一个十分有趣的角度，纵览我们第一辑和第二辑的这十二本书的题目，相信读者可以洞见我们的苦心，我们不是因小见小，而是力图因小见大，也就是说，我们希望内行能见门道，外行也不仅仅是看热闹。此外，这套丛

书并不满足于罗列例子，或简单地撒一点理论的胡椒面，每一册篇幅虽不大，却都构成一个自我完满的潜在的理论系统。非专业性的读者不必去理会那理论系统，但那潜在的理论系统却有一种探秘的意味，这探秘的乐趣，我想读者一定乐于同作者编者同享。

掏钱买本书，不容易；我只盼买了我们这套书里无论哪本书的读者，至少能理解我们用心的良善，当然，我们更期待着读者朋友们的批评指正。

也许，在读者朋友们的呵护下，我们还可以推出第三辑、第四辑……是啊，煌煌中华，灿烂文化，斑斓风情，无尽内涵，携手探秘，其乐无穷，何不继续合作？

我们相约，在有一搭没一搭之间，在紧张生活的某些闲散间隙里——您说：好！……是吗？

谢谢。

刘 心 武

1994年1月

于北京绿叶居

目 录

引 言	1
上篇 民间宗教	
1 从太平道、天师道到白莲教	7
(一) 民间宗教的鼻祖太平道与天师道	7
(二) 千年太融合，定型白莲教	10
2 白莲花开遍神州	19
(一) 名目繁多的白莲教支派	19
(二) 白莲教主要支派	23
3 一个寻求“现世解救”理论的形成与 神化	47
(一) 教义	47
(二) 仪式	51

(三) 经卷	53
4 白莲教与农民战争	57
(一) “弥勒佛当有天下”	57
(二) “佛母”与“中兴福烈帝”	60
(三) “清朝已尽”，“日月复来”	63
(四) “上帝教”、“义和拳”、 “红枪会”	68

下篇 民间结社

5 从漕运水手的互助组织到无恶不作的 社会黑帮	75
(一) 青帮源流	75
(二) 青帮的“开香堂”、“法规”、“切口”、 “问答”、“通漕”	80
(三) 民国时代的“青帮世界”	95
(四) 上海青帮大亨	98
(五) 混混儿、脚行、青帮三位一体的 天津青帮	113
(六) 保持原始风格的南京青帮 及其蜕变	125
6 反清斗士，革命先锋	130
(一) 洪门源流	130
(二) 洪门的“开山”、“规律”、“切口”、	

“海底”	138
(三) 洪门在辛亥革命时期的辉煌 业绩	147
(四) 洪门的墮落	151
(五) 海外洪门	154
结束语.....	159

引 言

似乎人们已形成了一种文化心理定势，一谈中国传统文化，就讲儒释道。其实，这是人们审视中国传统文化时的一种“视角偏移”，或者说是人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片面认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除了儒释道——文化人类学家所说的“上位层次文化”——官僚士大夫文化之外，还有一种对中国历史产生过巨大影响的传统文化，这就是被文化人类学家称之为“下位层次文化”的民间宗教与结社。

民间宗教亦称民间秘密宗教，又称教门或道门，它是作为正规的、公开的宗教——如佛教、道教——的异端，为部分下层民众所信奉，在民间流传的各种宗教。与佛教、道教一样，它也有最高崇拜，也有一般神灵，也有自成体系的教义、仪节、日课、修持和戒律，也有经卷、佛堂、祖师、传道师和信徒。和平时期，它与佛教、道教起着同样的作用，能给人以精神寄托和心灵慰藉；动乱年代，它则与佛教、道教相悖，能立即与斗争思想相结合，成为召唤农民起义的号角。

民间结社亦称民间秘密结社，又称帮会或会党，它是破产农民和城市下层人民秘密组织的经济互助与政治斗争的团体。它虽然也有历代祖师的谱系，也有入帮仪式、一般礼节、帮规、暗号之类的规定，也有“海底”、“通草”之类的帮内秘籍，但它的平日活动并没有什么宗教性质。它主要是以师徒关系（如青帮）和聚义结拜（如洪门）为纽

带，团结和组织群众，平时进行经济互助，战时领导反抗斗争。

作为一种传统文化，民间宗教与结社虽与儒、释、道，即官僚士大夫文化同样根植于封建社会土壤，但这种传统文化从其诞生之日始，就以封建统治阶级思想文化的异端和叛逆的姿态出现，它所反映的是下层民众的人生理想与现实要求，因此受到了占社会人口大多数的乡村农民与城市下层人民的欢迎，成为广大劳动人民抒发宗教情感与反抗苦难现实的思想源泉。从东汉末年的黄巾起义，到明清以来的农民战争，乃至推翻清王朝的辛亥革命，这种传统文化始终以其顽强的生命力，毫不畏惧历代封建统治者的严厉查禁与血腥镇压，勇敢地担负着吸引、凝聚、指导下层民众向理想王国不断冲锋的作用，其对中国社会及思想意识形态的影响较之儒、释、道有过之而无不及。

由于这种传统文化根植于封建社会土壤，它所反映的是社会下层民众的思想和利益，因此它除了具有上述的人民性、斗争性之外，还有农民阶级及小手工业者固有的闭塞、狭隘、愚昧及目光短浅的落后性一面。特别是进入近代以后，随着社会性质的改变，这种传统文化的落后性表现得愈来愈明显，乃至恶性膨胀，迅速走上自己的反面。对此，海峡两岸都曾进行过批判或清理。

然而，长期以来人们对这种传统文化及其在历史与现实方面的作用和影响，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究其原因，主要是人们认为它们是社会下层的東西，不像儒、释、道那样思辨、理智、严肃、高雅，登不上壮严的殿堂，致使很少有人问津，加上“正史”一般不予记载，更被视为

“非正统”的“角落文化”，即或偶有涉及，也语焉不详。其结果不但使人们对其在历史上的作用认识不足，不能作出符合实际的评价，而且对其在当代中国的种种表现也看法不一，缺乏切实可行的对策。

基于此，笔者试图从历史的角度，向人们揭示这种传统文化的产生、发展及其蜕变过程，以引起人们的关注，并去探索这种传统文化为何会在当代中国仍产生着这样或那样的影响。







1

从太平道、天师道到白莲教

(一) 民间宗教的鼻祖太平道与天师道

“安知万里水，始于滥觞时。”从目前掌握的史料来分析，产生于东汉后期的太平道与天师道，可以说是民间宗教的鼻祖。因为太平道与天师道不仅基本上具备了一般宗教的内涵与职能，而且更重要的是从它们诞生伊始，就具有了被封建统治阶级视为宗教异端，只能在民间传播，进而策动农民起义的特性。

“有苦难的地方，就有宗教。”东汉后期，政治昏暗，经济凋敝。朝廷上是宦官与外戚尔虞我诈、轮番乱政；地方上是豪强地主与割据侯门为非作歹，残酷压榨农民。又逢连年灾荒，人祸再加上天灾，使“万民饥流”，饿殍遍野。在这种人民备受痛苦，精神上无所寄托的时代，张角与张陵依据风靡当时的原始道教，分别创立了反映人民人生理想与现世要求的太平道与天师道。

张角，河北钜鹿（今河北平乡西南）人。他创立的太

平道，以黄天为至上神，认为黄神开辟天地，创造出人类。又信奉黄帝与老子，认为黄帝时的天下是太平世界，是人类社会最美好的时期。在这个太平世界里，没有剥削压迫，没有饥寒病灾，没有诈骗偷盗，人人自由幸福。

张角创道后，自称大贤良师，手持九节杖，深入民间，一面为民治病，一面秘密布道。他还派遣八名弟子深入各地，按照他的方法进行布道活动达十余年。张角及其弟子的足迹踏遍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州（相当今天的辽宁、河北、山西、山东、河南、江苏、安徽、湖北、江西、浙江等省份）。张角及其弟子的高明医术，为民众解除了身体病痛，他们传播的太平世界，又使民众找到了精神寄托。因此，太平道很快受到了生活在苦难深渊中的劳苦大众的信任与欢迎。人们奔走相告，纷纷加入太平道，短短十年间，信徒达数十万。

为了便于统领，张角根据太平道中黄神分天下为三十六方的宗教神话，也把数十万徒众分为三十六方。大方万余人，小方六七千人，每方设立“渠帅”（首领），建立起一套整齐划一的宗教组织系统。

张角创立太平道的目标十分明确，那就是要借着宗教的旗帜，争取民心，组织群众，推翻腐败的东汉王朝。因此，当太平道组织发展壮大时，为实现太平世界的理想而率众起义只是时机问题了。

东汉中平元年（184年），张角认为起义时机已到，为此，他提出“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的战斗口号。“苍天”指东汉王朝的黑暗统治，“黄天”指农民的太平世界，“岁在甲子”则为起义的信号与时

间。不料在紧急关头，张角弟子唐周叛变告密，泄露了起义计划。张角在钜鹿得知后，当机立断，星夜派人驰马飞报各方提前起义。张角称天公将军，其弟张宝称地公将军，张梁称人公将军，起义农民以黄巾裹头作标志，称作“黄巾军”。于是“八州并发，烟炎绛天”，东师震动。黄巾起义经过近十个月的浴血奋战，终因缺乏战斗经验而遭到失败。但这次起义从根本上动摇了东汉王朝的黑暗统治，同时也显示了民间宗教从其诞生伊始就奋起反抗封建统治的战斗精神。

由太平道策动的黄巾起义在东部英勇战斗的同时，天师道也组织信徒在西部地区揭竿起义。

天师道为张陵于东汉顺帝时所创。天师道崇拜老子，假托老子传道。因尊教主为天师，故称天师道。又因入道者须交五斗米，亦称五斗米道。东汉汉安元年（142年），张陵开始在巴蜀一带行医传道，以宗教为外衣，联系群众，筹备组织。张陵死后，传给儿子张衡。张衡死，其子张鲁再传衣钵。东汉初平二年（191年），张鲁乘黄巾军余部在东部地区与豪强地主武装鏖战之机，带领徒众攻取汉中，不久在汉中建立了天师道政权，自号“师君”。

天师道政权可以说是政教合一的农民政权。在整个辖区内，“不设长吏”，只设“祭酒”管理行政、军事、宗教等项事务。“祭酒”虽为首领，但在教内与道徒的关系是平等的，没有贵贱之别。道徒之间都要互爱互助，诚信不欺诈。生病则“自首其过”。对犯法之人，先进行教育，不随便用刑，“三原然后乃行刑”，比孔子的“不二过”还要宽容。各祭酒还在大路上建“义舍”，教人们不要蓄私财，多

余米肉交“义舍”，以供过路之人食用。不过只能“量腹取足”，不许多吃多占。因此，“民夷便乐之”，深受当地各族人民的欢迎。在当时天下大乱、民不聊生的形势下，天师道据险自治，在政治、思想、经济等方面实践着农民阶级渴望的理想王国，这在人类发展史上不能不说是一个进步的尝试。

但是，封建统治者是决不允许农民阶级有这么一块乐土存在的。汉献帝建安二十年（215年），曹操在镇压了黄巾军余部之后，亲率大军进攻汉中。张鲁于阳平关防线被破后，接受了曹操的招安。存在了二十多年的天师道政权从此也就改变了性质，成为封建割据势力。尽管如此，天师道并没有消亡，而是以五斗米道的形式继续在民间流传。

（二） 千年大融合，定型白莲教

滥觞于太平道、天师道的民间宗教，到了魏晋时期，主要是以五斗米道的形式进行传播。与太平道遭到封建统治者残酷镇压不同，天师道由于张鲁的降曹，其传人及其徒众并没有受到多大损害。因而得以保存实力，并以另一名称——五斗米道继续在民间从事活动。黄巾起义失败后，许多太平道传人也加入了五斗米道，这就使五斗米道的力量更加充实，活动更加频繁，并扩张了民间宗教在社会动乱时期组织和策动农民起义的特性。其中东晋末年的孙恩、卢循起义，就是五斗米道组织和策动的著名农民革命。

孙恩，琅琊人，本为士族，世奉五斗米道。其叔父孙泰为五斗米道首，见天下大乱，想借五斗米道的力量发动

起义。但事发被诛，孙恩率其徒众逃到海上。安帝隆安三年（399年）十月，孙恩利用司马元显征发“乐属”引起八郡骚动之机，率百余人渡海登陆，攻破上虞、会稽，自号征东将军，称其徒众为“长生人”，得到东南八郡人民的支持，“旬日之中，众数十万。”元兴元年（402年），孙恩战败投海。其妹夫卢循继续战斗，曾转战浙江、福建、广东、广西等地，坚持了近十年。义熙七年（411年），卢循在交州战败，也投水而死。孙恩、卢循起义虽也以失败告终，但这次起义有力地打击了东晋王朝的世家豪族，再一次显示了民间宗教组织和策动农民起义的能力。

孙恩、卢循起义失败后，民间宗教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即开始从佛教的某些宗派及其他外来宗派与儒道文化中吸取养料，不断充实、改造和完善自己，使自己逐渐成熟起来，以便在民间更加广泛地传播，充当广大农民寄托理想和反抗封建统治的思想武器。

大约就在太平道、天师道出现的同时，佛教也自印度传入中国。但是，由于佛教的宗教哲学思想深邃奥秘，经卷浩瀚难解，仪节繁缛靡费，所以除了那些有钱有闲且又文化较高的官僚士大夫之外，一般人民群众是不易接受的，就连文化较低的上层贵族也不胜其烦。针对此种情况，某些佛教僧人开始寻找学佛的“方便法门”，于是一些能为广大群众接受的简单易行的佛教宗派便应运而生或由印度引进。

东晋时期的高僧慧远可以说是开辟学佛“方便法门”的第一人。他在庐山东林寺召集部分信徒组成白莲社，倡导“弥陀净土法门”，教人只念一些简单的经咒、佛号，即能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他还著有《沙门不敬王者论》、《法性说》等著作，对当时及后世影响极大。

白莲社之后，南朝齐梁间，佛教的“弥勒下生”说开始演化为一条通俗化、现实化的教义，即佛灭后，世界即陷入苦境，一切恶趣，次第显现。至五十六亿七千万岁之后，弥勒佛将自兜率宫降世，在龙华树下绍继佛位，那时世界将变为天堂，广博严净，丰乐安稳，只有享乐，没有痛苦。梁武帝大通元年（527年），佛徒傅翕（傅大士）利用这一教义创立了弥勒教，宣称他就是从兜率宫来的弥勒佛，自号“当来解脱善慧大士”，到世界挽劫救难，济渡群生。这一说教很重要，凡是弥勒出世，就是佛祖更替，改天换地的时代，其中就隐喻了造反的含义。因此，这一说教一经出现，即被正在发展中的民间宗教所吸收。一千四百多年来在民间宗教中奉行不替，绝大多数创教祖师或其接续传灯之人都自称弥勒佛化身。

在上述佛教宗派的影响下，唐初僧人善导创立了净土宗。净土宗在教义和仪式上都十分简单，宣称在现世相信阿弥陀佛的灵力，反复诵念“南无（致敬、皈依）阿弥陀佛”，死后灵魂就可被阿弥陀佛接引，进入西方“净土”——极乐世界。南宋僧人茅子元又从净土宗发展为另一宗派白莲宗。茅子元与善导都尊慧远为初祖，自认是白莲社的传人。茅子元仿照净土宗制定了专念佛号、受持五戒、不茹荤酒等便捷的修持法则。其信徒不必出家祝发，可家居天宅，娶妻生子，与平民无异，并可男女共同修持。为此，他还在吴郡滨山湖组成了一个念佛的结社——白莲忏堂。此外，唐中叶形成的禅宗（南禅），其成佛了道，不必坐禅，

不必苦行，也不必念佛念经，只要“主观觉悟”即“顿悟”的简便易行的教义，也给正在发展中的民间宗教以深刻的影响。这可从明清以来民间宗教中的许多教派，均供奉禅宗初祖菩提达摩得到证明。

与此同时，印度后起的佛教宗派大乘教也于东晋时传入中国。大乘教强调一切众生皆可成佛，一切修行应以自利利他并重，排斥自利自度、自我解脱的佛教原本教义。隋代，僧人信行创立了一个佛教宗派，名叫三阶教。三阶教声称佛灭后一千年，所有得道众生都是有根基的，属于第一阶、第二阶；一千年后为第三阶，或称末法时，一切众生，包括没有根基的甚至恶人都要得道。他宣传隋代即已到末法时，不应再以念一佛、诵一经为是，而应普归一切佛，普修一切法，所以三阶教又名普法宗。

白莲社、弥勒教、净土宗、白莲宗、南禅宗、大乘教、三阶教等这些佛教宗派简便易行的教义都能符合广大农民的心理和要求，因而受到广大下层民众的欢迎。在其传播的过程中，有的就与固有的民间宗教如五斗米道融合在一起，有的本身先起了质变，即也具有了民间宗教的性质，最后还是与固有的民间宗教相融合，这主要表现在他们也会纠众起义。有关这类事实史不绝书。如北魏延昌四年（515年），冀州（今河北冀县）僧人法庆利用大乘教策动农民起义，有五万多人参加，北魏统治者出动十万大军才把这次起义镇压下去。又如隋大业六年（610年），正月元旦，弥勒教信徒依托弥勒造反作乱。《隋书·炀帝纪》载：

有盗数十人，皆素冠练衣，焚香持花，自称

弥勒佛，入自建国门，监门者皆稽首。既而夺卫士杖，将为乱，齐王暕遇而斩之。于是都下大索，与相连坐者千余家。

当时隋炀帝横征暴敛，荒淫无道，致使民不聊生，人心思变。此时弥勒教已在民间广为流传，几个人自称弥勒进入皇宫想杀隋炀帝，代表了广大民众的愿望。大业九年（613年），又有弥勒教徒想杀掉隋炀帝。《隋书·五行志》载：

唐县人宋子贤善为幻术，每夜楼上有光明，能变化作佛形，自称弥勒出……远近惑信，日数百千人，遂潜谋作乱，将为无遮佛会，因举兵欲袭击乘舆。事泄，鹰扬郎将以兵捕之。

其后复有桑门向海明，于扶风自称弥勒佛出世……因举兵反，众数万，官军击破之。

唐初社会承平，统治者为了维护其封建秩序，在意识形态领域不仅儒、释、道齐尊，而且还能容许外来宗教流传。武后延载元年（694年），武则天在长安召见了摩尼教传教士拂多诞，允许摩尼教作为合法宗教在中国公开传播，表现出一种开放、宽容的恢弘态度。

摩尼教是公元三世纪中叶波斯人摩尼所创。其教义是综合了火祆教、基督教、佛教以及诺斯替教派的一些教义和宗教哲学思想加以改造而成，其核心教义是“二宗三际”说。所谓“二宗”即明暗与善恶，谓善神清静而光明，

恶魔污浊而黑暗，人宜弃恶就善，弃暗趋明。所谓“三际”，即分宇宙的历史为过去、现在、未来三际。摩尼教认为只有“明使”（或称“明王”、“明尊”、“惠明”、“拂多诞”、“慕匿”）才能教化众生，脱离诸苦，拔救灵魂，不坠地狱。摩尼教鞭挞现存的社会制度，将其比作黑暗王国而加以否定，赞美充满一切美好东西的未来世界，将其比作光明王国并对此抱有必胜的信念，因此迎合了苦难农民的精神需要，曾风行于中世纪的亚洲、欧洲和北非。

中国从西晋到唐朝建立以前，社会一直动乱不安，军阀分裂割据，王朝不断更换，天灾人祸，生灵涂炭，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大约四世纪初，崇拜光明的摩尼教自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立即得到了生活在黑暗中的人民的欢迎，并在民间迅速传播。六世纪初唐朝建立以后，已在民间流传了二百余年的摩尼教，由于唐初统治者的承认和提倡，开始从秘密走向公开。在这期间，摩尼教不仅翻译和著作了许多经卷，而且建筑了一些寺院。武宗会昌三年（843年），摩尼教在公开传教长达一个半世纪之后，遭到了封建统治者的严厉禁断。从此，摩尼教一分为三：一部分攀附佛道教；一部分成为民间宗教在社会下层流传，其活动地区主要在西北、华北各地；一部分则转移到摩尼教势力雄厚的福建、浙江一带继续活动。

到了宋代，摩尼教在民间流传的基础上，已完全汉化并演变为明教。与本来较为复杂的唐代摩尼教相比，宋代明教已将其教义要旨汉化归纳为“清静、光明、大力、智慧”八个字。摩尼教的教义被提炼成八个字，广大农民自然很容易接受，清静、光明、大力、智慧的境界，对处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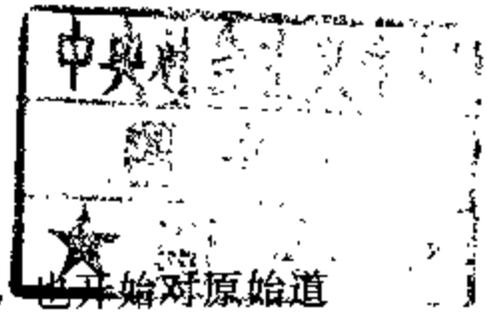
水深火热之中的农民来说，无疑会像佛教的西方极乐世界那样具有极大的吸引力。此外，摩尼教被封建统治者取缔后，只能在民间传播，为了迎合民间的需要，它更加发展其善良、俭朴、友爱的道德观念，进而成为民间的互助组织，因此受到贫苦大众的欢迎。

摩尼教既然成为民间宗教，它也就具有了民间宗教的性格，即在和平环境中，它是安善的宗教组织；在动乱年代，它也会聚众造反。五代后梁贞明六年（920年），摩尼教徒毋乙率众起义。《佛祖统纪》卷四十二载：

陈州末尼聚众反，立毋乙为天子，朝廷发兵擒毋乙，斩之。

摩尼教在宋代演变为汉化明教之后，更扩张了它策动农民起义的特性。宋代，特别是北宋末年和整个南宋时期，统治阶级腐败无能，内忧外患严重，广大农民挣扎在死亡线上。濒临死亡的农民既然要求反抗，明教就发挥了组织和策动农民起义的职能。北宋末年浙江地区方腊起义，南宋初年江西地区王念经起义等，都是靠明教组织起来的。尤其是方腊起义，对统治者震动极大。方腊以地区险峻的梓桐、邦源等峒为据点，建立农民政权，自称“圣公”，改元“永乐”。三四个月内，队伍发展近百万人，占有睦、婺、处、杭等六州五十二县，充分说明了明教组织和策动农民反抗封建统治者的战斗性格。

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是道教。自从东汉后期张角、张陵依据原始道教创立太平道、天师道之后，一大批官僚士



大夫出于对生存的需求和对死亡的忧虑，也开始对原始道教进行了全面改造和重建。大约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经过葛洪、陆修静、陶弘景等人的努力，一个以巫仪方术为基础，杂糅老庄道家思想、儒学礼制及佛教规戒，在教义、仪式、神谱、日课、戒规、经卷、道观建造规则及法器制造使用法度上均已定型的道教出现了。在成熟的道教理论中，其核心的东西并不是老庄道家那种精神的超越，也不是佛教通过苦行对彼岸世界的追求，而是为了满足人们在尘世中的心理欲望，乃至为了解决现实世界中的种种实际问题。因此，它不仅赢得了官僚士大夫乃至皇帝老子王公贵族的青睐，而且对广大农民也产生了强烈的魅力，自然而然地为正在发展中的与正规道教同出于原始道教母体的民间宗教提供了所需要的养料。

自西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儒家思想始终处于封建文化的领先地位，稳坐头把交椅。儒家所规定的忠义孝悌的伦理道德、谨慎敦厚的处世哲学、克勤克俭的持家之道、尊圣敬天的思想原则等等，经过统治阶级的极力导向，以世俗化的形式渗透到广大民众之中。从中唐以来出现的儒释道三教合一的历史趋势，至宋代形成高潮，因而带来了三教各自的更新，使三教中的神祀日益世俗化和民间化。不仅如此，许多民间信仰的杂神也一变昔日受人冷落的地位而被大加尊崇。这些都为民间宗教的成长准备了肥沃的土壤。而宋代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日益激化，以及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又为民间宗教的成熟提供了适宜的气候。

于是，发轫于太平道、天师道的民间宗教，先是撷取

佛教传入后兴起的白莲社、弥勒教、净土宗、南禅寺、大乘教、三阶教等宗派简便易行的教义，又与变为民间宗教的摩尼教合流，同时吸收儒家与道教中的养分，这个过程不少于一千年，到南宋时期终于融合为从内容到形式基本定型且又统一，并自我标榜为“三教归一”的民间宗教，它的名字就叫白莲教。

2

白莲花开遍神州

(一) 名目繁多的白莲教支派

白莲教刚一出世，就遭到正统佛教的激烈攻击，将它看作异端邪教，咒骂它是猥亵不良。南宋朝廷紧步后尘，立即制定法律，坚决取缔，就连僧人茅子元因借用白莲一名，也被问以妖妄惑众之罪，流放江州（江西九江）。因此，白莲教只能转入地下活动，在江南各地潜伏流传。

元朝建立以后，政治黑暗，社会混乱，民族压迫深重，人民苦不堪言，正是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白莲教得到了迅速发展。元朝统治者对白莲教的性质起初并不十分了解，一度在有力信徒的贿通下，仁宗于皇庆二年（1313年）下诏保护，允许白莲教公开传教，建立寺庙，并蠲免税粮。但不久便开始取缔，并多次残酷镇压。元末，随着社会阶级矛盾的日益尖锐，白莲教徒的异端思想和不轨活动，愈益明显和频繁。他们“烧香惑众”，倡言“弥勒佛当有天下”，终于酿成了由白莲教首先策动的元末农民大起义，推翻了

元朝的野蛮统治。

依靠白莲教起义发家的朱元璋，深知白莲教的厉害，因此当他做上大明皇帝之后，便采纳李善长的建议，颁布取缔白莲教的禁令：“为首者绞，为从者各杖一百，流三千里。”但是，白莲教的传播非但没有敛迹，反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盛况。就在朱元璋、朱棣当皇帝的明朝初期，湖北、江西、四川、陕西、山东等地，白莲教非常活跃，并多聚众烧香，宣传弥勒下凡而反。自明中叶始，由于王公贵族与官僚地主疯狂兼并土地，使广大农民沦为流民，构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此时的白莲教便在流民中进行活动，与流民相结合，宣传“弥勒佛空降，当主世界”，策动农民起义。嘉靖以后，白莲教的活动与势力更加频繁与壮大，一次又一次的白莲教起义，使明朝廷坐卧不宁。到了天启二年（1622年），更是爆发了一场规模巨大的白莲教起义——山东徐鸿儒领导的大起义。这次起义揭开了明末农民战争的序幕，对明朝统治者震动很大，被朝廷称之为“二百六十年来未有之大变”。

从明代开始，一方面由于白莲教本身的发展，一方面也为了躲避封建官府的追查，白莲教一般地不用“白莲”这个称谓，而是另立支派，另起名称，特别是成化以后，各种支派的产生如烂漫山花，万历、崇祯时更蔚为极盛。据清初白莲教著名经卷《古佛天真考证龙华宝经》中《天真收园品》所列教名计有：红阳、净空、无为、西大乘、黄天、龙天、南无、南阳、悟明、金山、顿悟、金禅、还源、大乘、圆顿、收源十六种。这些支派与白莲教同源异流；正如万历四十三年礼部请禁“邪教”奏文所说，它们“皆讳

白莲之名，实皆白莲教也”。这些支派在下层社会拥有广大的民众，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白莲结社，遍及四方。教主传头，所在成聚。倘有招呼之首，此其归附之人。”明代著名大臣吕坤于万历二十五年疏陈天下安危时发出的这段感叹，足以说明白莲教在民间的巨大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成化、正德年间，白莲教一些有力量的支派开始竞相攀援上层社会，有的支派甚至深入朝廷，在太后、嫔妃、公主、太监及其他权贵中吸收信徒。如成化、正德年间的无为教（罗祖教）及稍后兴起的西大乘教，嘉靖年间的黄天道，万历年间的东大乘教（大乘圆顿教）及红阳教等。它们既然打入社会上层，进而得到上层人士的支持，便可大行其道，也可得到资助刊印经卷，以至于公开建立庙宇。这些支派的社会作用，已无异于正规宗教了。但更多的支派仍保持其群众性、斗争性的特殊性格，遍布于华北、浙江、福建、湖北、江西、四川、陕西、山东等地民间，有的还深入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和漠北边疆的蒙族地区。每当阶级矛盾尖锐，或天灾人祸接踵而至之际，这些支派便组织民众揭竿而起，不断打击朱明王朝的腐败统治。

清朝定鼎中原后，对白莲教的镇压与取缔比明朝更加严酷。《大清律·禁正师巫邪术》规定：

凡师巫假降邪神、书符、咒水、扶鸾、祷圣，自号‘端公’、‘太保’、‘师婆’及妄称弥勒佛、白莲社、明尊教、白云宗等会，一应左道乱正之术，或隐藏图像，烧香集众，夜聚晓散，佯修善事，煽

惑人民，为首者绞，为从者杖一百流千里。

但严峻的刑法，禁断不了白莲教的继续发展，反而比明代更为活跃。

与明代一样，清一代自称白莲教的支派也不多，大都代以其他名目，其中有的是师承明代而发展的支派，有的则是清代另立门户的支派。据道光年间江西陈众喜编《众喜宝卷》统计，在当时的浙江、江苏、福建、山东、安徽、广东、直隶、云南、陕西、山西、江西、湖北、广西、四川十四个省份，计有无为教、三官教、五圣教、坎离教、清风教、纯阳教、当阳教、大仙教、飞升教、达摩教、清静教、龙华教、三仙教、三阳教、观音教、玄玄教、先天教、出明教、无形教、水月教、菩萨教、玩始教、大乘教、无相教、南无教、无极教、全真教、金丹教、皇极教、无为祖教、三圣教、悟空教、玉女教、万化教、青阳教、法光教、齐天教、玄圣教、清玄教、金心教、完丹教、升天教、光明教、假长生教、一字金丹教、乾阳教、上上三元教、五气朝元教、把涌金莲教、和气教、人天教、抱元守一教、玄阳教、通天教、和合教、丹通教、天军教、朝阳教、收元教、归源教等七十余支派存于民间。如果把尚未被官府发觉，或散记于实录、奏议、文集、方志中的支派加起来，直到清末，白莲教支派至少也有一百多个，可谓名目繁多，白莲花开遍神州了。

清代白莲教多数支派一如既往，继续担负着策动农民起义的战斗使命。特别是乾隆以后，各地白莲教支派不断举行反抗斗争，对清朝统治阶级造成了威胁。从乾隆三十

九年（1774年）山东清水教起义，到嘉庆元年（1796年）川、楚、陕白莲教大起义，从嘉庆十八年（1813年）冀、豫、鲁天理教起义，到道光二年（1822年）河南、安徽朱凤阁、邢名章起义等等，都给清王朝以沉重打击。尤其是咸丰年间的太平天国起义和光绪年间的义和团运动，更加充分显示了白莲教组织广大农民反帝反封建的战斗作用。

（二）白莲教主要支派

1. 明代白莲教主要支派.

无为教 无为教是明清时代白莲教的最大支派，又称罗祖教、罗道教，简称罗教。明正德时出现，嘉靖、万历时迅速发展，清代盛行，为山东莱州即墨人罗清创立。

罗清，又名因，法名普仁，法号悟空，教内尊称罗祖、罗大士、无为祖、无为居士、无为道人。明正统七年（1443年）生，嘉靖六年（1517年）卒。

罗清三岁丧母，七岁丧父，跟随叔父母长大。十四岁时，投入密云卫当兵。幼小失怙与艰辛的军旅生涯，使罗清饱尝了人世间的苦难，极需灵魂上的慰藉。因此当他退伍后，便到处拜访佛教大德名师。先拜禅宗临济宗宝月和尚为师，继向天静禅师求教，最后到九华山白云洞拜见真空无际禅师，前后历时十三年。他“奉佛甚虔，茹素持戒而不祝发，娶妻生子”。是临济宗中小有名气的居士。后遭

人诬陷，羈入“天牢”。被囚期间，他贿通狱卒，得到太监张永等人的支持，写成“罗祖五部经”，即《苦功悟道卷》、《叹世无为卷》、《破邪显证钥匙卷》（两册）、《正信除疑无修证自在宝卷》、《巍巍不动泰山深根结果宝卷》，呈进正德帝御览，受到正德帝的称赞，封他为“无为宗师”，并命经厂刊印，立时颁行天下，标志着无为教的诞生。

无为教的教义，采取了佛教的“空论”，以现象之空，参证本体之空，阐发“真空”真谛。认为悟“真空”，即可成佛了道，进而宣扬人人皆可成佛的思想，这显然深受禅宗的影响。无为教又吸取了道家无为思想，以无极净土为宇宙本源。无为教的“真空”、“无为”、“无极”以及不假修持，人人皆可“顿悟”成佛的说教，再加上劫变的观点，概括出“真空家乡，无生父母”（或称“真空家乡，无生老母”）八字真诀，这就使无为教脱离佛道而成为不挂“白莲”名称的白莲教。

在明朝严禁白莲教的形势下，罗清及其所著五部经能够得到皇帝的恩宠，其原因除了罗清于五部经中大量称引佛、道经卷之外，还因他以佛教正统自居，提出了“无为教”这个名称，并竭力诋毁白莲教。殊不知罗清所创立的无为教，其教义与白莲教殊途同归，昏庸的正德帝并不知其中奥妙，因此极力推崇，遂使无为教迅速流行，其范围之广，几遍于国中，恐怕连罗清本人也始料未及。

罗清因创无为教而蒙诏宠获释，于是他开始在北京一带建造讲堂，传经布道，奉其教者远近毕至，声誉雀起。随后他沿大运河南下，在浙江地区传教。罗清坐化后，浙江省处州府人殷继南（1546—1582年）假托罗祖转世，接续

衣钵，设立“无极正派道场”，广收门徒三千七百人，著有《圣论宝卷》、《天经》、《地经》等，是为无为教第二代传人。第三代传人姚文字（1578—1634年），浙江卢州府人，曾设立“灵山正派道场”，使无为教大为昌盛。罗清、殷继南、姚文字三人，被无为教徒尊为三祖。

无为教出现后，即被佛教正统视为异端。当时佛教大师憨山德清在山东传教，得到豪族黄氏支持，而无为教在下层社会劳动群众中传播，与憨山德清分庭抗礼。对此，南方净土宗名僧株宏和密藏交相口诛笔伐，污蔑无为派“蚊虫鸱聚，唱偈和佛，邪淫混杂，贪昧卑污，莫可名状……此其号虽非白莲，而害殆有甚于白莲者乎”！攻击罗清的五部经为“知见混浊”，“真近代魔种”，号召佛徒“宜力攘之”。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罗清的五部经被朝廷毁版，无为教被禁。从第六代传人开始，也就是清朝初年（顺治二年，1645年），无为教由富庶的浙江地区南下福建兴化，又由兴化北上福州，最后于嘉庆二年（1797年）传到台湾，改名老官斋教。

无为教既然是白莲教支派，也就具有民间宗教的双重职能，即在社会安定时，它组织教民诵经、上供、吃斋、坐功，是一个“并无匪为”的宗教团体；当社会动乱时，它也会组织教民拿起刀枪反抗封建统治。明清时代，无为教曾多次举行武装斗争，如万历十七年（1589年）徐州赵古元起义、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凤阳刘天绪起义、乾隆十三年（1748年）福建普少起义等。其中刘天绪自称“无为教主”、“龙华帝王”，普少打出的旗号是“无为大道”、“代天行事”、“劫富济贫”，充分表明无为教在组织民众反

抗封建统治中的作用。

无为教创立之时，由于受到朝廷的支持，得以广泛传播，万历时虽被禁止，但它已深深扎根于民间，在广大群众中留下了深远的影响。这不但表现在自明代正德直至清末数以百计的白莲教支派多是无为教的嫡传，而且个别的支派虽另有师承，也莫不把罗祖列入它们的道统之中，甚至不属于民间宗教的民间结社，如青帮，也奉罗祖为祖师。因此可以说罗清与他创立的无为教是宋元时代的白莲教到明清时代白莲教各种支派的过渡桥梁。

大乘教 大乘教本是佛教的一个宗教名称，也作大乘佛教，公元三四世纪时自印度传入中国。明代隆庆、万历时，被白莲教的一支所袭用，也叫大乘教，历称西大乘教。该教最初在北京西山一带郊县传播，后来流布极广，除华北各省外，远及四川、安徽、江苏等省。

西大乘教创立时，曾利用了有关顺天保明寺的一段神话传说：明正统十四年（1449年）蒙古瓦剌贵族也先带兵攻明，宦官王振挟持英宗率军五十万亲征。方度居庸关，遇一陕西来的吕姓尼姑上前拦驾，并谏说出师必不利。英宗怒，命武士将其杖毙，继续北进，后英宗果然兵败被俘。英宗被囚漠北荒原时，吕姑数次显灵出现，不仅有所陈说，并且送饭送水。英宗被释还北京居南宫时，吕姑又数次显现。英宗复辟后，为了补赎自己的过失，便封吕姑为皇姑（御妹），在北京西山西黄村为她盖了一座寺院——保明寺进行祭祀，吕姑便成为该尼庵的开山祖，即第一代住持。

利用神话传说尊大自己，这是民间宗教的惯用伎俩，因此并不可靠。据李世瑜先生考证，西大乘教实际上是保明

寺尼姑归圆所创。明隆庆初，直隶开平人张氏女九岁出家保明寺为尼，法名归圆。十二岁时（隆庆五年1571年），因诵“罗祖五部经”颇有领悟，遂依法陆续写了五部经，到万历元年（1573年）全部完成，即《销释大乘宝卷》、《销释圆通宝卷》、《消释显性宝卷》、《销释圆觉宝卷》（两册）、《销释收圆行觉宝卷》，称为“大乘教五部经”。归圆本为保明寺第五代主持，因写成“大乘教五部经”，创立了西大乘教，成为该教的开山祖师。以后世代相传，表面虽仍系尼庵，但实际上已成为西大乘教圣地。凡历百余年，直到清康熙晚期（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康熙帝才发现“保明”字样不妥，于是改为“显应寺”，复归佛教寺院。从此西大乘教传人星散，其名目也基本上消失，而是各立门户，另起名称。

西大乘教以无生老母为最高崇拜，因此它的组织系统也就以无生老母的化身吕菩萨（吕姑）为最高领导，其下分三宗六派，每个宗或派的领导称总引，共八大总引，每个宗或派都有名称，如“永顺”，每个宗或派下分六杆枝即房，共四十八房，房的领导称头行，房的成员称领众，领众是基层领导，显然是比其师承的无为教前进了一步。

在保明寺作为西大乘教圣地的时期内，因该寺尼姑结交权贵显宦，甚至神宗朱翊钧之母李太后也成了西大乘教信徒，所以保明寺与西大乘教不仅没有遭世宗时反佛毁庙运动的波及，反而得到大量资助，使该寺多次修建，该教宝卷也一再印行，直到明末清初还能见到重印本，可见流传之广。由于这种影响，保明寺还招来了一些通晓文墨的人物为其信徒编纂宝卷，一些有财力的信徒也资助印行。因

此除“大乘教五部经”外，又出现了《护国威灵西王母宝卷》、《佛说骊山老母宝卷》、《销释白衣观音送婴儿下生宝卷》、《东岳天齐仁圣大帝宝卷》、《泰山东岳十王宝卷》、《普度新声极若宝卷》、《清源妙道显圣真君二郎宝卷》等等，主要作者是刘香山、刘斗璇父子。刘氏父子，冀东人，为全真道教道士。在他们编纂的宝卷中，自然渗进一些道教成分，并与西大乘教融为一体，但尚不至喧宾夺主。

西大乘教的最初传播地区，主要是在北直隶（今河北省）各地。明万历年间，西大乘教信徒蓟州（今天津市蓟县）人王森奉教十分虔诚，他后来定居滦州（今河北省滦县）石佛口，就在那里传起教来。他自称天真古佛转世，自号法王石佛、石佛祖，传徒甚众。因他传教之地在京东，故称其为东大乘教。史载王森曾“得妖狐异香，倡白莲教，自称闻香教主”，故又称其教为闻香教。

王森坐镇石佛口，“其徒有大小传头及会主诸号，蔓延畿辅、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四川”。他还设立了一套教内财务与联络制度，“徒党输金钱称朝贡，飞竹等报机事，一旦数百里”。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王森因传教被捕论死，用贿得释。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王森进入天子居住地京师传教，交结外戚宦官，“行教自如”，因而又被捕，五年后，瘐死狱中。

王森死后，其子孙仍世代传教，凡历二百余年，其间多次兴起巨案，如王好贤案、徐鸿儒案等，虽频遭残酷镇压，亦未曾间断。该教为躲避官府追查，改头换面，屡易其名，演变为众多的支派，如清茶门、茶叶门、清水教、收缘教、一炷香、如意门、圆顿教、太上古佛门等，直到清

末出现的一贯道，仍是东大乘教的嫡传。

继承王森衣钵除其子孙外，尚有几个重要门徒，如王森的再传弟子张翠花，称为第三代祖，翠花弟子张某，号弓长祖，又号天然子，是为第四代祖。弓长祖弟子中有位李姓者，自称“木人”或“目人”，略能属文，对于大乘教教义深得其精蕴，曾于清顺治九年（1652年）著《古佛天真考证龙华宝经》，顺治十一年（1654年）著《佛说木人开山显教明宗宝卷》，原稿均经弓长校订，陆续刊行。其内容十分丰富，对有清一代民间宗教影响极大。

红阳教 红阳教又名弘阳教、混元门、元沌教，明代直隶永年曲周人韩太湖创立。

韩太湖生于明隆庆四年（1570年），少年时代曾到河南、湖北等地访道，备历艰辛，但未成功。明万历十六年（1588年），他又到直隶临城县太虎山澶溪洞（今临城附近太行山某地）修行，三年后得道，创立红阳教。韩太湖奉无为教主罗清为祖师，自称罗祖转世，号“飘高祖”。他又仿“罗祖五部经”造《弘阳苦功悟道经》等“红阳五部经”谓之“大五部”。后又集合许多经咒、佛号等造《销释混元无上大道玄妙真经》等五部经，谓之“小五部”。

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韩太湖到北京传教。当时朝廷上下笃信佛、道，师巫术士之风甚炽，而韩太湖又善于交结太监之流，曾尊石亨府、定王府、奶子府、御马监、内经厂、盔甲厂等处的太监头目如魏忠贤、陈矩、张忠、石亨等为“护法”，颇能投好朝廷中的中下层人士乃至某些权贵，遂使其教大兴。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韩太湖去世，年仅二十九岁，于是教内更借此编出许多神化他的传说，其

教益盛。

由于韩太湖结交宫中太监，推崇他们为红阳教“护法”，因此红阳教的经卷，大都由太监出资在“内经厂”刊刻，是白莲教众多支派中刻经最多的教派，而且所刻经卷，印刷精美，装帧考究，织锦烫金书套，也是其他教派无法比拟的。

红阳教的教义，主要是“红阳劫尽，白阳当兴”，宣扬劫变思想，认为“现在释迦佛掌教，为红阳教主。过去青阳，现在红阳，未来才是白阳”，白阳是理想中和极乐世界。红阳教经卷中，弥勒、无生老母、闻香，包罗并有，显然是师承无为教、东大乘教而立教。

与无为教、东大乘教不同的是，红阳教从未有过策动农民起义的事迹，纯属一种安善的宗教组织，传习的内容多为一般白莲教教义，因此其社会作用无异于佛道。教徒平日没有什么活动，只是在如来佛、地藏、观音的生日及飘高祖的生日、忌日举行佛事。也有临时举办一些酬神、祈雨之类的佛事。佛事时要宣念《弘阳苦功悟道经》、《混元红阳临风飘高经》、《护国佑民伏魔宝卷》等经卷。各佛堂大半藏有不少宝卷，在佛事之日通常要举行“晾经会”，展览他们的收藏。遇有人家办丧事时，教徒也会被邀去诵经，多是诵念《泰山东岳十玉宝卷》之类的经卷，以超度亡灵。此外，红阳教徒中妇女较多，尤其寡妇占多数。他们无依无靠，入教后习医，为人治病，并施药、舍粥，举办一些公益事业。入清以后，清廷虽也把红阳教列入申禁的邪教范围之内，但因它没有策动教徒造反的迹象，所以仍能行教如故，并且从未分析宗支，改换名称。

红阳教的流行地区，最初在畿辅一带，后来逐渐遍及华北、东北及江南一些地方，在民间的声势较其他教派为大。

黄天道 黄天道又称皇天教、黄天教，是明末兴起的白莲教重要支派，为明直隶万全卫膳房堡人李宾所创。

李宾，又名智坚、升官。出生在直隶怀安县兴宁口，生年不详，卒于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青年时代，在家务农。明正德、嘉靖年间，蒙古贵族屡次率军在长城一带侵扰，明廷为此派兵驻守长城，以防边患。李宾家住长城脚下，遂应征入伍，在野孤山岭戍边，并在与蒙古军队的战斗中伤残一目。戍边的艰苦生活，失明后的精神痛苦，遂使其宗教情感应运而生。退伍后，定居万全卫膳房堡，一心向道，拜周某为师，习无为教。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悟道成真”，乃创黄天道，以普渡九十二亿原人为己任，自称普明佛转世，又称其妻为普光佛转世，三个女儿为普静、普贤（或称普善）、圆通三位菩萨投胎转世。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李宾著《普明如来无为广义宝卷》，后又注解道经《清净经》。

李宾创教后，便至宣化、蔚州（今河北蔚县）等直隶西北部州县开坛传法，募建寺庙。嘉靖四十一年，李宾死于万全卫膳房堡，葬于附近碧天寺。此后二百年内，碧天寺便成为该教圣地。“庙里一年四时八节做会”，“奉其教者，犹千里拜坟，多金舍寺”。李宾死后，其妻普光“通传妙法”。万历四年（1576年），普光死，与李宾合葬碧天寺内。普光死后，由其三个女儿接承衣钵，至清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传至李宾四世孙李蔚。李蔚死后，依序递传李贲、

李昌年、李遐年。此时，已到清朝中叶，因黄天道在民众中的影响至深且远，终于引起清廷的重视。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清廷派协办大学士兆惠亲往万全主办此案。碧天寺被拆毁，李宾一家被剜尸示众，李宾后裔及信奉者多人从严处置。经此沉重打击，传了七代，历时二百余年的黄天道遂至衰落。但李氏之败，并不意味着黄天道的消除，经过一个世纪的沉寂之后，一个纯属偶然的原因，使黄天道再度复兴。

同治末年，万全大旱，在天灾逞虐面前，束手无策的黄天道教徒从四面八方来到原碧天寺内李宾墓地，祈求普明降雨拯民。不久果真油然作云，沛然作雨，禾苗得救。“甘霖普降，信佛弥坚。于是鳩工庀材，建庙祀之”。此时适值僧人志明游方至此，遂主持重修碧天寺事。光绪元年（1875年）庙成，并更名普明寺。该庙殿宇六进，規制宏丽，为万全庙宇之冠，是白莲教极少的公开庙宇中的一座。但志明所复兴的黄天道已非旧观，因渗入他教成分，被当时人称为“明会”，其仍保守传统的一派称“黄会”。两会为争夺道统面聚讼多年，卒将普明寺由十八村经管。

黄天道的教义，除深受无为教的影响外，尚着重于修炼内丹。以冀长生的道教理论。在它的宝卷中，大讲阴阳、日月、宫卦、丹药、铅汞、采补、调息、性命、长生等道教术语，宣扬“天无圆缺”、“人无生死”、“无饥无饿”、“无染无污”、“寿活八万一千岁，十八童颜不老年”的理想境界，因此不仅对下层群众具有极大的诱惑力，而且颇能符合明世宗笃信道教的心理，故而它的主要经卷多在北京刊刻，传播极盛。

与红阳教一样，黄天道从未策动过农民起义，为民间安善的宗教组织。它的传播地区，主要在直隶西北、察南各县。入清后，传至京畿及晋北。察南许多农村都设有黄天道的小型公开庙宇，殿内供设普明一家五口泥塑像。教徒平日在家供奉牌位，日行烧香、打坐、念咒、茹素等修持仪节。节日则到庙中举行佛事，诵读《普明如来无为广义宝卷》、《清静经》等。

2. 清代白莲教主要支派

天地门 天地门又称顺天教、一炷香，为明末清初山东商河县（今惠民县）董家林人董计升创立，是清初以来盛行于华北、华中等地区的白莲教重要支派。

董计升，字四海，号名扬，生于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卒于清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董姓一家，世代务农。董计升的童年时代，正值明朝末年，政治腐败，民不聊生，而山东又是白莲教盛行的省份，因此在他二十多岁时，迫于生计和宗教诱惑，出家韵峪庵（章邱县境），寻找生活出路和精神寄托。在此期间，他可能读到白莲教某些支派的经卷，受其影响，“得道离山”，自称无生老母差遣，“立教替天行道”，创立了天地门。

董计升从清顺治七年（1650年）开始，明传办道，先后收了八个徒弟，依次是李修真、张希玉、马魁元、马开山、刘绪武、杨年斋、石龙池、董少业，因这八个徒弟是董计升在董家林时所收，故称林传八支。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董计升被雷山寺（章邱县境）主李公请去，在

上方井修炼，又传了八个徒弟，号称山传八支，依次是徐明扬、董成所、邱慧斗、郝金声、于庆真、蔡九冈、邢振邦、杨起风。六年之后，董计升在雷山寺故去。临死遗言，立顾铭馨在石龙庵坐山，顾铭馨是董计升徒弟中唯一不在支的传人。董计升亲传的十七个徒弟，多是山东、河北一带的贫苦农民和小手工业者。他们接续传灯，八方布道，枝叶繁盛，信徒遍布全国十几个省份，特别是华北、华中尤为盛行，在民间影响很大。但组织比较松散，各支之间并无统属关系，只靠教义维系。

天地门信徒对创教祖师董计升极为崇敬，一般地称其为老师傅。各分支头领称当家师傅，其妻称二当家师傅，同样受到信徒的尊重。信徒之间，也有互称师傅的，一般地称道亲。天地门收徒最初并不讲究，董计升收李修真为徒时，堆土插草为香磕头拜师，仪式非常简单。后来逐渐规范化，不仅要有引进师傅（介绍人），而且当家师傅还要向入教之人提出各种问题等。

董计升去世后，其出家修炼、收徒传教之地及其故里，均被天地门信徒视为圣地。特别是其故里董家林，每年朝拜者络绎不绝，尤其是四月初四即董计升忌日前后，更是人山人海。朝拜者来到董家林，一面求得指点，一面给董计升化纸、烧香、上供。经天地门信徒捐资修建的董氏墓地，碑亭林立，苍松翠柏，蔚为壮观。对朝拜者来说，董氏后人无论大人小孩都是师傅。但董氏家族每代也立有一个当家师傅，从董计升至今已有十一世。

在天地门教义中，最高崇拜是无生老母，其次是天地君亲师。董计升创教初期，每当举行道场时，无生老母牌

位可以公开供奉。清朝中叶以后，由于清政府对民间宗教的严厉禁断，天地门便采取了改头换面的办法，将无生老母牌位改变为“天地三界十方万灵之真宰”牌位，为无生老母披上了一件教外之人不易察觉的神秘外衣。“天地三界十方万灵之真宰”牌位，只有在办大道场时才供奉，一般不轻易露面。而“天地君亲师”牌位却是常年在信徒家中供奉。从这两个牌位中，可以知道天地门最崇拜天地。天地门认为没有天没有地，人类就无法生存，天地之恩，无穷无尽，要经常“设摆香茶美供，酬谢天地之恩”，故名其教为天地门。

天地门主张“三教归一”，因此除崇拜无生老母和天地君亲师之外，大凡儒释道中的最高崇拜，诸如释迦牟尼、老子、孔子及一般神灵，都在供奉之列，表明它是一个多神崇拜的教门。

天地门信仰龙华三会，宣扬劫变思想，认为天地门信徒“俱是前天龙华三会上人”，要想避免劫变即三灾（水、兵、火）、五魔（狐狸、黄鼬、刺猬、长虫、老鼠），就得加入天地门，当家师傅能够阻断三灾五魔，一同“幸赴龙华三会”——极乐世界，否则就会死掉。为此，天地门规定了信徒的日常宗教活动，一是只要有条件的信徒，都要在老师傅的忌日时，到董家林坟前朝拜。二是要每日烧香磕头，名曰“工夫”或曰“四合工”、“长远工”。三是为人看病，天地门内有一个规矩即有病不吃药，烧香上供，求“天地君亲师”保佑，特别是求老师傅保佑。天地门不但给门内人看病，还给门外人看病，主要由当家师傅担任。当家师傅为门外人看病不收钱，但要吃供；倘有灵验，主家

还要宴请当家师傅或办一还愿会。

此外，就是办会即办道场。会分三种：圣会、白会、炕头会。圣会又有十五圣会和四月四圣会。十五圣会正值我国传统节日元宵节，要高搭彩棚，供上“天地三界十方万灵之真宰”、“天地君亲师”与各种神灵牌位，案上摆设供果香烛。白天鼓乐喧天，香烟弥漫，善男信女顶礼膜拜；夜晚烟花竞放，犹如白昼，男女老少喜庆元宵，辛勤劳作一年的农民借此机会欢乐一番，祈求神灵保佑来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大人孩子，无灾无病。四月四圣会是为纪念创教祖师董计升而办，其仪式与十五日圣会同，不过规模小。白会又称亡会，系有丧之家请办的，仪式很复杂。炕头会是家有病人久治不愈，而请天地门当家师傅念经压邪，因在病人家中举办，故名炕头会。

天地门的经称无字经。董计升创立天地门时，自称“无咒无经”，“少经无卷”，“千经万卷腹有藏”，基本是早期传人创作后，靠历代当家师傅口传心授，代代相传，没有刻本经卷留世。作者在调查该教时发现，正是这个原因，使早期传人创作的许多经文湮没。但从本人笔录整理出来的几十部经文中，仍可得到该教源流、教义与道统等方面的信息。这些经文在形式上有经、佛、赞、咒、曲等不同名目。经、佛的内容偏重于宣讲教义，供信徒修持时诵读，赞、咒主要是用于举办各种道场；曲则是劝化世人为善除恶时念唱。这些经文分别用四言、五言、六言、七言、八言、九言、十言的句式写成，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很适于缺少文化的农民掌握。

在理教 在理教又称理教、理门、理善会、白衣道、八

方道，山东莱州即墨人羊宰创立。

羊宰，字来如，也作莱儒，号澄清，原姓杨，名存仁，又名衍逢，字佐臣。生于明天启元年（1621年），歿于清乾隆十八年（1752年），教内尊为羊祖。

据教内传说，羊宰曾登崇禎癸未科进士，未及殿试明朝即灭亡。入清后，他绝意仕进，云游天下，宣传反清复明思想。后行至京东蓟州歧山澜水洞，感到环境幽静，即居住在那里创立在理教，以此度化世人。

羊宰创立在理教时，曾有毛采墀等人皈依。羊宰晚年以在理教名义下山单独传道度人，信徒尚少，因此社会影响不大。乾隆三十年（1765年）以后，其六传弟子尹来凤（教内称尹祖）在天津梁家嘴建立了“公所”，从此日见兴盛。此后百余年中，该教在天津、上海、北京、河北、江苏、山东、河南、安徽、江西及东北、内蒙古等地都很盛行。1933年成立全国性领导机构“中华全国理教联合会”，各地相继成立分会，全国理教公所达三千个以上，信徒甚众。

早期在理教组织、教义、戒律都较严格，甚至信徒服饰都与众不同。约在光绪年间，因各地建立公所，宗派繁多，各地公所编印的宝卷与期刊等宣传品内容颇不一致；其道统、仪节等，各地都有很大差异。唯独戒烟（包括鸦片烟）、酒这条戒律，各派始终奉行不渝。在入教仪式上，信徒和“引保”要发下宏誓大愿，“领众”（传道师）要谆谆告诫：此律重如泰山，倘有违纪，终生颠倒，永无顺遂之日。各公所都大量发放戒烟药物，或配备医生施治。其他规戒有孝顺父母、和睦乡里、戒杀、戒贪、戒淫、戒妄，只

准行善，不准作恶等。入教时，传道师要传授“五字真言”，即“观世音菩萨”五字。平时只准在心中默念，不许出口，据称如此即可“求顺”，遇到大灾大难，则向东南高喊三声，可逢凶化吉。

在理教主张三教归一，“奉佛教之法，修道教之行，行儒教之礼”。又强调不拜偶像，因此公所中除供奉“圣宗”（即观音）、羊祖、尹祖像外，没有其他神像。该教还不许烧线香，只准烧檀香；不许吹打念唱，所以没有法器，只有葫芦、椰瓢、套环之类。磕头的动作较特殊，称为“下参”，又称“筋头报母参”。信徒可在家供奉圣宗像，每天下参五十三次，默念真言，或诵读《白衣观音神咒》等。公所负责人称“领众”，号称出家人，俗称“当家的”，实际上是老而无依被认为有“道行”的信徒。做了领众就常住公所，不再回家住宿。信徒有男有女，男称大众，女称二众，因此公所也有“大众公所”与“二众公所”之别，女领众称法师。

在理教每年有三个节日：农历三月十一、十月初三和腊月初八，但一般只庆祝腊八。事先广为捐募，届期公所搭棚，悬灯结彩，举行一种名为“摆斋”的宗教仪式，在某一公所属下的信徒都要去“捧斋”。这一天还要“点理”（收新道亲仪式）、“放法”（选定下任领众仪式）、吃素席、舍“结缘豆”等。

羊宰创立在理教时，订有一部“羊祖大法”，又称“理教大法”，一直被在理教信徒视为法宝，锁在领众掌握的“法箱”中，轻不示人。其实“理教大法”并没有什么奥秘，所述内容只是一些应该怎样“修身养性”的道理，以及在

行某些仪式时当念的歌词咒语之类。

早期的在理教曾有反清复明的思想，为此定有五字真言：“复明灭大清”（一说为“一心保大明”），表面上用“观世音菩萨”五字代替，规定信徒对五字真言，要做到“上不传父母，下不传妻子”，防止泄露秘密，以免官府追查。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思想也就无形中消失了，变成一种以戒烟酒，办公益为主的安善宗教团体。

八卦教 八卦教是清代白莲教某些支派的名称。最早使用八卦教名称的是东大乘教。该教进入清代以后，按九宫八卦把其教分为三宗五派、九杆十八枝。三宗五派就是乾卦宫、坎卦宫、艮卦宫、震卦宫、巽卦宫、离卦宫、坤卦宫、兑卦宫，另外还有中央宫、戊己宫。中央、戊己两宫由当时的教主张某掌握，其他则由他的八位弟子分掌。八位弟子受命按各宫的方位，分别到全国各地开教渡人，各宫都必须渡进九亿六千三百万教徒才算足数。

这种办法确定之后，便随着东大乘教的传播，首先在冀东一带实行起来。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张荣在平谷传教时，就称自己为金丹八卦教，并收滦州人董太为弟子。嘉庆二年（1797年），张荣的儿子张恩胜与董太到密云传教，被官府逮捕镇压。董太的儿子董怀信又与余旺玉接续传灯，嘉庆十七年（1812年）再遭杀戮。但他们并没有停止活动，一直潜伏在民间传教。光绪十七年（1891年），热河建昌（今辽宁凌源）发生了一起著名的反抗天主教士杀害在理教徒徐荣事件，就是他们策动的。

东大乘教按八卦分掌宗派办法，也影响到其他教派。清初，河南人李廷玉创立先天道时，有弟子姬（一说吉）、郭

(一说孔)、张、王、陈、郜、柳(一说刘)、邱八人。此时适逢清廷招贤，因李廷玉率徒投效有功，被清廷封为九宫真人。其八位弟子被封为八卦真人，并准其按八卦到各地各立教门。康熙年间，张廷玉师徒被奸臣诬告，除离卦郜某一人外，全被毒酒杀害。

山东单县刘佐臣于清初创立的收元教，也是“分八卦收徒党”，故又称八卦教。收元教是一个反清的白莲教支派，刘佐臣子孙世代继承反清传统，康熙、雍正、乾隆各朝，其子儒汉、孙恪、曾孙省过、玄孙洪等屡次犯案，累被镇压，但他们仍顽强斗争，行教如常，其声势可与东大乘教媲美。

在用八卦命名的白莲教支派中，最著名的是林清、李文成执掌的八卦教。

八卦教又名天理教，教首林清，祖籍浙江绍兴，后移居河北大兴县黄村。青年时代，曾当过药店学徒、更夫等，又当过大兴巡抚衙门书吏、江南粮道和丹阳县长随。嘉庆十一年(1806年)加入八卦教。因他轻财好施，救济贫困，且能言善辩，又有组织才能，入教后很快取得了教民的信任和拥戴，被推为首领。后来林清结识了河南的李文成与冯克善，并结为异姓兄弟，共同执掌八卦教。

林清主坎卦，总领八卦，称天皇；李文成掌震卦，并管领坎卦以外的七卦，称人王，教内地位次于林清，七卦内有事需向林清报告；冯克善是地王，时称三皇。三皇之下设有八卦卦主，卦下有宫，设八卦宫王，宫王之下又有卦伯六十四人。八卦教又有文卦、武卦与文圣人、武圣人之分。林清不会武艺，总领文卦，是文圣人。冯克善精通拳术枪法，总领武卦，为武圣人。

八卦教在山东、河南、山西、河北等地颇盛，是白莲教支派中具有明确反清目标的主要支派。嘉庆十八年（1813年），李文成在河南滑县率领徒众起义，林清派遣二百名教徒打进北京紫禁城，给清王朝以巨大的震撼。

此外活跃于华北北部、中部的捻军，其组织也与八卦教密不可分；义和团更以八卦教编列战斗队伍；这些都是清初八卦教的滥觞，但他们之间不一定有什么师承关系。还有的八卦教支派只称卦名，如离卦教、坎卦教等，它们早已脱离了本来的宗支，发展为独立的教派，并且世代相传。也有的支派完全改换了名称，如清末兴起的圣贤道，在他们的入道仪式中，要念一段“外灵文”，其中就有圣贤道本是“南方离宫头殿真人部老爷门下”的表白文字，可见圣贤道就是离卦教的易名。清末兴起的一贯道也自称其十四代祖师姚鹤天是乾卦教的，十五代祖师王觉一是震卦教的，如此等等。

清茶门 清茶门是清代白莲教的一个重要支派，为闻香教（东大乘教）主王森子孙所创。明朝末年，王森及其儿子、徒弟因传播闻香教先后被捕处死。但王森子孙不畏强暴，继承父祖事业，继续在民间传教，并将闻香教改名清茶门，代代传习，自称教主。

大约从清乾隆三十年代开始，王森各支子孙以冀东为据点，纷纷南下，在河北、河南、山西、湖北、江西等省传教。他们扎根串联，招收徒众，持续将近半个世纪，为清茶门的极盛时期。

清茶门教内有十分严格的宗教仪式与教规。教徒于每月朔望献茶烧香，奉弥勒佛。每年正月、十二月，教徒还

需向教内各纳钱一次，数目不拘，称为根基钱或福果钱，意即种下弥勒佛下凡时代的根基和幸福，届时得偿十倍。王姓教主被尊为师爷，入教的人与王姓有主臣之分，不仅要向师父磕头礼拜，师父端坐不辞，而且见了师父的儿子也要磕头给钱。教规有三皈五戒，即皈依佛、法、师，戒杀生、戒偷盗、戒邪淫、戒荤酒、戒诳语。

清茶门继承了闻香教的反抗传统，在其经卷中明确提出“清朝已尽”、“日月复来”的反清复明思想，因此清廷一直视其为洪水猛兽。在不断残酷镇压各地清茶门活动的基础上，清廷于嘉庆十八年（1813年）开始对清茶门的发祥地石佛口与安家楼进行了大规模的清剿。居住两地的王氏家族，有传教活动的被杀戮放逐，其他或连坐处刑，或流放云贵、两广等地安插落户。至此，历经二百余年的王氏宗教世家土崩瓦解，清茶门也随之衰微下去。

清茶门经卷主要有《三教应劫总观通书》、《九莲如意皇极宝卷真经》、《古佛天真考证龙华宝经》等。此外，清茶门还诵念《伏魔宝卷》、《金科玉律文》。

真空教·真空教又称空道教，亦称空中道教，清同治初年江西赣州寻邬县人廖帝聘所创，是一个以戒吸鸦片与治疗疾病为目的的白莲教支派。

廖帝聘，字达群，号兆空。生于道光七年（1827年），卒于光绪十九年（1893年）。廖氏世代务农，帝聘幼年时曾从其胞叔履泰读书，接触过一些“三教经典”。二十四岁丧妻，遂不再娶，已萌出家修炼之念。咸丰七年（1857年）三十岁时，落发修觉山为僧。在这期间，他钻研了罗清的“五部经”，颇有所得。同治元年（1862年），形成了自己的

一套教规，便离开了修觉山，在故乡黄畬山创立真空教，开始建堂布道。

真空教以“复本还原，归一归空”为宗旨，采取跪拜、静坐、饮茶、诵经等所谓“精神疗法”，不用药物，为人们戒除鸦片烟瘾或治疗疾病。清中叶以后，鸦片传入中国，造成严重的社会危机。恰在这时，真空教应运而生，帮助人们戒烟治病，并每见成效，又加该教开斋破戒，不避腥荤，一般教徒也无须出家绝嗣，因而信奉者日众。

从光绪六年（1880年）起，廖帝聘先后收了不少徒弟，其中赖仁章、蓝氏（赖之妻）、凌邦璧、张声见是亲信高徒。他们都是当地农民，又都因戒烟入山学道，戒烟成功后又均留山不去，愿为随身弟子，协助传教布道，这是真空教的五位祖师：真空祖师廖帝聘、本空祖师赖仁章、本空圣母（又称音空祖师）蓝氏、原空祖师凌邦璧、受空祖师张声见。

光绪八九年（1882—1883年）间，廖帝聘见其教大行，信徒日众，决定在修觉山建造道坛；因资金缺乏，向富户借贷，修了一座简陋的道坛。赖、凌二徒边传道边力耕，以偿还债务。因信教戒烟的人越来越多，声誉日隆，引起了当地官府的注意。光绪十八年（1892年）冬，官府以左道惑众的罪名，将廖帝聘与其徒赖仁章等逮捕下狱，备受酷刑。翌年，廖瘐死狱中。后经有力信徒多方疏通，赖仁章等总算出狱。张声见出狱后不久亦病死，赖、凌二弟子继续传教。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赖、凌终于在黄畬山建起了一座正式的道堂。此后，门徒四方传道，又修建了登高山道堂、会昌浴口道堂等。到光绪二十六七年（1900—

1901年)，真空教已由江西境内传到广东、福建、江苏、浙江等省，并陆续发展到香港和东南亚，至今仍在民间流传。

真空教的最高崇拜称“空中祖”，这是一个虚构的神灵，无非是宣染所奉之神的崇高与至圣。但该教不供偶像，也不供此神画像，只在道堂大厅正中墙悬挂一匾，上刻“空中祖”三字代替神像。对五位祖师的崇拜，是在大厅正中端放五把椅子象征五祖神位。

真空教的礼拜仪式也有些别致，住道堂的教头与教友，每日三餐前都要到大厅上供礼拜。上香后，掌教先跪下叩拜，击磬，众人随地肃立，面对神案，两手左右分开下垂，弯腰，双手撑地，不拱手，如此反复几次。礼毕，随手将饭菜撤去，各自回膳堂用餐。住堂教友早晚功课也在此进行。做静功另有静室，因教友大都力耕，故多在晚上练静功。

每月初一、十五，都有信徒前来道堂朝拜真空祖师（俗称廖老伯），每个信徒一年至少朝拜三五次。朝拜时，点香燃烛，教首端坐正中，低眉垂目，下面众信徒列队下跪，口诵经文，每诵一句，弯腰下拜一次，跪拜方式与住堂教友相同，诵经毕，跪拜亦停止。教首徐徐睁眼，向众信徒微微点头，如有要求治病者，上前说明并行礼求治，教首口中喃喃，随即施茶一杯。

真空教的盛会是每年的四月初九（廖帝聘诞辰）、七月二十七（黄畚山开坛布化）、十月初十（廖帝聘忌日）。届时，各地信徒大都赴会，少则数百，多至千人。每当此时，大厅内案桌前的一对石狮背上，插上一对重二百四十斤的大红烛，五个锃亮的大铜香炉也焚上檀香，红烛高照，烟

霞氤氲，信徒络绎上山赴会，向神位跪拜。道坛内杀猪宰羊，饭菜丰盛，信徒饱餐一顿而归。

真空教不吃斋，从教首到教友以及一般信徒均不避荤。但教首和教友都须住在道堂或道坛里，过独身生活，如已婚配，必须离异。他们身穿黑色道服，戒行比较严洁。一般信徒在家念经，生活无异常人。教内没有教职等级，新徒入教也没有仪式。江西老堂与各地道坛始终保持统属关系，但各地教首都向老堂缴献香金，老堂的经济来源主要靠信徒捐助。

真空教的经卷共有四部，即《报空宝卷》（又称《首本》）、《无相宝卷》、《三教宝卷》、《报恩宝卷》。

一贯道 一贯道是清光绪年间兴起的白莲教重要支派，创始人王觉一。相传王觉一为东大乘教首王森后代。东大乘教在明清两代因多次掀起农民起义，频遭禁止。王森子徒也屡被杀戮。其后人不屈不挠，流落各地，另立教门。王森再传弟子直隶高阳人张某，号弓长祖，又号天然子，将其教改为圆顿教，王觉一即系这一派的传人。王觉一居山东青州（今益都）时，曾拜山西姚鹤天为师，姚本八卦教徒，属乾卦派，王则改隶震卦教。

王觉一有很强的活动能力，除在山东传教外，还到过山西、直隶、河南、江苏、湖北、四川等处。光绪九年（1883年）二月，王觉一带领部分山东教徒至汉口，联系当地教徒准备在汉口、武昌举行暴动，事泄，逃往四川。

白莲教各种支派的教义，多取自佛教与道教，而王觉一创立的一贯道则大量掺入儒家思想，对宋儒尤其推重，因此一贯道即以“孔孟大道”相标榜，其教名也是王觉一据

孔子所言“吾道一以贯之”而定。

民国十九年（1930年），山东济宁人张光璧接续道统。他自称济公活佛降世，是“平收万教”、“渡尽九二原子归根认母”、“办理末后一着总收源”的佛祖，并袭用明万历时圆顿教祖的法号亦称“弓长祖”，也号“天然子”，教内奉为“师尊”。

“七·七”事变后，张光璧及道内一些上层人物，在整个沦陷区内大开其“普渡”。抗战胜利后，张光璧等人又将一贯道改称“中华道德慈善会”，在原抗战期间的大后方传播。至此，一贯道的踪迹几遍全国。从白莲教的发展史上看，一贯道的流布地区之广、信徒人数之多、宣传力量之强、发展速度之快，均为空前未有。

抗战胜利后，天津、上海、沈阳等地的一些一贯道上层人物潜往台湾，开始在台湾各地传道，曾被长期禁止。后来他们在教义中强调传习儒家思想，以至把“四书五经”等当做经卷。与此同时，他们又在社会上做了不少公益事业，如办学、救灾之类。他们以台湾为据点，还向许多国家，如韩国、日本、东南亚各国、美国、加拿大、巴西、南非以及欧洲一些国家中华侨居住区传播。更重要的是，他们采用各种方式进行宣传，为一贯道正名。通过这些活动，一贯道于1987年1月在台湾被批准为合法宗教，可以建立公开组织，公开传教。目前台湾一贯道教徒估计有百余万之众。

3

一个寻求“现世解救” 理论的形成与神化

(一) 教 义

与盛行于世界的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正统宗教追求“彼岸世界”，即来世幸福的目的根本不同，中国民间宗教寻求的则是“此岸世界”，即现世人生的解救。东汉末年的太平道与天师道首发其端，并为此进行了英勇的战斗与进步的尝试，开始了民间宗教寻求“现世解救”理论的艰难历程。经过一千多年的发展演化，到南宋时期定型为白莲教的民间宗教，以其“弥勒佛降世”的思想信仰和由此策动的一次又一次农民起义，为这一理论的最后形成作好了精神上与物质上的准备。明朝正德年间，无为教大师罗清集流传于民间的白莲教信仰之大成，著成“罗祖五部经”，宣告了这一理论的诞生。此后，白莲教许多支派的创教祖师又不断丰富和发展这一理论，使其日臻完整。大约明朝中叶，一个寻求“现世解救”的理论终于出现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思想领域，这就是被一件神秘外衣裹得严严实

实的白莲教教义。

宇宙的本源是什么？又是谁创造了世界与人类？佛教说宇宙的本源是“空”。道教说宇宙的本源是“道”。基督教认为上帝创造了世界与人类。伊斯兰教则崇奉安拉为宇宙万物的创造者与主宰者。与以上正统宗教相比，白莲教的宇宙观和创世说似乎更为古老。白莲教认为宇宙之初，混然一团，什么也分不出来，称作混沌，也叫鸿蒙、威音。在混沌之上有一个地方叫云城，也叫安善极乐国、都斗太皇宫、无极理天，也就是天堂。那里住着一位无生无灭、不增不减、不垢不净、至仁极慈的能够创造一切也能毁灭一切之神，称为无生老母。她开始使混沌分出天地日月、两仪四象、五行八卦，创造了山川河海、草木禽兽和万物之灵人类，于是宇宙成了一个花花世界。由此可以看出白莲教显然是汲取了中国原始先民母性崇拜和母神创世神话的思想遗产，它既表现了中国远古文化的深远影响，也道出了白莲教憎恶现实君父纲常制度的残酷压迫和憧憬人类童年古朴纯真的美好理想。

有了世界与人类之后，如何治理呢？道家主张无为而治，儒家主张仁政礼治，佛教引导人们苦苦修行，死后升人天堂，道教教唆人们长生不老，羽化飞入仙境。儒释道各自驾驶着自己的理论之舟，向人类社会的理想之岸航行。白莲教则从儒释道中撷取于己有用之理，构造出一套独具特色的“现世解救”理论。

按照白莲教母神创世说，无生老母开天辟地，创造出人类，本想让人类在世界上好好生活。但是世界上还有一种对立的力量——魔鬼。魔鬼使人丢失本来灵性，生出奸

歹险恶之心，成了坏人，世界因此弄得乱七八糟不成样子。于是，无生老母又造了九十六亿好人，称原子，又叫佛子、皇胎儿女、贤良子，将他们降到世上，希望他们重新整顿这个世界。但是使她很伤心，这九十六亿原子同样受了魔鬼的迷惑，玉石不分了。无生老母一气之下，决定派遣燃灯佛、释迦佛、弥勒佛三位佛祖依次降临人世，把原人渡回云城，回到自己身边。

为此，无生老母先把世界从时间上分成三个时期，即认为宇宙自开辟起到最后为止，必须经历三个时期。这三个时期，依次是青阳时期、红阳时期、白阳时期，又称龙华初会、龙华二会、龙华三会。青阳时期（龙华初会）代表过去，命燃灯佛掌教；红阳时期（龙华二会）代表现在，命释迦佛掌教；白阳时期（龙华三会）代表未来，命弥勒佛掌教。每个时期之末，将要道劫并降，降道渡回原人，降劫收杀恶人。

于是，燃灯佛首先下降凡尘，执行老母神圣旨意。但是，由于燃灯佛办理不力，在青阳时期（龙华初会）仅渡回两亿原人。接着，释迦佛也辜负了老母的重托，在红阳时期（龙华二会）亦渡回两亿原人。两个时期、两次龙华大会加在一起，仅仅渡回四亿原人，还剩下九十二亿原人留在世上受难，而且许多恶人也没有消灭。这时青阳、红阳两个时期已经过去，无生老母就将渡回九十二亿原人的任务，都交给了弥勒佛，命他在白阳末期一次完成，叫做“末后一着”。与青阳、红阳二期不同，白阳时期渡回的九十二亿原人不是回归云城，而是要将云城降到人间，弥勒佛要在云城降临凡世时，召开龙华三会，届时九十六亿原

人与无生老母团聚一堂，称为“归根认母”。在云城降临之前，要降下大劫，即水、火、风三灾齐降，所有恶人都被消灭。大劫过去，龙华三会之后，那将是黄金铺地、永享平等幸福生活的极乐世界。

这个任务既重且大，弥勒佛如何完成呢？首先，他要亲自下凡，化为人身。还要天上的星宿神佛一齐下凡，化为人身，称作“知识”，帮助弥勒佛办理“末后一着”：化为身人的弥勒佛要开创一个教派，他就是祖师，那些知识担任传道师，到各地建立佛堂，大开普渡，并宣称他的道是唯一的无生老母降下的最后一次真正的大道，所有其他教派都是邪门歪道，已经加入其他教派的，这次也都要重新加入他的道。否则，就会永堕苦海，不能参加龙华三会，也就不能永享平等幸福之快乐。

这样，以无生老母为造物主，以弥勒佛为救民于苦海的老母使者，以三期末劫为标志，不是回归云城，而是造福人间的理论建立起来了。尽管这套理论既简单粗俗又神奇怪诞，但是它确实为生活在封建社会底层的劳苦大众指出了一条争取解救之路——加入白莲教，信仰弥勒佛，就可以挣脱压迫，进入人间乐园。这种超人间的宗教说教，如同漫长黑夜中出现的一道希望之光，给人以勇气和力量，特别当社会动荡不安，阶级矛盾激化之际，往往具有极大的魅力，常常成为广大劳苦大众反抗封建统治的思想武器，并会立即转化为强大的物质力量，向反动腐朽的封建王朝冲击。明清时代普遍流行的“弥勒佛当有世界”的口号，正说明了白莲教这套理论在民间的广泛传播和巨大的影响。

以上所述的只是白莲教最基本的内容，具体到某一支

派，又会有很多差异。如对佛经懂得多些的支派，就多讲些断除烦恼之类；对道教懂得多的支派，就多讲些丹药服食之类；懂些四书五经的支派，就多讲些忠恕仁爱；懂得理学的支派，就多讲些性理天命；有的支派还侧重于三纲五常、孝悌礼义、酒色财气等伦理道德观念。总之是因时因地因人而宜，但无生老母、弥勒佛、三期末劫、龙华三会这些最基本的东西，都被大多数支派奉行不渝。

（二） 仪 式

任何宗教不仅要有思想，而且应该有仪式，因为从仪式中透露的宗教观念，比起少数宗教理论家的思想更能体现宗教的特质。白莲教既然是宗教，当然也规定了自己的仪式。不过，它的仪式与其教义一样，也适合广大劳苦大众的文化水准，简单易行，便于掌握。

首先是供奉神灵。白莲教的最高神为无生老母，又称无极老母、无极老祖、无生父母等，无生老母之下，则是燃灯、释迦、弥勒、达摩、济公、观音、关公、吕祖、南极仙翁、太白金星、孔子、老子、八仙、十八罗汉、二十八宿、罗祖、羊祖、弓长祖、飘高祖、石佛祖等，包括了儒释道所奉神灵及白莲教主要支派创教祖师。这些神灵均以牌位的形式，摆在佛堂或道场正中，以供举行仪式时顶礼膜拜，使广大信徒首先通过这种简单的直观方式，在心灵上树起了对无生老母至高无上的尊崇与信仰。

其次是人教仪式。白莲教在接纳信徒时，要传授“三宝”。所谓“三宝”，就是将来进入云城时要交验的三种凭

证，称为“答查对号”，合格的才准许通过。一宝是口诀，常是五字真言、八字真言之类，如“无太佛弥勒”、“真空家乡，无生老母”等；二宝是手诀，称为“合同”，其指法各支派不同，如一贯道是“两手心向内，左手抱在右手上，两个拇指按在右手无名指的根部”。这种手势暗合“子亥相交”，“子”与“亥”为“孩”，象征无生老母唤回九十六亿原子，是认祖归根的意思；三宝是经知识点开“玄关”窍，玄关的部位各支派也不同；但总离不开两眉中间到囟门之间，如一贯道由点传师用右手的中指在求道者眉心“玄关”窍按捺一下，同时口中说：“一指会中央”，再用左手掌在求道者面前抹一下，象征洗心革面，同时口中说：“万法皆超然”。一贯道认为“玄关”窍是天地人间的大秘密，人类灵魂的根源，点破玄关是会通天人的唯一法，玄观点破之后，灵魂在死后直升理天，未曾点破玄关者，灵魂于死时由两眼散出，进入轮回。入教之后，信徒要经常抱合同、念真言，可以逢凶化吉，遇难呈祥。此外还有一些烧香、磕头、献供、献茶、祈祷、忏悔仪式，这也由各支派自行规定。

最后是渡人人教。在白莲教各个支派中，一般信徒都不成本大套地念经。他们虽都有经卷，但只是由少数教内上层分子为装点节日而专门训练的一班人诵咏。一般信徒最重要的修持功夫是渡人人教，称为“作功”，即把扩大势力和个人的实际活动放在首位。首先要把自己的家属与亲属渡进来，然后再渡朋友和所接触的人。据说渡人并不难，只要被渡之人是在“九六原子”之数的，一经劝说必然会同意人教，这是一种缘分，否则劝教之人就不会遇到那个

被劝之人。这主要是因为白莲教的一套教义，确实能给广大劳苦群众以心灵上的慰藉，尤其是在人民苦难深重，走投无路的时候，更有其感化力，成为广大民众反抗封建统治的批判武器。

（三） 经 卷

经卷是记载宗教教义、仪式、戒规等方面知识的专门典籍，也是它所以称为宗教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世界上任何宗教都有自己的经卷，例如，浩如烟海的佛经道籍，简明生动的基督圣经等。中国民间宗教从其产生伊始就有经卷，但因其尚未形成定型化的教义，所以一般是借用其他宗教的，如太平道与天师道就曾借用了《太平经》与《老子》。后来民间宗教在千年的发展演化中，又曾借用了转为民间宗教的佛教某些宗教及摩尼教的经卷。民间宗教在南宋时期定型为白莲教之后，又经过一个多世纪的不完善，约在明朝初期才真正有了自己的经卷。据朱国祯《涌幢小品·妖人物》中记载，明成化中山西崞县（今原平）王良及忻州（今忻县）封越利用白莲教起义，为官军所获，追出其“妖书图本”《金锁洪阳大策》、《镇国定世三阳历》、《弥勒颂》、《应劫经》等共计八十八部。从这些经卷的名称来看，这大约是白莲教最早的一批经卷。

白莲教的早期经卷，均为手抄秘本。这是因为它们所宣传的内容，与封建统治阶级的正统思想大相径庭，历代政府莫不将其视为妖书邪经而大加查剿、禁毁，而且他们又不能公开布道，没有资金，书坊也不会承揽他们的印刷

业务，故而不能公开印行，只能在民间下层社会秘密传抄流行。但这种抄本经卷应视为白莲教的正宗，它代表了民间宗教的本色，蕴藏着深刻的战斗思想，因而受到广大农民的欢迎，并被起义农民奉为至宝。正因为如此，这些经卷很难流传和保留，目前只发现两三种。

从这仅有的两三种经卷中可看到，他们把起义时严重的天灾人祸说成“三期末劫”水、火、风三灾来临，把起义领袖指为无生老母选派的代表或是弥勒佛，把起义将领们指为诸天星宿和佛祖，把“当今皇帝”指为妖魔、邪精灵，把一般战士指为“九二原子”，把夺取政权说成是皇帝的天数已尽、新的真主当来，把革命的前景说成是“云城”将要降世，他们还把教内的规诫当做军事纪律，又以神的名义提出战斗口号、部署作战计划。总之他们把宗教和革命巧妙地结合起来，使白莲教成为组织和策动农民起义的战斗旗帜。

自明正德时始，白莲教经卷发生了一次历史性变化，这就是以无为教为代表的支派由于竞相攀附上层社会，因而得到支持，拥有充分资金和印刷条件，遂使编印经卷蔚为风气。当时刊印的经卷不但数量大，而且印制精美，装帧考究，较之佛道经卷尤有过之。这在中国民间宗教史上是一件大事，无为教等支派本想通过巴结上层社会，争得正统席位，从一定意义上说，这是对白莲教的一种背叛，但从此白莲教有了自己的印本经卷。

目前海内外公私收藏的印本经卷尚有一百几十种，最早的版本是正德四年（1501年）刊印的“罗祖五部经”。由于该部经卷的第四、第五部的名称带有“宝卷”字样

(《正信除疑无修证自在宝卷》、《巍巍不动泰山深根结果宝卷》)，所以后来各支派所编印的经卷也就纷纷仿效，以“宝卷”命名，这一名词遂成为白莲教经卷的专用称谓。

与白莲教早期抄本经卷不同，这种公开刊印的宝卷，其内容不仅不能有任何违碍字句，而且还要尽量拉上一些佛、道、儒的东西来装饰，才能兜售他们自己的教义。从他们的宝卷名称，如《佛说大方广圆觉修多罗了义宝卷》、《销释南无一朱弥陀授记归家宝卷》、《救苦救难感灵观世音宝卷》、《目莲救母出离地狱升天宝卷》、《清源妙道显圣真君二郎宝卷》、《泰山东岳十王宝卷》、《先天元始土地宝卷》等，可以看出它们与真正的佛经道籍几乎难以区别了。

每部宝卷字数一般在一二万字左右，多数分为上、下卷，二十四品。在全卷的开头和结尾有开经偈、焚香赞、收经偈，同于一般佛、道经典的偈赞，为吟诵部分。宝卷正文以韵文为主、白文为辅。韵文分五言、七言、十言，其中以十言韵文最多，七言韵文极少，用于吟诵。白文设在每品中起韵文之前或交换形式之间，同于一般说唱形式作品中的说白。在每品之末，多数宝卷嵌有《驻马听》、《沽美酒》、《上小楼》等各种民间传习的曲牌，一般为两阙或四阙，个别的翻到数十阙，用以歌唱。

约从道光年间开始，宝卷分化成两种新的体裁，一是某些支派所编的经卷中，加进了扶乩通神降坛垂训的内容，名为“坛训”。坛训比宝卷简单，多是十言韵文，偶有五言、七言，字数多者一二千，少则几百。坛训的编写制作极为简单，不论印本、抄本，数量都很大，自清末至解放前，在白莲教各种支派中广为流传。二是在宝卷中开始加进佛道

劝善惩恶的故事，如《目莲救母宝卷》、《悉达太子宝卷》、《刘香女宝卷》、《韩湘宝卷》、《何仙姑宝卷》等。渐后又加进一段民间故事或戏曲故事，如《孟姜女宝卷》、《白蛇传宝卷》、《龙图宝卷》、《梁山泊宝卷》、《珍珠塔宝卷》等，宗教色彩也随之减少，有些纯属民间通俗文学作品。

宝卷由白莲教各支派的专职人员或一般信徒来宣唱，间或也有由僧人、尼姑、道士宣唱的。自从增加各种故事之后，宝卷则流入坊肆、楼馆和居民中，形成一种名为“宣卷”的曲艺，宣卷艺人也就不再限于教中人。宣卷艺人编写的宝卷都是其个人所用脚本，文字较粗俗，多系抄本，但也有些经过文人加工的印本。清光绪、宣统至民国时代，宣卷及作为宣卷脚本的宝卷，在江浙诸省颇为盛行，并北上传到北京、河北、山西、甘肃某些地区，在民间影响很大。

4

白莲教与农民战争

(一) “弥勒佛当有天下”

在中国封建社会中，由于小农经济的制约，造成了农民阶级的愚昧、保守、分散，他们在反抗封建统治时，不可能依靠自身的觉悟，只有把解救的希望寄托于神助。只有借助于超人间的神的号召，才能把分散的农民组织起来，也只有打出虚妄的神的旗帜，才敢于向封建统治者公开宣战。因此，中国历史上的大多数农民起义都或多或少地“让群众的切身利益披上宗教的外衣出现”，而定型为白莲教的民间宗教正好充当了号召和组织农民起义的最佳角色。

元代是白莲教大发展时期，弥勒信仰风靡全国，神州大地到处是白莲教信徒，这主要是广大汉族人民对蒙古贵族野蛮统治的一种精神反抗，人世间的悲愤与希望，采取了宗教幻想形式。随着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的日趋尖锐，批判的武器终于变为武器的批判。元顺帝至正十一年（1351

年)，北方白莲教首韩山童利用元朝征夫开通黄河故道民怨沸腾之机，“倡言天下乱，弥勒佛下生，明王出”。于是三千名信徒跟随韩山童在白鹿庄誓师起兵，揭开了元末农民大起义的序幕。后来韩山童被捕牺牲，另一首领刘福通立其子韩林儿为小明王，建国号大宋，改年号为龙凤，正式建立起农民政权。因起义军头裹红巾，故称“红巾军”，简称“红军”，又因烧香拜弥勒佛，又称“香军”。

与此同时，南方白莲教首彭莹玉（彭和尚）、徐寿辉也率众在蕲州起义，亦称红巾军，并立徐寿辉为帝，国号天完，年号治平。接着徐州李二、邓州王权、襄阳孟海马及濠州郭子兴等白莲教首先后率领起义，均称红巾军。河南江淮地区迅速成为“红军遍地”的世界。

至正十七年（1357年），北方红巾军领袖刘福通派关先生等率北路军挺进河北，派白不信等率西路军进军关中，派毛贵率东路军直捣大都（今北京），自己率军进攻汴梁。北、西、东三路义军势如破竹，转战山东、河北、甘肃、宁夏、四川、山西、内蒙古及今东北地区，沉重地打击了元朝的反动统治。至正十八年（1358年），刘福通攻克汴梁，并迁都于此，北方红巾军军事上的胜利达到了顶峰。但是，自至正十九年（1359年）以后，由于东路军首领毛贵被部下杀害，致使北方红巾军战局急转直下。又由于各路军各自为战，彼此不相联系，刘福通无法统一领导，相继被地主武装各个击破，致使刘福通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同年七月，汴梁失陷，刘福通、韩林儿突围退至安丰（今安徽寿县）。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安丰又被降元的义军叛徒张士诚攻破，刘福遭遇难牺牲。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

韩林儿又被朱元璋沉杀于瓜州江中。至此，北方红巾军全部败于地主武装和义军叛徒手中。

南方红巾军在徐寿辉的领导下，也如摧枯拉朽，横扫了元朝在南方的统治势力。至正十二年（1352年），红巾军攻占杭州，义军增至百万。至正十三年（1353年），彭莹玉战死瑞州（今江西高安），接着蕲州失陷，红巾军暂时受挫。到了至正十五年（1355年），红巾军转败为胜，声势复振。可是，此时红巾军内部发生了分裂。至正二十年（1360年），徐寿辉被其部将陈友谅杀害。陈自立为帝，国号“汉”，改元“大义”。驻守四川的徐寿辉属下明玉珍不从，自立为“陇蜀王”，国号“大厦”，以白莲教为国教。义军内部的争夺，削弱了自己的战斗力，给朱元璋重建地主阶级政权造成了可乘之机。

朱元璋出身贫贱，本为白莲教信徒。南方红巾军起义爆发后，他投奔郭子兴部当一名小兵。因巧于心计，善于逢迎，不久即被郭子兴加以重用，并于郭死后接管职权。至正十六年（1356年），他率军攻下集庆（今南京），称吴国公，开始逐步扩张势力。在南北红巾军与元朝军队浴血战斗之际，他审时度势，表面上尊奉小明王韩林儿为主，暗地里实行“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路线，先后打败了陈友谅、张士诚、方国珍，统一了南方义军各部。这时，他认为羽翼丰满，便撕去伪装，不但在形式上不再与小明王联系，甚至公开咒骂白莲教和红巾军，最后竟于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设计将韩林儿沉杀于瓜州江中。

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朱元璋派徐达、常遇春率领二十五万大军北伐。北伐军在北方红巾军为其铺平的道路

上所向披靡，席卷山东、河南广大地区，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正月，朱元璋在南京称帝，建元洪武，国号大明。是年八月，明军攻入大都，推翻了元朝。随后又出兵东北、西北及西南各地，依次剪灭了与朱元璋共同起义的白莲教组织，完成了全国的统一。由白莲教掀起的元末红巾军大起义的胜利果实，就这样被以朱元璋为代表的汉族地主阶级所窃夺。但是，“弥勒佛当有天下”却成为事实（尽管这个“天下”为朱氏家族占有），他们推翻了元朝的腐败统治，解放了被压抑近一个世纪的社会生产力，推动了历史的发展。

（二）“佛母”与“中兴福烈帝”

对早年曾为白莲教信徒的朱元璋来说，“弥勒下生，明王出”的信仰，曾鼓舞他为改变自己的悲惨命运而去参加红巾军推翻元朝统治的战斗。虽然历史造就了他，使他从一个放牛娃、游方僧而一步登天成为九五之尊，但白莲教对他的影响仍然是扔不掉抹不去，难怪他将新建的朱氏封建王朝命名为“大明”，自诩为“大明王”。正因这样，他更深知白莲教的造反意义，所以在他登基以后，便明令禁止白莲教，以保证朱明王朝的长治久安。

然而，白莲教所宣扬的是广大劳动人民寻求“现世解救”的理论，只要有剥削有压迫，不管是异族统治，还是汉族专制，这个理论就立即会把民众组织起来，化为巨大的物质力量，向剥削压迫他们的官府乃至皇帝老子开战。爆发于明朝初年的山东唐赛儿起义，就是白莲教策动的一场

著名农民革命。

山东地区在元朝末年受害最重，明朝初年，元气未复，战火又起。在长达四年的“靖难”战争中，建文帝与燕王朱棣为争夺皇位，双方在山东经常投入四五十万兵力，使山东人民深受兵燹之苦。朱棣夺取皇位后，迁都北京。为此，他不顾山东人民死活，大批征调民夫赴京修城。又强令修复运河故道，以保障南粮北运。山东地处运河要地，工程浩大，劳役最重。永乐十三年（1415年），黄河决口，山东首受其害，庐舍田禾被淹，广大人民无家可归，无粮可食，只能露宿荒原，以树皮、草根充饥。可是，明朝官吏照样逼税催科，鞭笞害命，使广大人民无路可走。正是在这种入祸加天灾，广大人民求生无门的严酷形势下，白莲教女首领唐赛儿率众起义，点燃了反抗斗争的熊熊烈火。

唐赛儿，山东蒲台县（今滨县东南蒲台）人，是贫苦农民林三（亦名林山）的妻子。她自称“佛母”，为益都、寿光一带的白莲教首领，在人民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望。永乐十八年（1420年）二月十一日，唐赛儿在益都卸石棚寨率领贫苦农民举旗造反，困于重役和饥饿的农民“以红白旗为号”纷纷响应，胶东各郡县顿时燃起了革命烽火。

唐赛儿以卸石棚寨为据点，亲率几千名起义军，不断出击附近官府和富豪，歼灭前来围剿的青州明军，鼓舞了各地义军的斗志，使革命烈火由胶东燃遍山东全境。在起义农民的打击下，各地官吏争相逃命，雪片一般地告急文书飞报京师。朱棣闻讯后，先是派人诱降，遭到义军拒绝。接着命安远侯柳升为统帅，率领戍卫京师的五千名“京营”兵卒前往围剿卸石棚寨。

在明军重重包围下，唐赛儿沉着果断，采取了声东击西、调虎离山之计，实现了突围胜利。突围后，唐赛儿分析了敌强我弱的形势，决定将义军分散隐蔽在人民群众之中，以保存势力，伺机再起。唐赛儿突围后，尽管明军对山东全境实行戒严，百般搜捕，但仍找不到她的踪影。对此，朱棣极为恐惧。传说唐赛儿“削发为尼”，“混处女道士中”。朱棣便下令在北京、山东境内，蛮横逮捕数万尼姑、道姑，押送京城严刑拷问，还是一无所获。人民群众就是这样用自己的生命掩护着自己的革命英雄，使明朝统治者无计可施，这充分说明了白莲教的深厚群众基础和力量所在。

唐赛儿起义虽只有一个多月，但影响所及却是深远的。从此，终明一世，各地白莲教起义连绵不断，仅见于记载的即不下四十余起之多。这些或大或小的白莲教起义，犹如涓涓细流，到了明朝末年，终于汇成涛涛大河，在山东、河北地区爆发了徐鸿儒大起义。

徐鸿儒，山东郓城人，为东大乘教信徒。万历时，东大乘教主王森因传教被官府逮捕死于狱中。王森子王好贤及门徒于弘志继续在河北武邑、景州一带传教，门徒徐鸿儒则在山东地区传教，先后二十年，信徒达二百万。

天启建元，山东大旱，民不聊生。明朝在辽东与金兵作战，从山东加派赋税，更激起农民的反抗。恰逢山东驻军被调往辽东，地方兵力薄弱，为起义创造了良机。天启二年（1622年），徐鸿儒与王好贤、于弘志联络，预定中秋节同时起义。因计划泄露，徐鸿儒只好于五月提前起义。徐鸿儒自称“中兴福烈帝”，建年号“大乘兴胜”。起义军以

红巾为标志，教徒纷纷献出家产，参加起义。起义军始而攻占鄆城，继而攻占邹县、滕县、峄县，最后攻占夏镇，切断漕运要道，乘胜围攻曲阜、郯城，声势大震。七月，于弘志在阜城、武邑起兵响应，进攻景州。赵大也在艾山起义，奉刘永明为安民王，并与徐鸿儒取得联系。各地义军日益壮大，众至十几万。

面对起义军的蓬勃发展，明廷命令各地招兵买马，组织地方武装应急，又将开赴辽东前线的粤军和准备开赴京师的秋操班留在山东对付起义军，天津、保定也派兵支援山东。在明军的进攻下，首先河北于弘志起义军被镇压，刘永明也被捕牺牲。接着，徐鸿儒在兖州被明军打败，退守邹县城中。徐鸿儒率众坚持到十月，城中粮尽，叛徒侯五、魏七缚徐鸿儒出降，明军占领邹城，义军四万七千余人被俘，徐鸿儒英雄就义。王好贤逃往扬州，后也被捕牺牲。

徐鸿儒起义失败后，白莲教徒并没有被斩尽杀绝，仍在山东一带潜伏活动，待机而起。崇祯六年（1633年），山东金乡王益伦再举义旗，自称“混元祖师”，徒众七八千。李自成起义军进军北京时，河北正定一带的白莲教组织积极配合，宣传“牛八（指朱明王朝）将尽”，“木子（指李自成）当来”，为李自成起义军大造革命舆论，显示了白莲教顽强的生命力和不屈不挠的反抗斗争精神。

（三）“清朝已尽”，“日月复来”

本来是诅咒“牛八将尽”，预言“木子当来”的白莲教，当满清王朝乘乱入关，问鼎中原的形势出现后，便又从汉

民族利益出发，打出了反清复明的旗帜，掀起了抗清斗争，而且这种斗争从清初开始，彼伏此起，从未间断，使得清朝统治者终日不得安宁，必加痛剿而后快。由于清初的满族统治者尚处于上升时期，并有八旗劲旅作为军事后盾，所以爆发于康熙、雍正和乾隆初期的各地白莲教抗清斗争都很快被镇压下去，尚不至于危及清王朝的统治。但是，自乾隆中期起，随着清王朝的日趋腐败和各族人民的日益贫困，白莲教的抗清斗争也从清初小规模的小规模聚众造反，发展为规模巨大的农民战争。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山东王伦起义首开其端，揭开了武装反抗清朝的斗争序幕。

王伦是白莲教支派清水教首领，平日行医传教，借以组织反清活动。经过二十多年的秘密活动，清水教在鲁西南一带得到很大发展。乾隆三十九年八月，清朝大量用兵金川（今四川西北部），不断加征钱粮，加上这年春秋二季皆荒，饥民遍野。贫苦农民无以为生，卖儿鬻女，纷纷逃亡口外谋生。而清朝又以东北是其“发祥地”为名，禁止灾民出关。在广大农民走投无路的情况下，王伦率领教徒举行武装起义，攻占寿张县城，自称“真紫微星”，设置元帅、先行、周公等官职。与此同时，另一清水教首领王经隆在堂邑县起兵响应，并率兵与王伦会合，起义军声势大振。九月，王伦率领起义军乘胜攻占阳谷、堂邑后，又进取临清。乾隆帝得知“馆穀南北，水陆咽喉”的临清被占，犹如清朝的脖子被卡住一般，非常惊恐，急忙调兵遣将，前往临清围剿。由于义军寡不敌众，经过三昼夜的血战，王伦在临清旧城陷落后，举火自焚，壮烈牺牲，起义失败。

这次武装斗争虽然只有一个月，但地当鲁、直、豫三

省之交，扼运河之咽喉，对清王朝的打击是沉重的。因此，清王朝在镇压王伦起义后，便加紧对各地白莲教的疯狂镇压。乾隆四十年（1775年），白莲教主刘松在河南传教被俘，流放甘肃。刘松弟子刘之协、宋之清、齐林等继续在四川、陕西、湖北传教，准备起义。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事泄，刘松、宋之清、齐林被害，刘之协在河南被俘。清政府急令河南、安徽、湖北等地官吏搜捕白莲教徒，“根除净尽，勿使漏网”。在清政府的疯狂捕杀下，到处可以看到白莲教徒的尸体。

清政府的血腥屠杀，更加激起了白莲教徒的反抗。刘之协在清军押解途中脱逃后，立即在河南、湖北、四川开展联络，准备起义。嘉庆元年（1796年）正月，湖北宜都、枝江等地白莲教徒在张正谟、夏杰人、刘鸣盛的领导下，首先揭竿而起。二月，刘之协、王聪儿（齐林妻）、姚之富等在湖北襄阳黄龙档起兵响应。十月，徐天德、冷天禄等分别在四川达州、东乡等地发动起义。接着，陕西安康的冯得仕、林开录等也奋起于山野之中。于是，川、陕、楚三省白莲教大起义全面爆发了。

面对这场波及三省的白莲教大起义，清政府大为震惊，急忙拨国帑调重兵分头围剿。起义军毫不畏惧，与清军展开了机动灵活的运动战，打得清军狼狈不堪。嘉庆二年（1797年）初，川楚两地义军主力在四川东乡胜利会师。东乡会师不久，为了摆脱清军的三面会攻，王聪儿亲率主力襄阳起义军，从川入楚，又由楚入陕再入川，打得清军损兵折将。对此，嘉庆帝一筹莫展，恼羞成怒，咒骂王聪儿是“贼中首逆”，决定再次调集重兵，围歼襄阳起义军。嘉

庆三年（1798年）三月，王聪儿在郧西境内的三岔河地区被清军重兵围困，虽誓死搏斗，终因敌众我寡，死伤惨重。最后，王聪儿、姚之富与十余名女战士登上山顶，相继跳崖，壮烈牺牲。

王聪儿牺牲后，襄阳起义军余部继续战斗，并很快与四川义军会师，在川、陕、楚交界地区不断打击清军，形成了又一次反清高潮。嘉庆四年（1799年），嘉庆帝一变以往策略，剿抚兼施，并凶狠地下诏各省“坚壁清野”、“筑寨团练”，这就给义军的流动作战造成了严重困难，再加上四川义军领袖先后牺牲，到嘉庆五年（1800年）夏，起义军从高潮时的数十万人锐减到数万人。尽管如此，起义军仍以流动战歼灭了大量清军和数十名清军将领，一直坚持到嘉庆九年（1804年）才最后失败。

爆发于嘉庆元年的白莲教大起义，历时九年，组织和发动了四五十万农民投入革命，纵横驰骋于川、楚、陕、甘、豫五省的广大地区，拖住了清朝十六个省的数十万兵力，歼灭了大量清军和几百名高、中级将领，大大地削弱了清朝的军事力量；这次大起义还使清朝耗费白银二亿两，出现了国库空虚、财政拮据的窘状，从而使白莲教倡言的“清朝已尽”的反清口号更加深入人心，清朝的迅速衰败已注定无疑。这正是川、楚、陕白莲教大起义的历史功绩。

川、楚、陕白莲教大起义的烈火刚刚熄灭，李文成、林清又在豫、冀、鲁三省点燃天理教起义的大火。

天理教，又称八卦教，是白莲教的一个主要支派，盛行于河南、河北、山东、山西一带。李文成，河南滑县人，排行老四，因他是木工，故入称“李四木匠”。他在贫苦农

民中传播天理教，宣传入教者缴纳“根基钱”（又叫“种福钱”），“事成偿得十倍，凡输百钱者得地一顷”，充分反映了贫苦农民对土地的渴求，深得民心，因此入教者甚众。李文成把“根基钱”用于补助贫苦农民，购买战马和铸造兵器，进行起义前的准备工作。

嘉庆十七年（1812年）十一月，李文成与林清在河北大兴县黄村会见，约定明年九月十五日在直隶、山东、河南同时起义。林清预定起义开始时偷袭皇宫，推翻清朝中央政权。李文成决定选派精兵，化装到京城助战。

嘉庆十八年（1813年）九月五日，起义机密泄露，李文成等天理教首领被捕入狱。李文成妻张氏，入称“李四嫂”当机立断，定计提前起义。九月七日，李四嫂亲率三千多名起义农民攻占滑县县城，救出李文成。李文成当即“升帅府，设羽帐”，被义军推为天王，下设人王、地王、军师、元帅、将军等，建立起农民政权。

由于清廷的严密封锁，林清不知李文成已提前起义，仍按原计划于九月十四派三百人分成两队，身藏武器混入北京城，潜居在酒楼茶肆之中。九月十五日，两队人马分别进入东、西华门，攻入紫禁城。在“隆宗门”外，义军与清廷护军展开搏斗，有的战士冲到了“养心门”，宫内一片混乱。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三十多名战士血洒皇宫，义军被迫退出紫禁城，袭击皇宫的起义失败了。九月十七日，由于叛徒出卖，林清在黄村被捕，供出义军内部情况后，被清廷杀害。

义军攻打皇宫虽失败了，但嘉庆帝却感到极大震惊，林清供出的义军内部情况，又使他战战兢兢，慌忙调派直、鲁、

豫军队开赴滑县，又调吉林、黑龙江马队前来助战。十月下旬，滑县被困。十一月初，李文成在突围转移辉县路上，与尾追的清军进行了殊死的战斗，最后怒斥清军招降，“举火自焚”，悲壮殉难。留守滑县的李四嫂，经过一个多月的滑县保卫战，于十二月初城破被俘，从容自尽。李文成、林清领导的天理教起义，至此失败。但这次起义给清朝统治者以沉重的打击，特别是义军攻打皇宫壮举，打碎了嘉庆帝“长期与吾赤子共乐升平”之美梦，以至每当提及，他总是心有余悸，惊呼：“此实非常未有之变”，“传之道路，骇人听闻！”

（四）“上帝教”、“义和拳”、“红枪会”

学术界普遍认为太平天国是洪秀全利用西方基督教组织和策动的农民革命。其实，撩开披在太平天国头上的基督教的面纱，显露在我们面前的则是白莲教的真面目。所不同的是太平天国所用宗教并非完全是传统的白莲教，而是洪秀全借用了基督教某些教义而创立的上帝教（拜上帝会）。

洪秀全在创立上帝教之前，曾学过白莲教。青年时期，他曾“以宣卷治病过日”。其他领袖人物在加入上帝教之前，也程度不同地接受过白莲教的熏陶。冯云山曾编过“妖书”、“经咒”。杨秀清是个信“妖教”的世家，他本人会降仙附体，萧朝贵也通此道。这些实践不能不给洪秀全等人的思想打上深深的烙印，自觉不自觉地渗透和影响到洪秀全创立的上帝教中。

在洪秀全创立的上帝教中，可以看到它的基本教义与基督教大相径庭。基督教主张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上帝教则宣扬在现实世界中应当做到“人人平等”；基督教寄托于死后灵魂升天堂，上帝教则憧憬今生的现实幸福；基督教主张现世的消极忍让，上帝教则鼓动积极的斗争精神。上帝教的这些基本教义均源于白莲教，即寻求现世的解救，从而鼓动信徒为实现这一目标去战斗。因此，洪秀全创立的上帝教，与其说是摭拾基督教的唾余，不如说是白莲教的升华更为确切。

其次，上帝教在入教仪式和礼拜时，也要献茶、献供、读愿忏文、焚黄表奏章。所谓《十款天条》也不外是“杀、盗、淫、妄、酒”的“五戒”之类。上帝教的节日里，也有二月二、三月三、九月九，从不庆祝圣诞节。洪秀全自称“天弟”下凡，称清帝是“阎罗妖”。金田起义前，上帝教按军事编制把徒众组织起来，同时建立了“圣席”制度：起义爆发后，义军以红巾包头作标志，表示与清朝势不两立。这些均不是来自基督教，都可以在白莲教的仪轨、规戒、节日及历次起义中找到蓝本。对此，清末文人汪堃在其所著《盾鼻随闻录》中也有过评价：“贼众赞美礼拜，崇奉天父，似窃天主教之唾余，捏称转劫救世，能知祸福，又以踵白莲教之故智，恣行簧鼓。观其举动，并天主教、白莲教之不若矣。”

在内忧外患，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日益尖锐的形势下，洪秀全等人利用上帝教把广大人民组织起来，于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十日（1851年1月11日）举行金田起义，正式建立太平天国，并于咸丰三年（1853年）三月定都南京，改

名天京，建起了一个与清朝根本对立的农民政权。在以后的十多年中，太平天国北伐、西征、东征，取得一系列军事胜利。由于领导集团的内讧，使太平军元气大伤，失去了乘胜前进，最后推翻清王朝的大好时机。同治三年（1864年），在清军与外国侵略者的联合进攻下，天京陷落，太平天国革命失败。

太平天国起义虽然失败了，但是它具有极其重大的历史意义。洪秀全等人利用上帝教组织广大人民，向腐朽的清王朝发动进攻，纵横驰骋十八省，占据半壁河山十四年，在中国农民革命史上谱写了灿烂篇章。它不仅大大地削弱了清王朝的统治力量，加速了清王朝的灭亡，而且推动了亚洲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正如俄国作家冈察洛夫所说：太平天国起义“像地震似的，香港、新加坡、印度、英国和美国都将同时感到”。

清王朝联合外国侵略者在南方血腥镇压太平天国三十六年之后，在中国北方又爆发了一场白莲教策动的震惊中外的反帝爱国斗争风暴——义和拳运动。

义和拳，又叫义和门，原叫梅花拳，本是一种拳术的名称。约从清康熙年间开始，白莲教的某些支派在习教的同时兼习拳棒，也有一些武术团体在习拳的同时兼习烧香拜佛，念咒诵经。经过近一个世纪的相互渗透和影响，到了嘉庆初年，义和拳便发展为不是单纯演习拳棒的结社了。他们在演习拳棒的同时，还要供奉神像，习念经卷，持诵咒语，烧香磕头，坐功运气，也就是说他们所演习的拳棒已经宗教化了。于是，义和拳便成为这种集武术与宗教于一身的秘密社会组织的代称，发展成为白莲教的一个重要

支派。

义和拳内部有文场、武场之分，文场念经练内功（气功），武场习武练外功（金钟罩、铁布衫）。文场极其秘密，掌握内部领导大权。义和拳的基层组织称“坛”，每坛有教师，称“大师兄”。入坛后，男称“大众”，彼此称“师兄”；女称“二众”，彼此称“姊妹”，在坛内地位一律平等。最高组织以八卦分为乾、兑、离、震、巽、坎、艮、坤八大坛。凡加入义和拳者，即须练拳诵咒，并由老师授以戒规，如犯戒就“符咒不灵，神不附体，不能避枪炮”。

义和拳的活动区域，主要在山东、直隶一带。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的严重形势下，义和拳挑起了反对帝国主义的重担，勇敢地抗击俄、英、法、日、意、德、奥八国联军对中国的侵略。它是继太平天国之后的又一场规模浩大的农民起义。它的不朽功勋，不仅表现在沉重地打击了清王朝，使其帝国主义走狗的丑恶嘴脸暴露无遗，而且重要的是粉碎了帝国主义企图瓜分中国的阴谋，向全世界显示了中国人民的巨大力量和中华民族的不可征服。

义和拳运动失败后，义和拳的战士们从京津各自回到自己的家园，一面务农，一面仍习武兼习教。为了躲避官府的追查，其名称也改为红枪会。

红枪会继承义和拳的组织传统，也以八卦编列组织，分八门传授。各门内部又分文、武团部，设文、武传师。文团部专管文件、财政及地方诉讼等事，武团部专管训练及排刀、排枪、符篆、降神等事。文传师传法设坛向四处发展，武传师率领弟兄出征。

在清末民初的大动荡年月里，红枪会发扬义和拳传统，积极投入反抗封建统治斗争。辛亥革命时期，河南兰考一带的红枪会，曾被革命党人改编组成敢死队，充任起义先锋力量。民国以后，红枪会得到迅速发展，成为华北地区的乡村自卫组织。它们抗拒盗匪，打击地主，保家安良，受到群众拥护。二十年代，红枪会从抗粮抗捐运动开始，又掀起武装斗争，以反抗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抗日战争爆发后，在民族危亡关头，红枪会奋起抗击日寇的疯狂侵略，成为一支重要的抗日力量。至此，白莲教完全结束了武装活动，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下 篇

民 间 结 社



从漕运水手的互助组织 到无恶不作的社会黑帮

(一) 青帮源流

青帮是清初以来流传最广泛、影响最深远的一种民间结社，它是在雍正初年漕运水手建立的行业性民间结社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在我国历史上，封建王朝要经常从水道即河道和海道调运大量的粮食，供给京师或接济军需，这就是漕运。

清朝入关后，承继明朝漕运制度，仍赖运河实行南粮北调，以供京城需要，清廷称之为“天庾正供”。清代的漕运数量很大，每年要调用一万二千多艘船只，雇募二三十万水手，从东南数省把四百多万石粮食运到北京。为了有效地管理和控制这么庞大的船队和众多水手，保证“天庾正供”顺利运到北京，清朝仿照明制，设立“漕运总督”一人，执掌整个漕政。漕督之下，又把各地漕运组织分成许多卫、所。卫、所是保护漕粮的军事组织。卫、所下面有联，联下是帮。这套组织又统称为“粮帮”或“粮米帮”。

每个卫、所都有名称，如苏松卫、杭州卫、严州所、金衢所等。下面的联，记载中不常见其名称。帮则与它们所属的卫、所名称统一，如江西卫四十帮、江安卫五十二帮等。但也有径称帮名的，如江淮泗总帮、兴武六帮、嘉白总帮等。每个卫、所设守备一人，每个帮设千总二人，此外还有一些武举“随帮效力”。每只漕船派旗丁或称帮弁、运弁十人，专门镇压水手闹事和保卫漕船安全。漕督、守备为管理漕运的高、中级官员，千总、旗丁则是直接统治漕运水手的下级官吏。

在这么一套严密机构的控制下，被雇募来的水手，在极为艰苦的漕运劳动中，犹如牛马任其驱使。特别是大小漕运官吏及其爪牙沆瀣一气，通同作弊，对上隐瞒虚报，对下克扣加派，再加上盗卖漕粮，走私盐斤，致使水手叫苦不迭，人民怨声载道。

面对这种严酷的压迫与剥削，广大水手是决不缄默的。因为充当水手的人大都是“赤贫穷汉”，又是“好勇斗狠之徒”，所以他们“声应气从，亦易齐心生事”。对此，清朝政府也采取了防范措施，规定水手一律由旗丁雇募，“令十船互保，有滋事不法者连坐”。这就给水手们的反抗斗争带来了严重困难。在这种情况下，水手们为了保卫自己的利益，便采取了秘密结社的形式，与官方进行斗争。这种结社是利用官方在各地的粮帮组织建立起来的，其名称也照旧，如江淮泗、兴武六、嘉海卫、九江帮等，凡是原来属于各帮的水手，均可加入这种秘密结社。

雍正初年，这种秘密结社首先在安庆地方的粮帮中建立，创始人为翁、钱、潘三人。翁即翁岩，江苏常熟人；钱

即钱坚，江苏武进人；潘即潘清，浙江杭州人。相传翁、钱、潘为罗教信徒，他们在创兴水手秘密结社之后，曾在帮内传布罗教；因而招致官方查禁和镇压。继翁、钱、潘之后，其他粮帮也纷纷仿效，逐渐推广开来。经过六七十年的发展，到了嘉庆年间，安庆地方的粮帮水手们在原来粮帮秘密结社之外，又独立地建立了一个秘密结社，取名“安庆道友会”，简称“安庆道友”、“安庆帮”、“庆帮”。

“安庆道友会”是一个较前利用地方粮帮建立的秘密组织更为健全的水手结社。为了尊大自己，区别其他，他们捏造了一套“道统”，把佛教的历代祖师达摩、慧可、僧璨、道信、弘忍、慧能尊为自己的祖师，并且煞有介事地说自己是佛教临济宗的支派。他们还拉来与其不相干的金幼孜、罗清、陆逵三人当作“前三祖”，而把翁、钱、潘作为“后三祖”。在组织上，他们的首领有专门称谓——当家、师父、老头、前人。加入安庆道友会的人，要按进来的先后分成二十四辈，即：“清静道德文成佛法能仁智慧本来自性元明兴理大通悟学。”（还有所谓后二十四辈：“万象皈依戒律传宝化度心回临持康泰普门开放光照乾坤。”这是晚近青帮分子所定，未及按此排辈，青帮即行消灭。）此外，他们还在水手们聚居或歇宿的地方，如靠近河岸的庵堂里，也有的在船上，摆设成一种“佛堂”式的场所，设上香案，供上祖师牌位，称做“香堂”。摆设香堂的船也各有名称，如“泰子船”、“老堂船”、“将军舟”、“太平舟”。又订立了一些条规守则，如“帮规十戒”、“十禁”等，令帮内经常奉行；编造了一套仪节，作为开香堂，收新人时使用；发明了许多隐语、手式、暗号，当做帮内秘密交通的标志与媒

介，称做“切口”、“令子”等等。

由于安庆道友会比较健全，在它成立之后的若干年中，原来地方性的粮帮秘密结社便被其吸引，陆续汇合到它的组织中去，因此它的声势也就日益壮大起来。大约在光绪年间，各地粮帮秘密结社，据说共有一百二十八帮半，即江苏省二十一帮、浙江省二十一帮、江广十九帮、湖南省十八帮、安徽省十六帮、松江府九帮、河南省九帮、直隶省一帮、桐船麻包四帮、山东省十帮半，全被联合统一进去。

为了适应统一的需要，名称也随之改变，“安庆道友会”便改为“安清道友会”或“安清道义会”，它的简称“安庆帮”、“庆帮”也就相应地改为“安清帮”、“清帮”，到光绪年间则自号为“青帮”了。由“安庆帮”而为“安清帮”，当然有“安定大清”之义。至于由“清帮”而为“青帮”，首先还是同音代替之故，也可能是与在它以后出现而又长期并存的“洪门”又称“红帮”的一种对称，即“青帮—红帮”，合称“青红帮”。

青帮早期组织曾有过经济互助与抗争官方的事迹。

漕运水手将漕粮从东南数省运到北京后，便返棹南归，称作“回空”。由于大小漕官及其爪牙的层层盘剥，漕运水手回空时常常是食宿无着。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青帮早期组织曾在杭州等地利用原来庙宇设立或新建一些庵堂，以供水手们住宿。庵外设有—些耕地，收获即归水手们食用，并设有义冢，水手死后就葬在那里。年老或丧失劳动力的水手，还可以进庵养老。

为了使水手们不致因犯错而失去职业，青帮早期组织

曾承担起保护水手的责任。如有时水手犯了错误被革或被通缉，他们就彼此收容和庇护，致使官方无可奈何，水手职业也有了一定保证。由于官方对水手们的勒索过重，青帮早期组织便常常策动水手们要求增加运费，如官方不应，就进行请愿或暴动。因为规模很大，直接影响漕粮能否顺利运输，所以常把大小漕官搞得焦头烂额，狼狈不堪。

青帮早期组织还发动水手们投入农民起义的洪流中。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山东临清王伦起义时，曾借重过漕运水手的力量。嘉庆年间安徽巢县白莲教首方荣升在长江下游各省传教，并酝酿起义，就有许多漕运水手参加。道光年间，青帮早期组织还常与地方上的盐民联合起来同官方作对。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爆发后，漕运被迫改由海道，原来的河运水手纷纷失业，以刘双印、孙化祥为首的水手迫于生计，铤而走险，成立“幅军”，分别在山东峄县云谷山、岐山建寨起义，震动了清廷。

青帮早期组织除了上述一些活动之外，还有另一重性格，即破坏乃至罪恶的方面。

首先，青帮早期组织的目的尽管是维护水手们的利益，但这终归是一种狭隘的小集团利益，而他们的天职却是为“安清”而去运输“皇粮”，这就在客观上起了“资敌”的作用。

其次，青帮早期组织既没有严格的纪律，更没有明确的斗争目标。有时固然也可以做些好事，但常常是劣迹多于善举，如在运输漕粮时，他们私带客货，冒渡关税，扰害民船，强横生事等。尤其是他们动辄群殴斗狠、行劫为非，以及在生活上任意花销、吸毒、聚赌等，给社会造成

很大危害。

最后，青帮早期组织中的那些“当家”们，大都是坏得透顶的人物。他们之中，有的就是漕运系统中或地方上的中下层官吏及其爪牙，如守备、千总、武举、文牍等等，有的则是被官方收买过去的水手。他们利用在帮里的地位，与官方合伙剥削压榨水手。除此之外，他们还立有“家法”，即私刑，在“香堂”里私立公堂，随意凌虐帮内的人，成为残暴的封建把头。

青帮早期组织的这种特性，随着时间的流逝愈演愈烈。当清末漕运停废，漕运水手连同青帮组织弃舟登岸，涌入运河、长江沿岸各大都市的时候，他们也就很自然地与各种黑暗势力一拍即合，迅速变成一种无恶不作的社会黑帮。

（二）青帮的“开香堂”、“法规”、“切口”、“问答”、“通漕”

1. “开香堂”

青帮成员间是师徒关系，“开香堂”是青帮收徒的一种仪式，并有“小香堂”与“大香堂”之分。

主持“开香堂”的称“主香”，一向由收徒者自任，另有执事十二人，计当家师（收徒者自任）、讲经师（传道师兼任）、陪堂师（引进师兼任）、执法师、护法师、巡堂师、执堂师、散香师、抱香师、福德师、知客师、站堂师。

凡是“空子”（帮外人）想进门槛（入帮），第一步须经过“小香堂”，又称上小香。事先，“空子”须请介绍人（不问字派，均可作介绍人）代投“小贴”，俟本师首肯，才亲向本师呈递正式拜贴，上开三代履历及本人年龄、籍贯、职业，由本师择期“开小香堂”。

“小香堂”又分两种，一种极为简便，不论香堂大小、人数多寡，可以随时随地举行，称为“临时小香”。其仪式，只写一张“翁钱潘三位祖师爷之灵位”，只用香烛一份，钱粮（孝敬本师的财物）黄表若干即可。先由申请入帮者向本师太、师爷、本师各行三拜九叩，再向引进师、传道师各行三拜九叩，行礼完毕，由本师、引进师、传道师传授本帮帮名、本身字派即算结束。

另一种稍具规模，香堂须有固定地址，人员须达数十名，称为“正式小香”。其仪式，要供“四海龙王”、“天地君亲师”、“翁钱潘祖爷”三个牌位，要用香烛三份、钱粮黄表三份，其他均如临时小香。

上过小香的称做“记名弟子”，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得到师父的认可，才能“开大香堂”，就是再一次向本师行参拜礼。只有上过大香的才能成为正式弟子，并从此有了“开法领众”（首次收徒）的资格。

“开大香堂”，又称上大香，或叫上大钱粮，为青帮中正式香堂，规模宏大，礼节庄严。民国以后，一般借帮中喜庆寿诞之时举行。大香堂的牌位有达摩始祖、历代佛祖、慧可祖师、弘忍祖师、僧璨祖师、道信祖师、慧能祖师、金祖、罗祖、陈祖、林祖、陆祖、翁祖、钱祖、潘祖以及三家历代过方（即已死）前人。香堂横幅用“义气千秋”四

字。对联一幅，上联为“安清不分远和近”，下联为“三祖传留到如今”。用烛台三对、香炉三座，供奉案上，当案又置檀香一炉。届时一律脱去背心马褂，除去帽子眼镜，鱼贯走进香堂，洗面漱口，肃立两旁，静候请祖。

首先由传道师点燃香烛，开坛请祖，面朝外跪，诵请祖歌，三叩起身，面向内至香案，一参三叩，跪诵悬挂诸祖歌，诵毕上烛。左右执堂师燃着一对斤烛，分左右送与上烛者。上烛者左手接右边烛，右手接左边烛，作交叉形，双手怀抱，口诵上烛歌。诵毕，左右执堂师上前接烛，左插于左，右插于右，如此进行四次。上烛者三参起身，再转向内跪，下参上香。抱香师将燃着之香送与上香者，上香者双手接香，口诵上香歌。诵毕，抱香师接香，插于香炉内，如此进行四次。请祖歌，悬挂诸祖歌、上烛歌、上香歌，其内容均为颂扬历代祖师与自我标榜。

以上仪式结束后，即行参祖大礼，即香堂上拜祖。首先请收徒者参祖，再请香堂十二执事参祖，参祖时依字派大小及资格深浅分先后，最后入帮弟子齐至堂前排成行列，一齐跪下，由传道师教授下参仪式。参祖后，将点燃之信香按入帮弟子人数分发，一人一支，并教授捧香之法：“双手合掌，将香夹在掌心，平胸端正，香与鼻直对，顺目，平视信香，腰挺，脚齐，细耳静听慈悲。”接着，自散香师开始，十二执事相继站立堂前，诵歌训词，歌毕词完，即退回原位。

这时，散香师请本师向入帮弟子发问：“你们是情愿进帮的？还是朋友所劝的？或是妻子所迫的？”入帮弟子齐答：“自己情愿的。”本师又说：“不来不怪，来者受戒，帮中各

事都要看重，不可看轻。帮规重似军令，自此以后，要谨守帮规，珍重礼仪，忠心报效国家，安分守己。”然后，本师自报本身三代（师太、师爷、本身）姓名、籍贯、职业、字派、别号、住址，以及本帮帮名、船只数目、旗号、所名与十大帮规，并致训词。引进师、传道师也依法自报并致训词。由执堂师将入帮弟子手掌信香一律收回，共同插在五只包头香炉内，将收回之散香包成五支包头香一转，紧紧靠拢，名叫“一心一意”，意即相护主香（本师之香），又谓“精诚团结”。至此，乃命入帮弟子叩三参起立。旋即送祖，仍由请祖者担任，面朝外跪，申表口诵送祖歌。送祖后，入帮弟子将钱粮黄表、祖师牌位均焚化，行三参乃起立，口称道喜，一场颇具戏剧性的开香堂表演到此拉上帷幕。

此外，还有特别大香堂与特别满堂香。二者与普通大小香堂仪式相同，只不过规模较大，不但增香至十三炉半，而且增加开坛词、铺芦席词、接驾炉词、上檀香词、扎根炉词、献茶词、请牵绳词、焚佛袋词，以及顶门、叫门、开山门、开钥匙、止静、赶香、回香、道喜等词。特别满堂香又增香至六十六炉半，其他则与特别大香堂一样。

以上是清末民初青帮中“开香堂”的仪式。到了三十年代，随着青帮的公开与组织的膨胀，其收徒不但愈来愈滥，而且仪式也日趋简化。如上海青帮大字辈张仁奎（号锦湖）建立的“仁社”，通字辈杜月笙建立的“恒社”等，不仅其组织成员多为军政人员、工商业者及知识分子，已改变了青帮原来的组织成分，而且入社手续非常简单，只要事先填一张祖宗三代的“履历表”，并备一份与本人身份、

财产相称的“入社费”，即厚礼，就可以面见当家，向其三鞠躬就算入社，成为青帮中人了。

2. “法规”

青帮有极为严格的法规，借以维系其内部森严的封建等级制与宗法制。青帮法规包括十大帮规、十禁、十戒、十要、传道十条与家法十条六个方面。下面分别介绍。

十大帮规：不准欺师灭祖；不准藐视前人；不准爬灰倒笼；不准奸盗邪淫；不准江湖乱道；不准引法代跳；不准扰乱帮规；不准以率为尊；不准开闸放水；不准欺软凌弱。

十禁：一徒不准拜二师；父子不准同一师；师死不准再拜师；关山门不准重开；徒不收不准师收；兄弟字派有高低；本帮与本帮引道；师过方代师收徒；在道不准诽谤道；香头低不难爬高。

十戒：万恶淫乱；截路行凶；偷盗财物；邪言咒语；讼棍害人；毒药害生；假正欺人；聚众欺寡；倚大欺小；烟酒骂人。

十要：孝顺父母；热心做事；尊敬长上；兄宽弟忍；夫妇和顺；和睦乡里；交友有信；正心修身；时行方便；济世怜贫。

传道十条：遵法律；孝双亲；敬神明；习正道；保身体；善改过；立品行；慎言语；务正业；戒嗜好。

如果违犯以上帮规、禁、戒、守则、信条，当家就要施用家法。所谓家法，是青帮当家为惩治帮内犯规之人而私自制定的刑法。青帮早期组织翁钱潘时代家法尚不完备，乾隆三十年（1765年）才逐渐成形，并有两种刑具，一为香板，又名黄板，樟木质，长二尺四寸，宽四寸，厚五分，长方形，上端有一圆洞，贯穿麻绳一根，板上一面写“护法”，一面写“违犯家规，打死不论”，常挂于香案右端，传说为翁钱潘所置。一为盘龙棍，又名家法，枣木质，长三尺六寸，厚一寸二分，上扁下圆，绘盘龙一条，龙口内有“钦赐”两字，正面写“护法盘龙棍”，背面有“违犯帮规，打死不论”八字，供奉在香堂左端，相传乾隆帝巡视江南时所赐，以后凡遇有违反帮规者，即以此棍责罚。

为此又制定家法十条：

初次犯帮规者，轻则声斥，重则请家法处治。再犯时，用定香在臂上烧“犯规”二字，并加斥革。如犯叛逆罪，捆在铁锚上烧死。

初次忤逆双亲者，轻则声斥，重则请家法处治。再犯时，用定香在胸前烧“不孝”二字，并加斥革。如犯逆伦罪，捆在铁锚上烧死。

初次不遵师训，妄言妄行者，轻则声斥，重则请家法处治。再犯时，用定香在臂上烧“顽民”二字，斥革。

初次不敬长上者，轻则声斥，重则请家法处治。再犯时，用定香在臂上烧“不敬”二字，斥

革。

初次以长上资格侵占帮中老少所有财产物件者，轻则声斥，重则请家法处治。再犯时，用定香在臂上烧“强夺”二字，斥革。

初次殴打帮中老少者，轻则声斥，重则请家法处治。再犯时，用定香在臂上烧“强暴”二字，斥革。

初次违国法所禁不道德之事者，轻者声斥，重则请家法处治。再犯重大罪时，用定香在臂上烧“莠民”二字，斥革。

初次诽谤仙、佛、菩萨以及一切宗教者，轻则声斥，重则请家法处治。再犯时，用定香在臂上烧“妄为”二字，斥革。

初次不务正业，专事敲诈、逞凶斗殴，不受规劝者，轻则声斥，重则请家法处治。再犯时，用定香在臂上烧“无义”二字，斥革。

初次犯奸盗邪淫，而伪造、虚构、诬裁，殃及帮中老少者，轻则声斥，重则请家法处治。再犯时，用定香在臂上烧“无耻”二字，斥革。

施用法时，还有一套仪式，先由犯规弟子的本师，会同传道师、引进师，或帮中著名前人几位，并传到本门弟子若干人，开设香堂，如收徒时的香堂一样。将家法（或板或棍）供于香案上。俟上香、上烛、请祖、参祖仪式完毕之后，由本师传犯规弟子进前参祖，即命跪在香案前，询问事由，或令他人对质，进前质问。等情节大白，本师

请护法、执法两师，或犯规弟子传道师、引进师等，议处应得罪名。再向犯规弟子询问是否心服口服，必俟承认后，乃请家法。由执法师向家法行三叩九拜礼，将家法棍顶在头上，口诵：“家法森严鬼神惊，乾隆钦赐棍一根。汝既犯规当责打，下次再犯火烧身。”念毕，即派人执刑。执刑人多为长辈或平辈，受命后，先进前参拜，跪接家法，顶在头上，立起站于左上首，并派执堂者二人站于犯规弟子左右，又派护法者二人站在执刑人左右，以资护法。乃由执法师吩咐犯规弟子向祖下三参，跪听宣布罪状，完毕即命爬卧红毯之上，双腿交叉靠紧。执堂二人揪住下身，护法二人揪住上身，由执法师传示责打几十家法。执刑人即向犯规弟子说：“我与你，一无仇，二无怨。今天你犯了祖师爷的帮规，我奉执法师命令，责打你几十盘龙棍，一要你心服，二要你情愿。”候犯规弟子答应心服情愿，执刑人诵词：“法师堂上把令行，手执家法不容情。谁人如把帮规犯，不论老少照样行。”念毕，即举棍责打。待打毕，又诵词：“祖传帮规十大条，越理反教法不饶。今天香堂遭惊戒，若再犯法上铁锚。”念完，将家法送交执法师，转陈本师置于原处。此时犯规弟子爬起，向祖三叩谢罪后，由二执堂扶至堂下休息，本师即行送祖礼，至此，施用家法仪式，才告结束。

以上所介绍的青帮法规，表面看来，似乎在惩恶扬善，极为岸然，实际上是当家们欺压、凌虐帮徒的工具。他们的“香堂”就是私立的公堂，“家法”就是私刑，他们可以随心所欲，任意处治不顺遂其意的帮徒。雍正七年（1729年）《刑部咨文》里，曾记录这样一件事：嘉兴帮的刘把式

指使他的徒侄赵玉，借口一件小事，对孟有德船上的水手严会生动用私刑，把他的左耳割掉。《刑部咨文》对此评论道：各帮水手结党后，“一切任其教主（当家）指使，捆绑烧炙，截耳割筋，毫无忌惮，为害殊甚，刘把式倡教感众，赵玉藐法纵虐，孟有德附党作恶，均属恶性，风不可长”。这种风气一直保留到民国时期。例如抗战胜利后，天津双议成脚行把头号称“四霸天”的青帮头子王家保兄弟四人，曾因工人抗议其剥削工资达百分之九十且常拖欠之事，而“将工人刘保玉、杨志、姚明寿、崔小冬、赵天斌、大群等六名，手足捆绑，倒悬马棚，鞭棍交加，神魂数绝。经工人亲属再三跪求，何二说项，立誓悔改，始释绑饶命”。至于帮徒因触犯帮规或得罪了当家，因而被暗中处死的，也屡有发生。可见青帮法规实际上是一部充满血腥味的封建私刑。

3. “切口”

由于青帮是一种秘密社会组织，为了帮内彼此交往而又不致暴露，从其建立伊始就发明了许多隐语暗号（黑话），称为“切口”或“令子”。但它又因帮因时因地因人而异，兹举一般通用的“切口”，分类介绍。

帮内称谓与交往时所用“切口”：

三家——翁、钱、潘三家祖师。

前人——师傅，又叫老的、老头子、当家。

师太——师之爷、师之祖，统称师太。

师爷——师之师、师之爷，统称师爷。
师娘——师之妻。
娘娘——师之妾。
亲阿叔——师之弟兄。
小老大——师父所收弟子中的最后一个，又
称关山门徒弟。
大师兄——师之子。
大师姐（妹）——师之女。
弟老——徒弟，又叫小的。
小弟老——徒孙，又叫小三。
末弟老——重孙，又叫小小。
爷们——上下谈话时彼此相称。
老大——平辈相称。
小爷们——晚辈之称。
家里——同帮人称呼。
在家里——在帮，又称沾祖灵光、沾咸味、上
钱粮、有门槛。
家里爷们——帮中人自称。
老帮——恭维在帮多年资深者，又叫老帮四
卫。
同山弟兄——同门，又叫同参弟兄。
会下——名下。
孝敬——押牒之钱，又是供奉师父财物之称。
家磨——训诫。
帮讳——所在帮之名号。
帮头——所在帮之名称。

- 道情——帮中历史及规模。
 断香——师徒中途失散。
 过方——帮中人死之称。
 打招呼——通知、宽慰、赔礼之称。
 讨慈悲——口头训练，徒弟求指导之语。
 走帮道——子孙兴旺。

帮内收徒时所用“切口”：

- 开香堂——收徒仪式，又叫摆香堂。
 小弟子——记名碟子。
 上小香——小香堂，又叫记名香，上小钱粮，
 上对小香的为记名弟子。
 上大香——大香堂，又叫上大钱粮，正式入
 帮。
 开山门——第一次收徒。
 闭山门或关山门——最后一次收徒。
 赶香堂——参加观礼。
 孝祖——叩拜祖师。

区别帮外所用“切口”：

- 家外——不在帮。
 空子——帮外人。
 伪帮——冒充在帮。
 连毛僧——未上钱粮。

帮内法规及惩治犯规弟子所用“切口”：

难过——不和睦。

隔帮不叙——大房中人不与二、三房中人谈道情。

脱节——做错事。

爬香头——已拜师取得辈份的帮分子又拜更高一辈师父取得高一辈的身分。

扒梯子——以小称大。

顶香炉——反对前辈收徒，在香堂将香炉顶去。

还小帖——前人开除弟子帮籍。

帮外活动所用“切口”：

开码头——出门求财。

有风火——有危险。

避风光——避开。

湾船——停止不走。

江湖——空手求财之人。

老江湖——久在外奔走之人。

破生意——不正当营业。

软招——和平谦让之江湖生意。

硬相——以暴诈财。

保牛子——保护未在帮之人。

小刁码子——袖手旁观之人。

相夫——江湖人。

驾相——替相夫鼓吹而又拥护相夫。

不相架——与相夫为难，又叫嗷相。

吃相——靠江湖人衣食。

避风头——受人告发而逃。

大锅伙——聚集同党。

赌软把——以术赌博骗取钱财。

拉网——伪称喜丧庆寿，大宴宾客，强人送礼。

挑头——聚赌抽头。

开销——分发贿赂及酬答同类。

兜得转——交游广泛，又叫跑得开。

湾脚码头——结交异性弟兄。

吃斗——横蛮无惧。

采荷——赴上水，奉迎权贵。

赴蟠桃——赴会。

4. “问答”

“问答”是青帮中人初次见面时互相盘问的一种对话，如对答如流，即视为帮中人，否则视为“空子”。

兹举一例，假设通字派问答。

问：贵帮头？

答：江淮泗。

问：贵字派？

答：通字。

问：令尊师尊姓上下？

答：敝家师姓某上某下某。

问：令师爷尊姓上下？

答：敝师爷姓某上某下某。

问：令师太尊姓上下？

答：敝师太姓某上某下某。

问：请问老大贵姓？

答：者遂即起立垂手：好说，敝姓潘。

问：请问，还是本姓潘？头顶潘？

答：头顶潘。

问：老人在帮？

答：沾祖爷灵光。

问：老人在会？

答：好说，沾点盐味。

问：请问老大贵庵？

答：黄氏庵。

问：请问老大占哪个字？

答：好说，兄弟占通字。

问：香头多高？

答：二丈二。

问：香头多重？

答：二两二钱。

问：身背几炉香？

答：二十二炉。

问：头顶几炉？

答：二十一。

问：手挽几炉？

答：二十三。

如果问者至此不再盘查，就将答者视为帮中人结交。如再详细询问帮名、船只、旗号等事，答者应一一回敬，本书因篇幅问题不再赘述。

5. “通漕”

“通漕”，又叫“金不换”，是青帮内部的秘密典籍。一般在帮内开香堂时由前人授与徒弟，只许帮内流传，不许帮外人知晓。

“通漕”的名目与版本很多，如《学道须知》、《三庵宝鉴》、《道义真经》、《意气千秋》、《少长咸集》、《三庵全集》、《清门考源》、《安庆粗成》、《青帮通漕汇海》、《安清仪规》等，全系内部印刷或抄本。

以《清门考源》为例，其内容分为：青帮源流、漕运沿革、粮船制度、粮帮组织、粮帮分类、八省调兑、香堂规范、青帮法规、家庙传录、帮中杂志、山海河洛、问答要义、各项切口与乌言，以及家里知闻录等。其他名目的“通漕”，与上述内容大同小异。“通漕”可以视为了解青帮的必读书籍。

（三） 民国时代的“青帮世界”

民国时代，青帮急剧膨胀，在许多城市形成“青帮世界”。

清朝末年，随着近代工业的勃兴，内河外海的运输工具，逐渐由轻快的汽轮取代笨重的木船，再加上京汉、津浦、沪杭三条铁路的修成，大大地提高了运输功效，致使传统的漕运制度被迫退出历史舞台。靠漕运为生的水手们连同他们的组织青帮不得不脱离习惯多年的水上生涯，转而向运河与长江沿岸的大码头、大商埠中谋求生存与发展。

对弃舟登岸的漕运水手及他们的组织青帮来说，近代都市生活是一个既向往又陌生的世界。要想在这里站稳脚跟，并像昔日那样据有自己的活动领地，必须要寻找新的靠山。近代都市藏污纳垢，举凡走私、贩毒、窑娼、赌场、绑票，以及地痞流氓、土棍恶霸泛滥成灾，而青帮本身的恶根性，决定它很容易与这些黑社会的罪恶活动一拍即合，作为自己的营生手段。但要攫取并垄断这些非法经营，决非易事，必须要强大的势力。正是在这种形势使然、本性使然、利益使然的推动下，青帮步入都市后，便以咄咄逼人的气势，立即依附外国势力，并以租界为“根据地”，一变传统的组织形式，大开山门，广收帮徒。到了本世纪二十年代，终于在运河与长江沿岸的大中城市如上海、天津、北京、济南、南京、镇江、扬州、芜湖、安庆、九江等地形成了强大的青帮势力，并如愿地包揽了这些城市的所有非法经营。

青帮势力的崛起，引起了军阀官僚的注目。他们争先拉拢，以为己用。大军阀韩复榘曾拜上海青帮大字辈当家张仁奎为师。张仁奎不为军不在党，韩复榘为何要屈尊为徒呢？韩的入帮介绍人葛光庭一语道破了天机：“韩复榘拜了张老太爷，他就可以自开香堂，自立门户了！”显然韩入帮的目的，是为了借青帮为号召，扩张自己的势力。奉系军阀褚玉璞主政天津时，曾拜由济南来津的大字辈当家厉大森为师，并封厉为军警联合督察处处长，借以巩固他在天津的统治。除此之外，著名的军阀官僚吴佩孚、李景林、张宗昌、江朝宗、袁克文、姜桂题、杨宇霆、陈调元、王占元、张之江等都同时是青帮中的著名当家。

青帮势力的横行，也使富商厂主、银行与企业家及江湖艺人不寒而栗。为了避免青帮的骚扰与祸害，他们纷纷托门烦窍，手持重礼，祈求入帮，使自己置于青帮的保护伞下。二十年代末，上海滩曾发生了一起中国国货银行总经理朱成章被绑身死案件，轰动了整个上海银行界与实业界。此事一出，银行界与实业界人人自危，筹商应付办法。结果请出青帮当家张仁奎出来“压邪”，才算平静。银行界与实业界由此得出教训，不少人辗转托人拜在张氏门下，因而得到庇护。正如大和轮船公司买办朱筱竹所说：“像我这样吃水上饭的人，三教九流，无所不有，没有张老太爷的牌头就玩不成了。”艺名为“麒麟童”的京剧艺术大师周信芳，早年为反对天蟾舞台老板青帮分子著名恶霸顾竹轩的盘剥，曾拜黄金荣为师，才使自己躲过顾的暗算。

青帮势力的不法，又受到了游荡于社会上的地痞流氓与封建把头的敬仰。他们拜师入帮，为的是仗势称霸、仗

势欺人、仗势干伤天害理的黑营生。这类人在青帮中人数最多，为害最大，是青帮势力的主体。天津著名脚行把头袁文会与巴延庆拜通字辈当家白云生为师，使他们如虎添翼，在天津卫的罪恶活动罄竹难书。上海知名流氓法租界粪大王马鸿魁，大包作头谢彬衡、好莱坞赌场老板朱顺林、烟土贩子刘怡章、大世界总管闵采臣等投在黄金荣名下为徒，倚仗青帮势力无恶不作，令人发指。

青帮正是通过这种背靠外国势力，一手牢牢把持下层社会，一手积极向上层社会攀援的方式，使自己的组织急剧膨胀，造成了民国时代的“青帮世界”。

国民政府建都南京后，除了对少数青帮上层人物加以笼络外，对整个青帮势力却存在戒心，生怕其形成盘根错节的全国系统，将来难以驾驭，因此迅速制止了中华共进会的重新组合，并表示禁止会党。而此时的青帮内部也已涣散到了极点，它的帮规、戒律及以字辈衍传的等级制度均已失去了原来的魅力。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青帮中的上层分子别出心裁地创立了一批“社团”，想以此掩盖臭名，集聚势力，重振威风。1932年，杜月笙首先创立恒社，接着仁社、升社、怡社、逸社、文社、畅社、荣社等接连出现。这些社团以俱乐部联谊的形式为外衣，实际上是青帮的变种。社团内的上下之间，不仅仍是封建的师徒关系，而且入社时还要行拜师礼，要绝对服从师傅的个人意志，并且由师傅指定入社之人及社内干部，如仁社的正副理事长、理事、社员均须张仁奎圈定。张的门生不下三四千人，但够格的只有二百余人，他们均是武职校官以上，文职简任、荐任以上及社会名流资

本家等体面人物。

这些社团均获得政府同意备案，它们周旋于租界与“华界”、国民政府与殖民当局之间，将触角伸展到政府、工商、军队、慈善、文化等社会各领域，人数达数十万之多。其中既有高官显宦，也有富商巨贾，最多的则是工人、职员及下层市民，形成了空前的组织和势力。由于成员的复杂及青帮形式上的变化，决定了这些社团所进行的事业也有所改变。除大部分仍在从事非法经营外，也有一些渗透到社会其他领域，因此对整个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诸方面都产生了极大影响，“青帮世界”的地位非但没有削弱，反而大大加强了。

抗日战争爆发后，各地青帮头子大多附逆，成为日寇侵华帮凶，“青帮世界”面临千夫所指的境地。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青帮终于相继解散或自行消亡。

（四）上海青帮大亨

1. 黄金荣

早在漕运停废前，上海就是青帮时常光顾的都市。清咸丰至光绪年间，居沪的青帮元、明、兴、理字辈的人物已有不少，并开始进行帮派活动。清末漕运停废后，青帮开始大规模涌入上海，至民国初年，大字辈当家已有数十位。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到本世纪二十年代，青帮势力急

剧膨胀，不但完全控制了上海的整个下层社会，而且积极地向社会上层发展，一些青帮头子也因此变成腰缠万贯，拥有很多企业、银行、房地产的大亨、阔老，其中发迹最早的便是黄金荣。

黄金荣，清同治七年（1868年）生，祖籍苏州。同治十二年（1873年）随父母移居上海南市张家弄。青少年时代，生活比较清苦，曾在张家弄附近庙宇孟将堂内打杂糊口，后又到城隍庙“萃华堂裱画店”当学徒。由于他生性刁顽，善于投机，在学艺期间，便涉足黑社会，与城隍庙一带的地痞流氓和青红帮分子混得很熟，为日后发迹打下了基础。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黄金荣经过在法租界巡捕房当翻译的陶某保荐，当上三等华捕。不久，又因陶翻译的推荐，黄金荣当上了包打听领班。从此开始了他的发迹史。

黄金荣当上包打听领班后，被法国捕房派到十六铺码头一带管理治安。为了博得法国人的赏识，他进一步有意识地结识与网罗当地的地痞流氓和青红帮分子，玩弄了许多“贼喊捉贼”、“假戏真做”的伎俩。他常常是一而布置一批小流氓，约好某月某日在某地抢劫作案，一面指使另外一些小流氓到法国捕房“报案”，他再向法国警探“报密”。到了约定的时间，原来约好的那批流氓果然在抢劫作案时，被他亲自带领的包打听一网打尽。这些小流氓被关进法国捕房后，他又在内部打点，陆续把他们释放。如此这般，黄金荣连续“破案”，逐渐赢得了法国人的信任。

黄金荣还用同样的方法，对上海的一些商店老板和富翁、财主进行敲诈勒索，迫使许多商店老板和富翁财主把

他奉为护法神，每逢年节乃至按月给他送钱、送礼。对于那些著名的富翁，他甚至采取绑架的办法，大肆敲诈，如唆使其心腹徒弟丁永昌绑架荣德生，一下子就敲诈了几十万美元。黄金荣就是用这种卑鄙的办法，既骗取了法国人的信任，又聚敛了大量钱财，可谓一箭双雕。

在黄金荣一生中，最使他得意并由此飞黄腾达的契机，则是侦破了一件法国姚主教被绑巨案。1923年5月，法国姚主教从上海乘火车到天津传教。当火车驶至山东临城时，被军阀张宗昌部下拦劫绑架。案件发生后，轰动了国内外。法国驻沪领事限令巡捕房火速破案，将姚主教营救出来。在法捕房所有侦缉人员无计可施之际，黄金荣却通过一个普通的扒窃案而获得了侦破线索。他顺藤摸瓜，只用了几千元费用，先是打听到关押姚主教的地方，继而买通少数看守人员，最后亲自带领几十个便衣，化装成了张宗昌部队的官兵，将姚主教营救出来，安然返回上海。由于侦破此案，使法国人对他更加信任，破天荒地提升他为法捕房首任华探督察长，并专派八个安南巡捕作为他的护卫。从此，他的权势越来越大，名气越来越响，成为上海滩上第一流大把头。

虽然黄金荣是靠着法国人的赏识和青帮势力的支持而发迹的，但他却从来未正式拜过师，是青帮中的“空子”。对此，黄金荣根本不予理睬，特别是他当上华探督察长以后，更是气焰嚣张。他敢与上海青帮“大”字辈的张镜湖、曹幼珊等老头子称兄道弟，对人自称是“天”字辈，比“大”字辈还多一划。不仅如此，他还以一个无祖无师的“空子”身份收受门徒，虽说违背帮规，但因他位高势大，

帮内对他也奈何不得。他收受门徒，从不举行开香堂仪式，只要徒弟写张拜师帖子，送上钱财礼物，即可成为黄门青帮弟子。通过这一途径，黄金荣聚敛了大量钱财，而且网罗了一大批地痞流氓、军阀政客，形成了以他为老大，老二王柏龄、老三杨啸天、老四张啸林、老五杜月笙、老六孙祥夫、老七陈希曾、老八陈群的所谓“八大股党”的青帮势力。

黄金荣的青帮势力确立后，早期的那种“假戏真做”、“贼喊捉贼”的生财手段，已不能满足他的聚财欲望，于是他凭借法国人的支持，利用他手中掌握的青帮势力，公开干起了鸦片保险与开设赌场的非法经营。

民国以来，鸦片流毒全国，上海是贩运鸦片的主要集散地之一。当时，上海贩卖鸦片的生意，主要操纵在广东潮州帮手里，靠贩卖鸦片发家的大商号有郑洽记、郭源茂、同昌等。那时码头上有一批专靠在水中以偷盗为生的流氓，他们常常在鸦片运向码头途中，将驳船弄翻，使鸦片沉入江底，然后再将沉在水中的鸦片捞起，用驳船偷走，有时运到码头上的鸦片也会被窃。这些盗窃勾当使郑洽记等鸦片商号大伤脑筋，租界捕房虽然指派巡捕日夜巡逻看守，但无济于事，甚至连巡捕也常告失踪，第二天发现尸体浮在黄浦江上。对此，法捕房曾指定黄金荣设法破案，因这些盗窃勾当均是“八大股党”的徒子徒孙所为，所以他只能拖延敷衍，但此种态度终非长久之计，于是他便和杜月笙、张啸林等商量，决定组织一个公司，像保险公司那样收取保险费，做鸦片生意的商号，将鸦片向公司保险后，由公司发给盖有印戳的保险凭证，如被盗窃即由公司赔偿。所

定保险费为鸦片价值的百分之十，每箱鸦片价值数千元就要付数百元的保险费。这样一来，这个保险公司便成了总揽上海鸦片运销的“总公司”，而潮州帮的十大烟商，以及其他帮派的十家大土行实际上变为它的“子公司”。这个“总公司”，就是1925年7月成立的“三鑫公司”。何谓“三鑫”？即“三大闻人”合资兴办并“日进斗金”之义也。由于黄金荣身为华捕督察长，算是官方人物，不便公开出面，就叫杜月笙担任三鑫公司经理，张啸林与范回春任副经理，并安插了他们的几百名徒子徒孙挂名为检查员。

黄金荣虽然没在三鑫公司任职，但他却利用在法捕房的权势，安排捕房派几百名安南巡捕，开出警备车，声势浩大地到处巡逻，公开到码头上保护和押运鸦片进入库房。黄金荣通过这种手段，使三鑫公司的年收入达到数千万元之巨。他把攫取的巨额暴利按大三股、中六股、小八股进行分赃。大三股就是黄、杜、张三人，每人每年可得数十万元，中六股是他们的六个同伙，小八股是黄、杜的几个大徒弟。除此之外，当然要拿出一大部分赃款贿赂法国人和驻沪中国官员，还要分出一部分给他们的徒子徒孙及在帮的新闻记者。

尽管三鑫公司利用青帮势力公开向鸦片商人索取巨额保险费，而鸦片商人还是将其视为保护伞。这主要是因为三鑫公司索取保险费时，不但由该公司盖上条戳，而且有法捕房开出的收条，并加盖戳记。这样一来，既平息了鸦片经常失窃事件，收到了“保险”的效果，又使鸦片生意由秘密转向公开与合法，也可以使鸦片商人从明目张胆地扩大鸦片生意中捞回因缴纳保险费而失去的暴利。正因为

如此，致使上海烟馆林立，成为戕害人们身心健康的一大社会公害。

黄金荣的另一聚财之道，就是开设赌场。三鑫公司成立之后，黄金荣便与杜月笙合伙兴办了一座名叫“高级俱乐部”的赌场，场址设在福煦路181号。这座赌场地点适中，环境幽静，是幢较大的花园洋房。开办之初，只是当做三鑫公司成员的俱乐部，后来扩展到与三鑫公司有关的员工家属及上海一些阔老财主的俱乐部，最后只要有钱或认识俱乐部的任何人员都可以进去赌博。他们在赌场门前，派有十几个人携带手枪保护。铁门经常关闭着，只有认识的汽车才能直开进去。对不认识的人还要搜身检查，害怕有人暗藏炸弹等物进去闹事。对前去捣乱的小流氓，轻则殴打，重则杀毙。

进赌场以后，赌客便向帐房换筹码，从一元到一百元不等，主要是轮盘赌，还有单双、大小、回门摊、麻将、扑克等，可以说是中西赌具一应俱全。赌场赌面相当大，一次输赢都是几百乃至万元。赌场除靠赢钱外，还用见十抽一的办法抽头，一千元只要输出赢进十次就被抽空了。

此外赌场设备齐全，免费供应上等中西大菜、高级烟酒和上等鸦片，休息时可以大吃大喝，还可以免费乘小轿车回家，以此来招睐赌客。对外埠大赌客，当他们把钱输光以后，赌场还照例代购车船票，好让他们回去拿钱再来赌，同时也可免得他们在赌场寻短见或耍赖皮。

他们还在赌具上大做手脚，如在赌台里使用灌铅的骰子，轮盘下安放吸铁石等，因此凡是来此赌博的人，十有八九被他们掏空衣袋而归。即使有人偶然赌胜，一旦走出

大门，也会被人跟踪，用“抄靶子”、“剥猪猡”等办法把钱抢走。有时他们甚至勾结法捕房，玩弄突然捉赌的把戏，把赌客的钱财诈走。黄金荣就是采用这些明抢暗夺的办法，每年收取不义之财达三、四十万元之多，再加上鸦片保险的豪夺，使他迅速成为名闻上海的百万富翁与青帮大亨。

黄金荣成为青帮大亨之后，为了巩固和保护自己的地位和既得利益，便极力向社会上层发展。南京政府建立后，黄金荣被委任为国民政府参议，并奖给勋章，实现了他进入政界的美梦。

然而，这既是黄金荣一生中的顶峰，也是他走下坡路的开始。进入三十年代以后，随着杜月笙的崛起，年迈体衰的黄金荣逐渐退居幕后。正因为如此，当抗日战争爆发后，黄金荣为怕落个汉奸臭名而被人谋刺，始终没有公开附逆。黄金荣于1953年病逝上海，终年八十五岁。

2. 杜月笙

杜月笙，后改名镛，月笙易作别号。清光绪十四年（1888年）生于上海浦东高桥。杜父母早亡，由舅父收养，童年时代即染上赌博恶习。杜十五岁时来到上海，在十六铺的一家水果行中当学徒，因结交歹徒，嗜赌成性，很快被老板撵走。杜过了一段“瘪三”的流浪生活后，被一花烟间收留。在这里，他结识了众多混迹其间的黑社会人物，并拜陈世昌为师，列入青帮“悟”字辈。

杜月笙向以机灵诡诈过人著称，因此在他进入青帮不久，便被已经发迹的黄金荣之妻看中，召留在黄公馆。杜

进入黄门后，先是做黄金荣的拿衣提包随从，接着充当为黄向烟花间、燕子窝、赌台收取“月规钱”的打手。由于他机警干练，终被黄视为心腹，委以主持提运鸦片的重任。当时的上海，是东南鸦片非法交易的主要市场，抢劫鸦片也成为各个流氓团伙的重要发财之道。鸦片商们为了确保运输安全，纷纷以重金委托一些较大的流氓团伙保价承运。大约在1917年左右，黄金荣也开始插手这一收入丰厚的肮脏营业。由于黄身为法捕房包打听领班，不便公开主持这一活动，于是就让杜月笙出面负责。杜纠合了一批凶悍的同伙，上靠黄金荣的保护，外依张啸林的军阀关系，很快在鸦片提运队伍中异军突起，到1923年杜月笙已成了上海最有势力的鸦片提运者。1925年7月三鑫公司建立之后，杜月笙又被黄金荣推任经理，掌握了该公司的实权。不久，他又出面主持与黄金荣合办的上海最大赌场“高级俱乐部”。至此，杜月笙在为黄金荣打天下的过程中，不仅以其才干和功劳赢得了黄金荣与其他同伙的信任和尊重，还与黄金荣等七人结拜为“八大股党”，而且自己也结纳了一批死心塌地为他效劳的党徒，形成了自己的势力，并由此聚敛了大量不义之财，开始与黄金荣分庭抗礼，成为上海滩仅次于黄金荣的青帮大亨。

与黄金荣不同，杜月笙发迹后，他的着眼点不只是为了聚敛钱财，而是野心勃勃，具有强烈的权势欲。为此，他审时度势，不仅继续依赖法国人的保护，而且积极寻机跻身政界。他广结政界权贵，对于失意党棍、政客，也以谦逊态度结纳。在结交过程中，他因人而异，位高权重者，不惜工本，曲意奉承；年轻的党棍、政客，则一律收入门下。

对那些老牌的失意政客，他也愿月奉规银，养为食客。到30年代初，连上海市党部及淞沪警备司令部、市公安局、市社会局中的部分上层和下级官员也纷纷成为杜门中人。杜月笙通过这些形形色色、背景各异、价值不同的政界人物，在上海织成了一张几乎无所不在的政治关系网，1931年，杜月笙举行杜氏祠堂落成典礼时，许多政府要人，以及段祺瑞、吴佩孚、徐世昌、张宗昌领衔的北洋各系军阀头目，前清遗老李准、郑孝胥，以及各国驻沪领事都送匾或亲临祝贺，排场之大，空前绝后，可称是杜月笙对自己政治能量的一次大检阅。多年以后，杜月笙每当谈起此事时，仍得意万分，引为自豪。

杜月笙在政界取得如此巨大成功之后，又开始打人工商金融界。他凭借自己的政治能量和青帮势力，很快成为拥有几十个企业、同业公会的董事长、理事长、常务理事、董事、理事、监事头衔的“现代实业家”。其实杜月笙向工商金融界发展的主要目的并不是真搞实业，而是为了扩大自己的社会影响。他在工商金融界的头衔尽管多得惊人，但实际资本始终有限。即使在他创办的中汇银行中，所占股份也不及徐懋棠，而且该行主要是为赌场、鸦片贸易和金融投机服务，正当营业并不发达。他的收入，主要还是来自赌场、贩毒、门生孝敬、向富商敲诈及以“透支”为手段勒索银行。他所有的资产，还不到二百万元，而且其中大部分是房地产。为了扩大社会影响，杜月笙还想方设法钻进新闻界。他是上海《申报》的董事长、《新闻报》的董事、《中央日报》的常务董事，利用这些报纸作为他的舆论工具，替他吹捧。

杜月笙在向政界、工商金融界发展的结果，使他的青帮势力发生了变化。官吏、资本家、知识分子等有正当职业和社会地位的代表人物中，越来越多的人成为他私人势力的中坚和借此自重的依靠力量。为了适应这一变化，杜月笙于1932年11月成立了类似社团的“恒社”，想以此种形式来维系这批远比一般流氓有用的徒众，进而巩固他的大亨地位。

经过苦心经营，杜月笙终于如愿以偿，成为30年代上海滩上具有超级政治能量、空前绝后的闻人大亨和令人生畏的人物，常常处在居高临下的主动地位，显示出具有异乎寻常的排难解纷的能力。社会上的许多棘手纠葛，如劳资争执、商界纠纷、名人桃色丑闻、金融界风潮等；只要杜月笙“闲话一句”，便能立时解决，其权威甚至超过了当时的上海市长吴铁城。

正因为杜月笙在上海具有如此大的权势，所以各种政治力量都以能得到杜月笙的庇护和帮助为幸事。而出身卑贱、时感自卑的杜月笙，也总以能得到上流人物的拥戴，获得对地方政治的发言权引为荣耀。因此，当上海民族资产阶级在“1·28”抗战期间成立被人称为“最具力量”的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时，杜月笙便毫不踌躇地参与其事，并被推为第一副会长，成为各方拥戴、名正言顺的上海地方领袖。

为了维护自己的地方领袖的社会地位，杜月笙曾在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影响下，站到与当局对立的立场上。1931年底，南京孙科政府为渡财政难关，拟将公债展期偿还本息，杜月笙即组织持票人会，与上海资本家们一起进

行强烈抗议。1932年“1·28”抗战中，杜月笙积极支持十九路军作战。接着，他又在三四月间与王造时等几十名国难会议上海会员一起，联名签署一个激烈抨击当局，要求还政于民的提案。1933年9月杜月笙又以上海市临时参议会议员的身份，与史量才等人一起，以辞职抗议市政府挪用复兴市政公债。

杜月笙的这些表现，可以说是用心良苦，一箭双雕。他既骗取了上海民族资产阶级的拥戴，又借此向当局发泄了他始终紧闭其做官之门的怨愤。因此，当1934年11月史量才被暗杀，杜月笙继任上海地方协会会长目的实现以后，他便被任命为中国通商银行董事长、法币发行准备管理委员会委员，然后立即改变了立场。1935年“1·29”运动爆发后，上海学生奋起响应，上海市政府严厉镇压，杜月笙即以地方领袖身份表态，认为“市政府之一切处置适当”。救国运动兴起时，杜月笙公开站在反对立场。1936年11月，上海十万日商纱厂工人举行大罢工，杜月笙千方百计进行瓦解不成，便迁怒于救国会。此时，杜月笙的权势和社会影响达到了一生中的顶峰。

1937年11月，淞沪抗战失利后，杜月笙被迫离开上海，从此跌下权势的顶峰，走上了一条痛苦而又漫长的下坡路。

杜月笙离沪后，首先来到香港，被任命为赈济委员会常务委员兼港澳救济区特派员，后又出任“上海统一委员会”主任委员，同时掌握西南鸦片在港出售的大权。杜月笙得到了这些恩惠，确实为上海的抗日活动提供了不少帮助，如指示留沪的万墨林等人协助地下人员工作；拉拢留

沪社会名流；策动高宗武、陶希圣脱离汪精卫集团等。但此时他的个人威风，已非昔比。因人生地疏，“强龙难压地头蛇”，他无法与香港的黑社会势力抗衡，过着一种郁郁寡欢，牢骚满腹的生活。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香港也落入日军之手，杜月笙只得再走重庆，过上了一种更为苦闷的寄人篱下生活。

由于上海失陷，租界消失，而杜月笙又远在重庆，不但已不能再对上海有重大影响，而且还受到或明或暗的排挤、打击。1943年“恒社”在重庆集会，竟被人打散。1945年3月杜月笙和其门徒因制造黄金舞弊案，被不客气地点名示众，杜月笙因此发出了“一日无权，人人都嫌”的感叹。

抗战胜利后，杜月笙回到上海，不仅没有得到任何官职，而且在选举国大代表时只得第三，面子丢尽。然而，上海资本家不明其中底细，仍把杜月笙当做“通天”的大亨和有利的保护伞，使杜月笙的社会地位迅速回升并比战前更加煊赫。据不完全统计，杜月笙在战后拥有董事长、理事长、会长、常务董事、常务理事、董事、理事、监事二百数十个头衔，恒社成员增至一千五百人左右。在市议会的一百八十一个议席中，杜月笙能直接控制的有五十多个。

1947年杜月笙六十大寿时，大批要员都送礼祝贺，予以捧场。但是，一旦政府认为地方势力干扰他们的统治时，杜月笙即使无所事事，也总难免首当其冲，成为他们打击的目标。1948年夏，国民党政府在沪抛售物资平息物价失败，便迁怒于杜月笙，认为是他伙同投机商乘机囤积。杜

月笙有苦难诉，大喊冤枉。当局在上海征集“救济特捐”五百五十亿元的目标无法达到，上海市警察局便将杜月笙变相扣押八小时，翌日杜月笙被迫拿出一千亿元，才被放回。上海打“虎”时，杜月笙更成为傲猴的“鸡”。尽管杜月笙已相当警觉，嘱其长子杜维藩避居北京，但其三子杜维屏还是被抓住把柄，锒铛入狱，登报示众。

一连串的打击使杜月笙极其伤心，深感失势的痛苦，又使他倍加眷恋战前的美好时光，因而对当局的不满情绪日渐滋长，最后终于1948年底走上了与当局分道扬镳之路。1949年4月27日，杜月笙离沪赴港。1951年8月16日，杜月笙在香港坚尼地台寓所病死，后被其门徒巫嘉棠把尸体运往台湾，葬于汐止大尖山墓。

3. 张啸林

张啸林，名寅，以字行。生于浙江慈溪县的一个破落地主家庭。因是独子，父母宠爱，事事依顺，故而自幼骄横跋扈。张啸林未成年时，父母双亡。二十岁时，移居杭州。先进机房学织绸，不久进武备学校，结识了张载扬。后拜杭州衙门探目李休堂为师，从事聚赌滋事、侮辱妇女等流氓活动，被杭州人认为“撩鬼儿”，意即没出息。

由于张啸林在杭州声名狼藉，没有出路，便跟吴鸿来到上海。吴鸿原是浙江省警务厅厅长夏超的旧部，当过杭州蒙古桥第二警署署长，在上海青帮中熟人很多。两人到沪后，由吴鸿奔走，遍访青帮中的关系，联络了一批地痞流氓，并托人把张啸林介绍到市区宝裕里的“燕子窠”（低

级烟馆)及沪西大赌台“荣生公司”等处,充当稽查(俗称“抱台脚”)。不久,张啸林聚积了一些不义之财,便租赁重庆路马乐里一栋旧式石库门房屋,每天召集狐朋狗友,聚赌抽头。民国初年,张啸林经投机药商黄楚九介绍,拜青帮大字辈樊瑾成为老头子,列入“通”字辈。

国民革命军北伐前,张啸林在杭州武备学校结识的张载扬,当上了浙江省长。张啸林通过张载扬的关系,结识了浙江督军卢永祥。又因淞沪护军使何丰林原是卢永祥的部下,张啸林与何丰林也搭上了关系。张啸林利用这些军阀、官僚关系,广收门徒,很快形成了自己的青帮势力,并与黄金荣、杜月笙结拜为兄弟,被黄金荣委以“三鑫”公司副经理,合伙包销鸦片,成为上海青帮三大亨之一。

与杜月笙一样,张啸林也是一个野心勃勃,权势欲极强的青帮恶棍。1927年,张啸林伙同黄金荣、杜月笙等组织“中华共进会”,被委以少将顾问,从此进入政界。但与黄金荣、杜月笙不同的是,张啸林一踏上政治舞台,便开始与日本帝国主义勾结。他曾拉拢日本浪人土肥原,又经土肥原介绍,认识了日本军人永野修,经常秘密出入于他设在华格皋路的住宅。

张啸林也想走黄金荣、杜月笙的老路,投靠法国人,借以发展自己的势力,自立山头。因此,他将自己的长子张法尧送往法国留学。数年后,张法尧取得博士文凭,不料回国后默默无闻,使张啸林通过其子打通法国捕房的希望落空。于是,张啸林又想让其长子进入政界,达到子贵父荣的目的。事前,他虽已通过顾维钧等人打通关节,但最终仍以失败告终。

30年代，张啸林除与黄金荣、杜月笙通过“三鑫”公司包销鸦片外，还以“实业救国”为名，勾结范回春、周邦俊、黄楚九等人，共同在江湾组织了一个“远东公共运动场股份有限公司”。该公司表面上是个赛马场，实际上是座大赌窟。又在法租界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创设一家杭州饭庄菜馆。中苏邦交恢复后，张啸林乘机与杜月笙合伙组织霖记木行，与苏联驻华商务代办机构订立合同，在远东独家经销俄国木材，霖记木行设在爱多亚路97号，张啸林任董事长，杜月笙为总经理。后又在霖记木行内建立了一个长城唱片公司，委派擅长书法与散文的郑子褒全权负责，其目的是为了拉拢文艺界、新闻界的一些人为他捧场。在此期间，张啸林还经杜月笙推荐，充任上海华商纱布交易所监事。

抗战前，西藏九世班禅到上海参观访问，张啸林为了炫耀自己的势力，竟以上海佛教会的名义，请班禅到他的寓所随喜。从大门口直到百忍堂正厅，全部铺设黄色地毯，整条华格皋路排满了他的爪牙及捕房的中西探捕，招待的场面奢华隆重至极。

“八·一三”上海抗战开始后，张啸林一变与日本人秘密勾结的作法，公开投入日本帝国主义的怀抱。他在日本特务的指使下，搞“新亚和平促进会”，为日军收购军需物资。又勾结汉奸陈公博、周佛海、江亢虎等，经常在家设宴招待。1939年，他与日特阴谋成立浙江省伪政府，自任省长，准备公开下水附逆，但终因慑于舆论和害怕被人暗杀，不敢出任省长。1940年8月14日，张啸林还是被自己的保镖林怀部刺杀，结束了罪恶的一生。

(五) 混混儿、脚行、青帮 三位一体的天津青帮

1. 混混儿与脚行

最迟在清乾隆年间，天津下层社会就活跃着一种类似帮会的土棍组织，名叫“混混儿”，又称“混星子”，或称“锅伙儿”，官方则称为“锅匪”。

“混混儿”最初产生于渔业中。天津号称九河下稍，各河流、湖泊及沿海所产鱼、虾、蟹等水产品，都要由船运到天津，到津之后首先都必须交到“鱼锅伙儿”，然后由他们开秤定价，再发售给大小行贩。这种锅伙中的成员都是地方上的封建把头一类的人物，势力很大，连官方也奈何不得。后来“锅伙儿”又从渔业发展到粮食业、蔬菜业、运输业、摆渡、赌场、小押、人市（雇用劳工的市场）等处，甚至私立铸钱炉，私立牙长，拦河索税。他们和府县差役都有勾结，平日供奉，三节送礼，应酬周到，而公门差役也多半是混混儿出身，对他们的同类当然要多方袒护。

由把持某些行业的混混儿即封建把头一类人物，后来又发展到一般社会上，某些青年流氓以至游惰子弟也都入了锅伙，自然也有不堪剥削压迫的劳动者激而入伙的。这些人入伙之后，不拘行业，渗透到社会上的各个角落，举凡争行夺市、坑蒙拐骗、走私贩毒、设赌包娼、抄手拿佣、飞帖打网，种种不法，无孔不入，在当时的社会上已形成

一种公害。但是有的混混也常以另一种姿态出现，即他们有时热心于社会公益事业，在一些“善举”，如火会、粥厂等之中充当头面人物。地方上发生的一些人事纠纷，他们也乐于代为排解。因此，能给人以好的印象。

混混儿虽有组织，但很松散。他们只有一个较为固定聚会场所，大半是租赁的一处房屋或一个院落，这就叫“锅伙”，他们自己则称为“大寨”。也有少数的混混儿利用地方上的公共场所，如水会、在理公所、高跷、法鼓的下处，茶楼、酒肆之类。他们每天集会，筹划生财之路，或是打架斗殴、寻仇、捣乱等活动。入伙时，没有什么仪式，也没有什么规约、律条，但必须有一股憨不畏死的精神。最好是有打过几场“群架”，滚过几次“热堂”（即刑讯）的经历，才能取得混混儿的身分。锅伙里的人事安排也很简单，一个大寨有个首领叫寨主，下面还有两三个副寨主，另外还有一个略通文墨的人称为“军师”，其余一律称为兄弟。

混混们到了中年，由于年事已长，多有家室之累，大半要寻个安身立命之处。有的投入公门当差，有的利用他们“打出来的天下”搞些经营，当然仍不外是赌局、烟馆、娼寮、脚行、斗店、栈房、戏园、茶楼、饭馆等。混混们到了老年，有的也能“功成名就”，譬如入了公门的；有的消声匿迹，在家养老；或是把他们的经营交给下一代。

在清末民初时期，青年混混儿在街上可以一望便知。因为他们的装束与众不同，所谓“花鞋大辫子”。典型的混混儿打扮是，靠身穿一身青色裤袄，外面是一件青洋绉大褂，披在身上不扣钮扣，或者搭在肩上，挎在臂上，腰扎月白洋绉搭布，脚穿蓝布袜子、花鞋。头上发辫大绉假发，叫

做发联子，不垂在背后而搭在胸前，有时在每个辫花上塞上一朵茉莉花。走路也和常人不同，迈左腿，拖右腿，故做伤残状。

这种青年混混儿为了加入锅伙儿，或为了成名，或为了找到“饭门”，常是故意到处寻衅，目的是讨一顿打。他们大多有些武艺，但如果对方打来，发现自己敌不过时，就不再还手，而是躺在地上，这叫“叠起来”，即双手抱头侧卧，两腿蜷曲，任凭对方拳打脚踢，棍棒相加，虽至皮开肉绽，骨断筋折，也绝不许出声喊疼，这叫“卖味儿”。倘若熬忍不住，口中道出“哎呀”两字，对方立时停手，这人便算“栽啦”或“走基啦”，这样的人不能入锅伙儿，已入的则取消资格。被官府拿获用刑的也是如此，无论什么样的“热堂”，也能“扛刑”，虽至数百笞楚，气不少吁，口不求饶，面不更色，才是混混儿本色。

混混儿的横行不法，给天津社会造成很大危害。为此，官府曾对他们施加过压力。清同治十年（1871年），官府将锅伙儿寨主罗仲义、冯春华、魏洛处决，又将张庆和、丁乐然站毙立笼。袁世凯督直时，也将一些混混儿正法，暂时煞住了混混儿的一些嚣张气焰。

在天津混混儿从事的所有经营中，最主要的就是脚行，脚行即搬运业。清初以来，天津便是北方的一个重要水旱码头。大量的漕粮、芦盐及南北方土特产品，均以天津为转输口岸，因此天津的脚行业十分发达。清初，旧天津城设有官方组织的“四口脚行”（四口即东西南北四个城门）。后来私人把持的脚行，在运河西岸、盐坨地区以及商业中心先后出现。天津开埠以后，辟出九国租界，迅速成为工

商业大都市和北方对外贸易中心，促使脚行业兴盛起来。清末漕运停废后，大批水手涌入天津，充当脚行是他们最为接近的行业，因而使天津脚行业更加兴盛。

充当脚行的人都是赤贫穷汉，全凭一膀子力气赚钱吃饭，所以自来就有一种憋不畏死的性格，而脚行头更必须是混混儿一类的人物，否则就无法驾驭。

民国初年，军阀混战，社会动荡不安，原来已有所收敛的天津混混儿也乘机蜂拥而起，形成“天津土棍之多，甲于各省”的局面。他们以脚行为据点，猖狂于天津社会，但不久便被较有组织的青帮所收罗和代替。

2. 颇具特色的天津青帮

天津混混儿和脚行在民国初年的蜂拥而起与空前兴盛，为青帮在天津的扎根及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从而产生了一个颇具天津特色的青帮组织。

与长江沿岸的一些大中都会相比，天津是青帮弃舟登岸较晚的一个城市。20年代初，从济南来了个叫厉大森的青帮“大”字辈老头，天津才开始有了青帮。

厉大森，字宪臣，山东济宁人。年轻时当过兵，民国初年加入青帮，属“嘉海卫”帮头“大”字辈。他到过很多码头，开山门收徒弟。后来跑到济南，当上了济南警察厅骑警队队长，同时收了不少徒弟。骑警队的职责本来是缉拿土匪、小偷的，而他却与这些人都有联系，甚至由他豢养在骑警队，以备必要时出来“顶案”。1923年，由于胶济铁路张店站站长被入绑架，军政当局责令厉大森立即破

案，否则唯他是问。他找了一个土匪顶案，临时搪塞过去。但不久案情大白，他受到处分，此后便离济来津。当时天津由奉系军阀褚玉璞主政，厉大森来津后，居然先把褚玉璞收为门徒，然后由褚封厉为军警联合督察处处长。此后厉因有军阀支持，更是大开山门，广收门徒，其中之一即军警联合督察处一个分处处长白云生，另一个是《大公报》采访部主任张逊之。白、张入帮后也开山门收徒弟。白的门徒之一即褚玉璞的特务科副科长、脚行把头袁文会，另一个是督察处手枪排排长、脚行把头巴延庆。自厉大森收了白云生、张逊之，白又收了袁文会、巴延庆后，一个以脚行把头及其徒众为主体的青帮势力在天津迅速形成，横行、祸害天津达二三十年之久。

天津青帮势力形成后，以脚行为基地，凭着刁顽蛮横的混混儿伎俩，几乎完全控制了全市所有的脚行、赌场、烟馆、妓馆、旅馆、澡堂、戏园、饭店、茶馆、渡口、车场、杠房、舞厅、球房等营业，并参与、包揽贩毒走私、贩卖人口、盗窃绑票等非法勾当，充当特务、打手、保镖、刺客等罪恶角色，成为一股强大的无恶不作的黑社会势力。

这股黑社会势力，对于人民当然是祸水是罪孽，就连青帮内的一些人物也以正统姿态出现，斥厉、白、袁、巴之流为异端，力图在天津站稳脚根，取而代之，但无论是谁都没能成功。

著名的青帮“兴武六”帮头“大”字辈老头袁克文（字寒云），为袁世凯次子。他喜欢琴棋书画，能唱昆曲、京剧，又颇好古玩、钱，在天津、上海、北京等地均以文人墨客自居。他交游的都是上流社会，但也很尊重帮内的

下层分子。他也开山门，但不滥收徒弟，一生只收过一百多个。虽然他在青帮中是个很有影响的人物，但毕竟只在一定范围之内，远不及厉、白、袁、巴的势大气粗。

张逊之本与白云生同为厉大森徒弟，属“嘉海卫”“通”字辈。他原为《大公报》记者，后为敌伪报纸《庸报》副社长，是抗战期间天津颇有声望的报人。他所收的徒弟最初很杂，哪行哪业都有，后来重点向文教界、政界及工商界发展，目的是想让青帮变得斯文些。抗战期间天津有许多中小学教师、机关职员、资本家都入了他的青帮即缘于此。虽他的青帮势力与以脚行为主要成份的青帮势力形成对峙，但始终不能形成优势。

从济南“跑海”来津的王大同，也是同样结局。他是山东沂州人，本是个被耶稣教会收养的孤儿，后被送往国外读书，回来后仍在济南传耶稣教，还创办个报纸《世界真理报》。后来他背叛了教会跑到上海，冒充青帮“嘉白”帮头、“大”字辈当家，大摆香堂，广收门徒。抗战期间又回到济南，仍以青帮面目出现，创办了个大同中学。后又跑到天津，同样招摇撞骗，并想在天津长期站下，置了房产安了下处。但因以脚行为主体的青帮势力过重，他虽竭力巴结袁文会，两人成为好朋友，也始终吃不开，40年代末还是回到济南。

除上述三个人物外，其他如济宁来的“大”字辈老头、曾收过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为徒的魏大可，国民饭店董事长潘子欣，直鲁联军时期督察厅庶务主任、后来盘踞英法租界的陈友发，北洋政府财政总长，曾控制过内河航运公会的张英华等，他们有的在社会上和在帮内的声望都

最高，势力与财力都很雄厚，与军政当局的关系也很密切，但仍是没能在天津这个码头站住。

青帮内的一些代表人物尚且如此，与青帮隔帮的红帮人物要想另辟蹊径，与其抗衡，更是不可能。

红帮头子姜般若，早年曾在天津南开中学教过书。30年代重来天津时，首先结交上层，希图在天津传播红帮，并开办了一所育德学院，以制造影响。他在天津立了山头名“太行山兴和堂”，收过一些兄弟。起初是专收知识分子，后来为了拉拢青帮势力，也收进许多脚行头子，使他们成为身兼青红两帮的“双龙头”，但也仅此而已，红帮在天津也未成势。

天津沦陷期间，袁文会在日本特务机关的大力支持下，于1942年组织一个公开机构“安清道义会”，请出青帮“江淮泗”帮头、“大”字辈当家、曾任清朝河南总镇的吴鹏举应名为会长，实际会长为盐商、“大”字辈的王慕沂，袁文会、张逊之为副会长，王大同为顾问。通过这个机构，袁文会把天津青帮各派势力暂时协调起来，成为日本侵华的帮凶。

日本投降后，袁文会被关押。于是，天津青红帮成立了两个组织，一是“忠义社”，后改名“忠义普济社”，由天津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陈仙洲任理事长，巴延庆任副理事长；姜般若任顾问；一是“共济社”，由张逊之任理事长。忠义普济社有九个分社，绝大部分是脚行组织。共济社收买了脚行之外的各行各业，虽有些知识分子参加，基本上仍是个杂糅各种社会垃圾的集团。

但是，这些社会垃圾好景不长，除个别的于1949年逃

离大陆外，绝大多数都没漏网，罪大恶极的如袁文会、巴延庆、张逊之、刘德山、翟春和、王士江、王士海、马文元等均被枪毙，从而结束了青帮在天津的罪恶历史。

3. 袁文会与巴延庆

袁文会，天津人，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生。其父即是一个脚行把头，他十五岁时接替了这个职务。他的叔父袁国瑞（人称袁八）是日租界芦庄子中局脚行的把头，又在芦庄子鸿义栈开设一个赌局。袁文会很小就混迹其间，到二十岁之后也与袁八一起经营。在这期间，他两次跑到军阀的特务部门充当特务，曾任褚玉璞的特高科副科长、袁振青部的高级密探处密探，但时间都不长，就又回到他的脚行、赌局中来。1927年，在他当特高科副科长时，拜白云生为师，入了青帮。入帮之后，又拜日租界警察署（俗称“白帽衙门”）侦探长刘寿岩为干爹。1929年，他自己在日租界新旅社开设了一个赌局。不久，又在旭街开设了一个德义楼烟馆。至此，他已是操纵着两个脚行、两个赌场、一个烟馆，又有青帮、军阀、特务和日本势力庇护的年轻霸主了。在此之后，他又经过几次大的考验，终于赢得青帮分子的“拥戴”，成为全市的青帮魁首。

袁文会经受的第一次考验是与苏莲舫争夺赌局的械斗。20年代末，袁文会在日租界新旅社开设赌局时，由于法租界新津里还有一处由苏莲舫开设的赌局抢了他的生意，因而来新旅社的赌客寥寥无几。他为了扭转这个局面，遂派人到新津里寻衅，结果双方约定日期决斗。当时，决

斗的双方出动一百多人，最后袁胜苏败，从此新旅社赌局的营业独占鳌头。

第二次考验是他为争夺天津鸦片走私生意垄断权的搏斗。他在旭街开设德义楼烟馆之后，烟土全靠海运陆运两路走私，但海运由大沽把头王八把持“下货”，陆运则全由东站把头吴六把持“下货”。为了争夺这两处的权利，他派出打手，经过搏斗，王八、吴六甘拜下风，从此天津的鸦片走私生意全部被他垄断。

第三次考验是1935年与刘广海的一场争斗，结果仍是袁胜刘败。当时日租界蓬莱街太平里有个大赌窟，赌法叫做“三十六门花会”，类似押宝，但赌者不一定到花会来，通过“跑花会的”就可押上哪一门，因此它是全市性的赌博。这个花会虽不是袁文会所开，但他却是花会的“顶门杠”（或“后戳儿”）。平日拿“挂钱”，有事由他顶着。一次西头大青帮头子刘广海带着他的打手宋国柱到花会来，袁、刘素有嫌隙，袁以为刘此来必是寻衅，遂命手下动武，刘逃走，宋被捅死。刘向法院告发，袁在其干爹刘寿岩庇护下逃避到大连。袁在大连结识了日本特务小日向，不久返津，经小日向介绍，当上了日本宪兵队特务队长。

通过这几次较量，袁文会制服了所有的对方，特别是当上日本宪兵队特务队长之后，更是如虎添翼，天津下层社会帮内帮外各式各样的人物，不管是本地的还是外来的，谁都要买他的帐。他自己的直接弟子有六百多人，分布遍及全市。当时袁文会的威势达到顶峰，凡是能与他接上关系的，哪怕是用上他的一个名字，就可以“无往不利”，不用说袁的直接弟子了。

30年代和40年代，天津河东有一个由青帮、脚行头子、恶棍之类的人组成的一个盗窃团伙。他们专门盗窃轮船、仓库、铁路、工厂的物资，如粮食、钢铁、建筑材料，进出口商品如皮张、百货等等也无所不偷。偷来后即在市场倒卖，这是无本生意，自然所得甚丰。他们分赃时，将赃款分作十股，按大小头分配，故人称“十大股”。这个团伙的头子本是春和脚行把头翟春和，与袁文会并无直接关系。因翟与袁同是日本宪兵队特务，翟又是袁的徒弟和义子，为了“孝敬”袁文会，翟春和等竟将十股中的三股奉送袁，翟得两股，其余五股再按大小头儿分配，于此可见袁文会当时的威势。

袁文会所以能有如此威势，是与他投靠日本特务，忠实为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效劳分不开的。1931年“九·一八”事变不久，袁文会就招募、组织“便衣队”为日本制造“天津事变”打头阵。1933年后，他又多次派其爪牙，在南市、地道外等地诱骗壮丁，押送至海光寺日本兵营修筑工事。事后，日本怕泄军事秘密，将壮丁杀死灭口，弃尸海河。1935年，袁文会自大连返津后，又在日本特务指使下，与青帮头子张逊之等在日租界组织“普安协会”，厉大森为会长，张逊之任宣传部长，袁文会任行动部长。该会成立后，大肆制造“华北自治”的卖国舆论，为日本侵吞华北预留张本。1937年“七·七”事变后，袁文会成立一个“会记公司”，通过其青帮弟子和爪牙大抓“华工”，送往日本及东北，据不完全统计，通过会记公司及其他途径从天津口岸劫走的华工不下四五十万，而很少有生还者。1938年，袁文会在日本特务机关指使下，纠集土匪头子马

成昆、王海明等成立“袁部队”，自称司令，以日本人济川为顾问，在霸县、廊坊一带骚扰地方，进攻解放区。他还派其手下的“四大金刚”郭小坡、国文瑞、祁国富、李子扬等四出侦捕抗日地下人员，收集解放区及八路军的情报，供给日本特务及军警机关。袁文会为了取悦日军，更丧心病狂地指使在他控制下的乐户青帮头目李万有等，成批地驱使妓女到日本兵营，其中有许多妓女被蹂躏至死。

由于袁文会忠实地为日本帝国主义效劳，因而得到日本驻津特务与军事机关的赏识与庇护，使袁文会成为抗战时期天津社会上的“一手遮天”的头号青帮恶霸，举凡拐卖人口、霸占妇女、暗杀、绑架以及巧取豪夺之类无所不为，其罪行擢发难数。抗战胜利后，袁文会失去靠山，被刘广海的手下人高玉璞扭送法院，经肃奸委员会起诉，只将他判了七年徒刑。他在狱中三年，住着单间，睡着席梦思，吃着小灶，还允许定期回家，被待如上宾。直到1949年后，才被从监狱拉上刑场，予以正法。

巴延庆，天津人，回族，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生。其父巴有顺，是河北大街的世袭脚行头子，巴延庆十几岁时即接替其父的职务。在他接替脚行头子之后，也曾到军阀部队和特务部门当过护兵、排长、稽查，但为时不长就又回到本业，并于1925年在老爷庙开设一个赌局。在此期间，他拜白云生为师，入了青帮，与袁文会为同参弟兄。后又加入了姜般若开的“太行山兴和堂”，取得了“双龙头”身份。1935年，他加入了“复兴社”。1937年，他又勾结日寇充当了新民会运输分会会长、运输职业公会理事长。日本投降后，他继续担任天津运输公会理事长、全国总工会

常务理事等要职。他又与陈仙洲组织青帮社团“忠义普济社”，并于1947年被选为国大代表、天津市参议员等。

巴延庆在抗战胜利后，成为继袁文会之后不可一世的人物。他接收了袁文会的全部班底，凡是袁的徒子徒孙、势力范围、勾挂的各方关系，都转移到巴的手中，并且还有所发展，从而成为全市脚行、青红帮的盟主。这个局面形成之后，不管是脚行业中的“四霸天”、“八大金刚”、“十大股”、“十四友”等等，甚至包括了脚行、青红帮以外的地方恶棍之类，都由他发号施令。

1947年6月2日，天津市人民举行示威游行，天津警备司令牟廷芳直接指示巴延庆进行破坏，巴指使同议脚行头子、人称“黑手刘三”的刘德山等十余个头目率领打手，伪装学生混入游行队伍，在东马路、罗斯福路（今和平路）一带，以木棍、皮鞭、铁钩殴打学生、工人多人，造成震动国内的大血案。

1947年，东站东货厂“六号门”搬运工人进行了一场规模浩大的罢工斗争，要求脚行头子马文元改变劈成比例，提高工人待遇。马文元通过巴延庆，由警备司令部派出大批军警逼令工人复工。工人们不畏强暴，坚持罢工，最后取得胜利，马文元被迫将东货厂的“自理货”按对半分成。

1949年后，巴延庆召集刘德山、马文元等二十多人，在旺道庄、西老公所等地秘密开会十余次，筹划应变办法，甚至派人去北京告状，要求保存脚行制度，但这只不过是他的痴心梦想，不久这个罪恶累累的青帮头子便被押上断头台。

（六）保持原始风格的南京青帮及其蜕变

南京是长江沿岸的重要水旱码头，青帮从漕运上岸以后，也把这座六朝古都做为自己的立足与发展之地。但早期南京的青帮尚不失其原始风格，主要是在船业、缙业及商业中活动，没有太大的为非作歹行为，即使有些压迫、剥削、霸占、强夺、械斗之事，也并不严重，官方听其自然。青帮头子们多是墨守帮规，很讲义气，也很讲团结。这正是南京青帮与上海、天津两地青帮的不同之处。

清中叶以来，南京即是粮食转运码头，江宁府七县（江宁、江浦、六合、句容、高淳、溧水、溧阳）及附近各大村镇的粮食都以南京为聚散地，因而粮食业和运输业都十分繁盛，与粮食储运有关的船业也随之发展起来。清末，青帮进入南京以后，首先在这些行业中站住脚跟，因其更为接近漕运水手的本来行业，尤其是船业，可以说是漕运时代粮帮的直接余绪，在船业中的青帮头子堪称青帮的“正统”。当时，南京青帮中的最大辈份人物是“理”字辈老头赵宝源。他原是运粮工人，后来成了中华门外水旱码头的领袖，操纵着运粮与船业，势力遍及水关西门、仪凤门、下关各地，徒弟有五六十人，可称为四十年来南京青帮的“祖宗”。

除赵宝源外，还有“大”字辈的钱永发、宋大眼、姬彩臣、夏金荣，“通”字辈的周得标、王如贤、李金秋、李金业。钱永发是赵宝源的大弟子，1926年前极有声望，徒弟二三千人，赵宝源死后由他继承衣钵。宋大眼也为赵宝

源徒弟，从清末开始，他就是个威镇中华门的地头蛇，并且徒弟很多，又与官府勾挂。钱永发的徒弟中佼佼者要数邵振祥，宋大眼的徒弟中要算周得标。师徒几人都是艚业中的霸主，凡十年中从没有人敢撻其锋。

清末民初，南京仍为手工业城市，主要生产是缎业。这个行业是当时南京的经济支柱，直接间接供养着城内外十几万人的生活，青帮分子在这个行业中的发展也很迅速。在这个行业中活动的青帮分子分成两个阶层，一般的青帮分子称为“机包子”，机包子之上即为把头，把头通过机包子控制了全市几十万缎业机房工人，并且包揽了成品和原料的搬运业务。著名的大把头有“大”字辈的荣华廷、卜和尚，“通”字辈的张维彩、李承明、陈老五。他们不属一师，门户之见颇重，曾引起过械斗。荣华廷是实际上的霸主，门徒很多，十之七八（约三五千人）是机包子，他号称“威震大江南北”。卜和尚在淮清桥开猪肉铺，徒弟张帮达是机包子的头目，威势也很大。

夫子庙是南京的商业和娱乐中心，各种行业青帮分子自然也会涉足其间。著名的把头人物如万家春旅馆老板屠光朝（“大”字辈），六朝居茶馆老板和创办人张万有、谭得义、王广礼、高广义（“大”字辈），食品业的（兼营，原是机包子头目）张邦达（“通”字辈），茶馆业的梁启盛（“通”字辈），澡堂业的刘锡五（“通”字辈），布业的尚永发（“通”字辈），操纵全市瓦木匠，有弟子二千余人的何玉良（“通”字辈），大行宫一带的土霸何老八（“通”字辈）等等。

1927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之后，南京便很快由一个手

工业及运输业城市变为全国政治中心。对此，南京青帮曾采取了相应的措施，一些青帮头子想方设法与官府拉关系。其结果是，南京社会上出现了这样的局面，官府对于一般青帮组织与活动概不干涉，对于青帮势力很大的行业如运输业、船业、旅馆业等则更为客气。因此，南京青帮很快活跃起来，他们摆香堂收徒弟，有时还大规模地举行“联香”，青帮头子更借三节两寿机会大受礼、大请客。像聚赌、吃讲茶、拉台子的事就更多了，个别的甚至为非作歹，扰害社会。但还不至发展到严重程度，因为南京毕竟是首府，军警对于社会治安的控制还是较严的，而青帮头子为了搏得官府好感，也要对徒众加以约束。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新生的青帮分子于此时崛起于南京的各层社会中。他们开始走出传统，打入军政界，并且获取了较高的职位。如江政卿利用青帮的力量，当上了商会会长，把持了南京的商界；赵茂高、陈世贤则打入军委会调查科；身兼青红两帮的叶开鑫、朱亚雄也在军政界谋得职位，成了名噪一时的青帮红人；夏金印亦打入警察厅侦缉队，最后当上了队长等等。

这类青帮分子与军政警溶为一体，自然是“相得益彰”，互为包庇。1931年夫子庙一带出现了一种青帮组织名“刺花党”，系因其分子都在臂上刺上花纹而得名，他们横行不法，成为当地一害。一次，他们的党羽调戏一位妇女，不想被调戏的妇女竟是当时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的内眷。当局责成侦缉队长夏金印处理此案，夏深知刺花党头子实为“通”字辈“谢家五虎”为首的谢宏源，遂一面制造空气大索刺花党，一面则商同谢宏源找了一些徒弟顶案了事。

1937年12月南京沦陷后，除逃往内地的青帮分子外，其他青帮分子大多投入日伪怀抱。1941年，在日伪支持下，有一个叫常玉清的青帮头子成立了“安清同盟会”，声称此会是青帮正统，全国青帮组织都要受此会领导。常玉清任会长，邱吉甫、鲁有才为副会长，另聘一些新老青帮头目为理事，如何柏椿、缪凤池、钱挹秀、李松山、姬彩臣、梁启盛等。这些青帮分子当时都成为不可一世的人物，他们不仅在帮内的权威很高，而且分别操纵着社会上的某些方面，如葛亮畴、江政卿操纵商会，钱挹秀、宗长福、赵信臣操纵工会，许生保操纵农会，萧石楼当上了燕子矶区长，朱亚雄、杜哲庵成为伪内政部顾问委员等等。这些青帮头目在沦陷期间，势力始终不衰。正因为如此，一般青帮分子也一反原始青帮的重帮规、讲义气的传统作风而猖狂起来，他们横行霸道，夺市欺行，杀人越货，无所不为，成为日寇、汉奸之外的又一种黑暗势力，形成南京青帮史上的第一次高峰。

抗战胜利后，南京再度作为首都，一些逃往内地的青帮分子也跟着复员回来。在南京附逆的青帮分子，除一部分以汉奸罪关押起来外，大部分又从“地下”爬起来荣升高位，形成南京青帮史上的第二次高峰。其主要表现是大批青帮分子都做了特务，有的还是中小头目，如改复初、刘守英、夏时、李廷镇、赵大春、嵇四海、马忠恒、彭永春、戴永金等。这些特务，有的是自己投去的，有的是各特务部门向青帮组织内发展的，有的则是帮内向特务部门推荐的，所谓推荐，多是老一辈青帮头子如邱吉甫、穆老太（女）、邵振祥、宗长福、江政卿、鲁有才等人，为了保

持和巩固其既得势力与利益，而派遣其门徒打入特务部门，以收里勾外联之效。

帮特合流所做的最为突出的一项事情就是“竞选”。1946年秋竞选南京市参议员、1947年10月和1948年1月竞选国大代表和立法委员，都是由青帮分子控制或把持。他们划定选举范围，分配票数，强迫选民按照他们的意图投票。

抗战胜利后，南京青帮分子争相攀附上层社会，如“悟”字辈青帮分子胡天宝，原为菜馆学徒出身，是“通”字辈钱挹秀徒弟，抗战前在南京开设六华春菜馆，南京沦陷后，逃到贵阳继续开菜馆，胜利后六华春复业，成为南京豪华餐馆之一。他善于结交官府，以扩大其帮会势力和打通关节，因此专做高级官员生意。

除此之外，南京青帮也仿效上海青帮组织社团，但没有上海的多，著名的有华社、正社、求是学社、正心学社等。这些社团表面上似乎斯文了一些，但背地里仍在干着诬陷、讹诈、绑架、暗杀和镇压工人的勾当，最终还是逃脱不了被埋葬的历史命运。

反清斗士，革命先锋

（一） 洪门源流

洪门，又称洪帮、红帮，起源于乾隆中叶福建漳州地区出现的天地会，它是继青帮之后的又一种流传最广泛、影响最深远的民间结社。

天地会首先在福建漳州地区出现，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

福建漳州地区历来以山多地少著称。明末清初，这一地区抗清斗争非常激烈，致使本来就十分落后的社会经济又遭到很大破坏。康熙以后，尽管政局比较稳定，社会经济得到了恢复与发展，但伴随而来的却是人口爆炸性地增长与人口平均耕地面积的急剧减少，加之地主阶级对土地的疯狂侵吞、兼并和各级封建官吏的巧取豪夺，造成了大量农民失地逃亡的严重后果。不仅如此，沿海地区依靠晒盐为业的大批盐民，也在封建官吏和土豪奸商的种种盘剥与压迫下，纷纷贫困破产。这些破产劳动者在失地与失业

的逼迫下，不得不背井离乡，谋求生路。他们生活上的极不安定性，迫使她们感到，单靠个人是无法生存下去的，必须团聚在一起，互相扶持，甘苦与共。在这种形势下，一种以破产农民与破产盐民为主体、奉互助互济为宗旨的民间结社便应运而生了，这就是天地会。

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天地会在漳州漳浦县建立，创始人为洪二和尚，名万提喜，俗名郑开。所谓“天地会”，即取“拜天为父，拜地为母”之义。拜天地为父母，以泯除家族的畛域，而合异姓为一家，共图大业。因天地会是洪二和尚所创，故天地会又称“洪门”，洪二和尚即被天地会内尊为最早权威，天地会在举行结拜仪式时，都要设立洪二和尚牌位，凡加入天地会之人均称为“洪家子弟”。

洪门是一种在创设宗旨、组织形式、流传地区以及实际活动等方面与青帮根本不同的民间结社。

首先，洪门在创设宗旨上并不停留在单纯的内部间的互助互济，当社会矛盾尖锐时，它起着组织发动群众进行斗争的作用。其次，洪门在组织上采取了歃血为盟、桃园结义的形式，其内部只因主持入会仪式、掌握钱谷、侦察情况和通信报信等需要，而设置一些职位，各执掌官之间都是兄弟相称，其首领（总理）为大哥，香主为二哥，白扇为三哥，以下还有先锋、红棍、草鞋等，一般会众与各执掌官之间也是兄弟相称，而且“多得与闻秘密之事”。第三，洪门在民间发展迅速，流传地区遍及大江以南诸省及台湾以至南洋各地，正如民谚所说“青帮一条线，红帮一大片”。第四，洪门从其创设伊始就举行反抗清朝统治的战

斗旗帜，终清一世，辉煌的革命业绩史不绝书。为此，天地会常常打起“反清复明”乃至“反满”的旗帜，借以唤起群众的民族意识，赞美自己的反清斗争。

除此之外，因洪门也是一种民间组织，为了维系内部团结和处置违犯会规成员，而制定了一些誓词、条规、守则，如《三十六誓》、《十大帮规》、《二十一则》、《十禁》、《十刑》等；为了内部秘密交通，颁发了腰平、票布，持票即可“随所至皆得衣食”，又可随处传会，开立山堂；发明了隐字、隐语和“三指诀”、“茶碗陈”、“挂招牌”等暗号，以及开码头时的盘问对答诗句等等。

洪门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在一点上是与青帮一样的，即为了标榜自己，也虚构了一套“道统”。他们把明末清初以来的一些民族英雄与抗清领袖奉为自己的祖师。在这些被崇拜的人物中，有被奉为“始祖”的殷洪盛、傅青主、顾炎武、黄梨州、王夫之，被奉为“五宗”的史可法、郑成功、陈近南、万云龙、苏洪光（又名天佑洪），被奉为“前五祖”的少林寺僧人蔡德忠、方大洪、胡德帝、马超兴、李式开，被奉为“中五祖”的沙湾口勇士杨仗佑、方惠成、吴天成、林大江、张敬之，被奉为“后五祖”的宝珠寺僧人李式地、洪太岁、关天佑、林永超、姚必达，被奉为“五义”的郑君达、谢邦恒、黄昌成、吴廷贵、周洪英，被奉为“五杰”的郑道德、郑道苏、韩龙、韩虎、李昌国，被奉为“三英”的郭秀英、郑玉兰、钟文君，以及被尊为“军师”的男军师史鑑明、女军师关玉英。

洪门初创时，内部组织并不完备。随着它自身的发展变化，逐渐形成了一整套组织系统；并有了比较统一的称

谓与职能。

洪门的领导机构由内八堂与外八堂组成。所谓内八堂，即由“龙、盟、香、佐、陪、刑、执、礼”八字顺序排列；外八堂由“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八字顺序排列。虽按字序排列，但因洪门中以兄弟相称，大哥不大，么满不小，其间并没有辈份之分。

内八堂是领导机构，计有：

正龙头：就是正山主，又称舵把子，为会内的最高负责人。

副龙头：就是副山主，又称副舵把子，协助山主办理会内事务。

坐堂：是内八堂的首席职位，掌人事升迁调补。

盟证：是会内盟誓的监察人。

陪堂：掌会内的经济。

礼堂：即司仪，掌管礼节。

刑堂：掌管执法事项。

执堂：管内部事务。

香长：香长与盟证大爷平时虚悬，举行开山仪式之际临时增添。

外八堂是由内八堂领导的组织机构，计有：

心腹：亦称老二。

圣贤：亦称老二，他们是外八堂首长，兼任

正龙头军师。

当家：或称当家老三，又有金旗老三，银盔老三之别，金旗老三专管粮饷银钱出纳等事，银盔老三专管入帮发布用印等事。

红旗：又称老五，统管内外一切事务。

光口：又称老六，专司通风报信，为全帮耳目。

巡风：或称老八，严防敌兵奸细，保护山头。

大满：或称老九，新入帮的都称老九，专做文武差事；听候调遣，立了功劳才有升任。

么满：或称老么，须是历著功勋的人，或是因公受伤已成残废，才得享受此位，终身坐食，好比官员退老林泉，只吃恩俸。

外八堂为何不设老四、老七？据洪门内传说，天佑洪时，符四、田七二人占四、七步位，均以破坏捣乱获罪，故从此禁用四、七步位，以女子入洪门者任之，称为金凤老四和银凤老七。

由于洪门是一个反抗清朝统治者的革命团体，因此一经出现，便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保护与欢迎，迅速在南方诸省传播起来，成为劳动群众反抗清朝统治的发动者与组织者。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洪门在其发源地漳浦县首次发动了一场有数百人参加的卢花起义，揭开了洪门英勇斗争的序幕。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洪门传到台湾。三年之后即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台湾就爆发了一场著名

的林爽文起义。

嘉庆以后，随着封建社会日趋衰败，社会矛盾越加尖锐，洪门在民间更加迅速发展，很快从福建、台湾一带传至两广、浙赣、两湖、云贵等广大地区，并且传到了南洋。由于林爽文起义之后，清政府对洪门实行严厉镇压政策，“天地会名目犯禁”，于是洪门便改变名目进行活动，如添弟会、三点会、三合会、仁义会、串子会、双刀会、千刀会、百子会、边钱会等不下数十种。它们发动了数百次的反抗斗争，但规模都不大，并很快被镇压下去。

鸦片战争以后，由于民族与社会危机空前严重，促使洪门在南方各省蔓延。这一时期，南方各省山堂林立，无处不有，大小起义约有千余次，主要是配合太平天国打击清廷，如上海的小刀会、福建的红钱会、广东的天地会等，并在人力物力方面给太平军以很大的支援，如广西、两湖的大批洪门群众加入太平军，迅速壮大了太平天国的队伍。太平天国失败后，洪门又担起了掩护太平军的责任，吸收大批太平军余部“转红”成“洪门子弟”。

甲午战争前，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已从东南沿海深入到长江流域，因而造成大批农民和手工业工人破产失业，浪迹江湖。同治以来，清政府大量裁撤绿营，又造成百万散兵游勇流落各地。这些江湖游民与散兵游勇为了生存，纷纷聚义结社，于是洪门的一个强大支派哥老会（又称袍哥）在长江流域崛起。

哥老会一出现，便把斗争锋芒指向外国侵略者，并把反侵略的仇恨集中到作恶多端的外国教会身上。光绪十六年（1890年），长江上游大足县余栋臣连续发动起义，反抗

外国教会。光绪十七年（1891年），哥老会将长江中下游六省数十城镇连成一片，点燃反教会的斗争烈火。这些反帝斗争，又为洪门谱写了新的篇章。

甲午战争后，哥老会开始由川黔偏僻山区农村，向长江中下游各大城镇和交通码头发展，势力迅速遍布全国各地，因而引起了正在兴起的资产阶级各派势力的关注。他们都想将哥老会援为己用，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而此时的哥老会也感到已不能“独守”，渴望接受资产阶级的领导。在资产阶级各派势力与哥老会的联系中，比较成功的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其中孙中山的兴中会、黄兴的华兴会和陶成章、秋瑾的光复会成绩最为突出。哥老会在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策动下，不断举行起义和发动武装暴动，为辛亥革命造成了极为有利的形势。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各地哥老会起而响应，为推翻清王朝，建立中华民国冲锋陷阵，建立了英雄业绩，留下了洪门斗争史上既是最辉煌也是最后的一章。

进入民国，洪门错误地认为推翻清朝的大业已经完成，于是便飞扬跋扈，随心所欲起来，致使它本身固有的落后性急剧膨胀，特别是进入大城市后，由于大量流氓无产者的渗入，使它迅速背叛了自己的革命传统，堕落为藏污纳垢的帮派组织，变成帝国主义、军阀政客、土豪劣绅的鹰犬与帮凶。因此，人民群众理所当然地将它与青帮归为一类，而加以鄙夷与唾弃。

(二) 洪门的“开山”、“规律”、 “切口”、“海底”

1. “开山”

“开山”是洪门最重要的仪式，又称“开香堂”，有的称“红花亭”。它包含两个内容，一为新辟山头称“开山”，一为接收新官人（新入洪门者）亦称“开山”。洪门通过“开山”阐扬自己的源流与宗旨，因此极受内部成员重视。兹将接收新官人的“开山”仪式略作介绍。

洪门的开山仪式，在乾隆年间比较简单，只是在僻静地方设立香堂，排列刀剑，令新官人在刀下钻过，即传给洪门口号，结为弟兄。但到了嘉庆、道光年间，洪门的开山仪式就变得复杂起来。嘉庆年间，各地洪门开山时，多在供桌上供洪二和尚牌位，有的还供出洪门虚构的列祖列宗牌位。桌上安放一粮斗，斗内插有五色旗，还放两把剑，以及算盘、尺、斛、秤、镜、剪刀、桃枝、珠串、木鱼诸物，各有寓意：粮斗（木斗）为“木扬城”；剑是七星剑，以示“满覆明兴”；算盘为“计算灭清后，明帝再行登位年代”；尺为“比较会员的行为”及“计算天地合一的方寸”；斛与秤为“正义公道”；镜为“照破一切善良邪恶”；剪刀为“剪开蔽空的乌云”；桃枝为“刘关张兄弟结义”；珠串与木鱼为“合抱一剑，以成穹窿之形”。

仪式开始后，大哥即主香人手持刀剑，先令新官人从

刀剑下钻过，然后立誓，传授“开口不离本，出手不离三”及“三八二十一”洪字暗号，并宰鸡取血，共饮血酒，最后由大哥颁发“票布”，令各珍藏。

道光年间，各地洪门开山时，除安设木斗、供奉牌位外，有的还在供桌后烧火一盆，并用竹竿编制“三关”。大哥手持长刀，站在第三关门旁，将刀架于关门之上，令新官人从下面钻过，然后至牌位前焚香、盟誓歃血，再从火盆上跳过，最后饮清水一口，以示同赴水火不畏避之意。

咸丰以降，洪门的开山仪式更为复杂，山堂正中添设关帝像，上悬“忠义堂”匾额，花果供奉，帷幔垂立，红烛高照，香烟缭绕，一派严肃、神秘的气氛。又有红灯张挂，分外中内三层，外层三盏，中层八盏，内层二十一盏，“三八二十一”，以示“洪”字之意。

仪式开始前，众人鱼贯进入山堂，按照步位依次排列，新官人排在下首。接着，众人依次洗手净面，称为“开光”。仪式开始，首先由“红旗”升表向空中“请圣”，转向圣前“安位”，就香炉插香，再向圣前“开光”，又示“法规”。各事完毕，即请大哥登山，而众人就位行礼相迎。

大哥登山时，行礼参圣，列于山堂上首，手持令旗，依次传令，命二人把守禁门，按照新官人名单点名传唤。大哥传唤新官人时，新官人须立即回答“有”或“到”，走至禁门前，把守人阻止，问答如下：（问）你来做甚么？（答）投奔梁山。（问）投奔梁山做甚么？（答）结仁结义。（问）人家劝你来的，还是你愿意来的？（答）自己愿意来。（问）有咒无咒？（答）有咒。至此，把守人才说：“有咒请进。”

新官人走入禁门，向圣位行三叩首礼。执事人点红香一枝，交与双手捧持，跪在圣位前，照制定誓词宣誓。继将手中之香，用刀一斩两段，以为明誓。执事人云“红香一断，人头落地”，并云“三级连升”，众人应云“连升三级”。新官人再行三叩首礼，仍不起立，由大哥加封步位，新官人再行三叩首礼，以向大哥谢恩，起立转身向全堂哥弟行一鞠躬礼，依次列于山堂上首下边。上香完毕，大哥传令，各执事交令归班，众人为大哥道喜，大哥遂退出山堂。最后由“红旗”焚化圣位为“送圣”，又以黄表点烧“扫方”，各人随“红旗”应答，并云“扫方已毕”，开山仪式至此结束。

2. “规律”

洪门“规律”包括立誓、规则、家法三个部分，是一部极为严密的帮规帮法。

参加洪门，首先要当众发誓，计有三十六誓，主要包括忠勇孝悌、礼义廉耻、精诚团结、互信互助、严守秘密、振兴中华等内容，如违背誓言，即遭五雷诛灭或死在万刀之下。

人帮之后，要遵守规则。规则共有七个方面，即二十一则、十禁、十刑、十八章律书、十条、十款、议戒十条，其中十条十款是红帮的主要帮规。

十条是：尽忠保国，孝顺父母，长幼有序，和睦乡邻，为人正直，讲仁讲义，叔嫂相敬，兄仁

弟义，遵守香规，互信互助。

十款是：不准奸淫霸道，不准调戏妹嫂，不准指红当炮，不准越边拐逃，不准口角风暴，不准泄漏机密，不准越礼反教，不准以大压小，不准开花斗霸，不准引马上槽。

如果违犯规则，就要受到家法的处置。所谓家法，即刑法。洪门的刑法，简单而严厉，共分五种。第一种为极刑，即凌迟或刀杀；第二种为重刑，即挖坑活埋或沉水溺毙；第三种为轻刑，即三刀六眼或四十红棍；第四种为降刑，即降级或挂铁牌；第五种为黜刑，即抓去光棍或降入生堂，永不复用。

洪门执法，往往在夜间举行，仪式异常严肃、阴森。如处轻刑时，受刑者先铺上红毡，袒露上身立于红毡中间，不能怯死，这叫“做得就受得”。执法者在受刑者的胸部刺三刀，要穿透，故叫三刀六眼。待受刑者死后，用红毡裹尸掩埋，并立碑记，叫做人死仇散，不失礼节义气。

3. “切口”

乾隆年间，洪门的切口，只是传授洪二和尚所创的“三指诀”和“洪”字暗号，即“相约见人伸手指，并有洪字暗号，口称五点二十一，便是同教之人”。但是，到了嘉庆、道光年间，由于清政府对洪门的严厉镇压，同时又由于洪门势力的广泛蔓延，洪门的切口也就随之变得更加严密复杂，形成了包括隐语、暗号、盘问对答、挂招牌为内

容的一整套洪门专门用语与招式。下面分别略述一二。

先说隐语，洪门将行礼叫“拉拐子”，说话叫“阐条子”，书信叫“锦囊子”，名片叫“荷叶子”，有口才称“钳子快”，肚腹好称“瓶子满”。外人叫“外马子”，女人叫“阴马子”，骂人称“开花”，打人称“斗霸”，风叫“八面子”，雨叫“摆子”，雷叫“震天子”，雪叫“花球子”，闪电叫“光光子”，星斗叫“亮光子”；帽子称“顶官子”，鞋子称“踢土子”，长衫称“大蓬子”，马褂叫“蝴蝶子”；饮茶叫“收青子”，饮酒叫“收玉子”，吃饭叫“收份子”，吸烟叫“收炮子”；头称“帅拂子”，发称“青丝子”，脸称“扇面子”，眼称“玲珑子”，鼻称“气筒子”，口称“樱桃子”，耳称“顺风子”，舌称“口条子”，齿称“才条子”，手称“鸡爪子”，心称“定盘子”；肚称“罗汉子”，腿称“金刚子”，脚称“踢头子”，大刀叫“大片子”，手枪叫“喷筒子”，出枪叫“出窠”，开枪叫“张口”；枪劫财物称“打启发”、“看财喜”，招了口供称“拉稀”，报仇称“拿梁子”，内部处死称“毛了”，打死人称“丢翻”，联系码头称“拿上服”，宣传和通知事情称“打响片”。此外，连地名姓氏也有隐语，如上海叫“龙海川子”，南京叫“宝贝川子”，武昌叫“破土川子”，通州叫“交河川子”；金姓称“围河里”，李姓称“紫河里”，周姓称“沙河里”，张姓称“湾弓里”等等。

不仅如此，洪门还创造了许多隐字，凡被认为有重要意义的字，或缺笔、或增笔，或联字，或代号，使外人看到也不明底细，如天地会写作“靛靛男”；清写作“涓”，以示清无主；青字作“靛”，避用清以示清气；一片丹心写作“网”，以示对会对兄弟的忠诚；天写作三十六，地写作七十二，会写作一百八，取义《水浒传》的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一百零八条好汉，如此等等。

再说暗号，洪门的暗号包括手势和茶碗阵。洪门的手势如行礼、倒茶、取物、告急、求援等，均自成一体，比隐语隐字的效用还大，因它不用书写，不用发声，一举手得来的反应，便可观察出众人中谁是自家兄弟，立刻获得情谊和帮助。茶碗阵，以茶壶、茶杯（杯数不等）的摆势及盛茶盛水的盈虚为暗号，运用与手势相似，但必须在茶楼酒肆或具有这种条件的场所才能行使。洪门兄弟大多是文盲和半文盲，更有赖于手势和茶碗阵来沟通关系，因此暗号是洪门兄弟闯江湖的基本技能，有了它，便可以走州过府，四海为家。下面以茶碗阵为例，略作介绍。

单鞭阵（求援助）：布阵——以茶满杯，将壶嘴对杯；破阵——如能援助，即饮杯中之茶，如不能，即倒去杯中之茶，再倒饮之。

斗争阵：布阵——以茶壶嘴，对平列三满杯，以示斗争；破阵——如不应请，即取当中一杯饮之，如应请，即取三杯饮之。

反清阵：布阵——以左边前后分置两空杯，右边亦分置两空杯，当中置一满杯；破阵——任取一空杯，倒茶饮之。

再说盘问对答。洪门的盘问对答，与青帮一样，是洪门中人相互考查的一种方式，多是一些顺口溜式的诗歌，虽不太有感人的艺术魅力，其中还有不少是“鄙俚粗俗”的滥调，但它应用性强，并或多或少地反映了洪门这种下层社会组织所含蓄的民间色彩和乡土风情。兹举三例，以观其豹。

清袍褂（盘问）问答

问：请问阁下有站无站？

答：有站。

问：请问阁下站东站西？

答：站西（西北老人堂口）。

问：请问阁下水旱二字站哪个字？

答：站水字（因当初关帝水擒庞德）。

问：请问阁下站文站武？

答：站武。

问：请问阁下玄斗二字站哪个字？

答：站玄字。

问：请问阁下金木水火土五字站哪个字？

答：站金字。

问：请问阁下威德福自萱松柏一枝喜十个字站哪个？

答：站威字。

问：请问阁下孝弟忠信礼义廉耻八个字站哪个字？

答：站（按照自己步位）某字。

问：请问阁下有爱无爱？

答：承蒙你老哥的雅爱。

文凭问答

问：请问你老哥哪里去？

答：往木杨城内去。

问：可有公文牌票？

答：有。

问：在哪里？

答：左手为票，右手为牌，合掌为印，心为凭，口为号令。

问：有何为证？

答：有诗为证。

问：有何诗为证？

答：五祖赐我天下同，文凭藏在我心中，位台若问根源事，三八二十一共一宗。

盘底问答

问：请问阁下在何处发烛？在哪座名山得道？
拜兄头上何人？

答：兄弟在昆仑山发烛，罗浮山得道，洪始祖相传，老拜兄二人。

问：何谓插柳上山，上山插柳？

答：一步一登，步步超群，是插柳上山；一步登天，连升三级，是上山插柳。

问：何谓“指日”与“红日”？

答：“指日”是东升之日，“红日”是西坠之日，又日出为东，日落为西。

最后说挂招牌。所谓挂招牌，即洪门中人外在的衣着、钮扣、发辫等方面，均有特殊的形式，使自家兄弟一见，不用盘问，便能知晓。如在外面跑码头，将带扣在行李上，各种身分的人如大哥、老五、老么的扣法都不同。另外，自老九起，至老大止，那带子下垂的度数依次增高，使洪门中人一见，不但能知是兄弟，并可辨明身分的大小了。若是不扣式样，就带上打结为记。如老大一结，老二两结，老三三结，以下类推。若是没有带子，可用手巾代替，若连手巾也没有，可将辫线打结代用。其法盘辫于头，将辫须垂在左耳之旁，与耳根相齐。老大将须之一缕打一结，老二将须之一缕打二结，以下类推。从发辫的结数上，便可分出他们在洪门内的阶级高低。

4. “海底”

“海底”，原称“宝簿”，也称“金不换”，是洪门内部的秘密典籍，被洪门视为开山立堂，号召与发展帮众的依

据。

“海底”的名目和版本虽然很多，但其内容不外史略、名称、组织、规律、开山立堂、盘道、应酬拜谒、刑法、隐语暗号等方面。常见的“海底”有《海底》、《金不换》、《改良真本江湖海底》、《洪门会概说》、《洪门常识问答》、《洪门志》等，均为抄本或内部印刷品，可以视为了解洪门历史的重要资料。

（三） 洪门在辛亥革命时期的辉煌业绩

辛亥革命时期，是洪门最辉煌的时期。在这一时期里，洪门力量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谱写了一曲可歌可泣的英雄乐章。

洪门在辛亥革命时期的业绩，几乎是与孙中山的革命活动同步的。光绪二十年（1894年），孙中山在檀香山建立了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东南沿海地区的洪门兄弟即在兴中会的策动下，举行了广州起义，以反抗清政府与日本签定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这次起义虽然失败了，但洪门从此开始由旧式的反抗斗争转入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并且成为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重要依靠力量。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东南沿海地区的洪门兄弟又参加了兴中会策动的惠州起义。起义于是年十月在三洲田爆发，出而攻击新安、深圳的清军，夺取许多军械。随即转战于龙岗、淡水、永湖、梁化、白芒花、三多祝等地，屡次击败清军。由于日本阴谋分子的破坏，致使义军的援助

落空，连战月余，弹药已尽，起义又告失败。

光绪三十年（1904年），孙中山在檀香山加入洪门，受封为“洪棍”（即元帅，为洪门首领），被尊称为大哥。从此，各地洪门兄弟纷纷加入兴中会，追随孙中山为推翻清王朝而英勇战斗。

与此同时，其他地区的洪门兄弟也不时举行起义，以反对清王朝的黑暗统治。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太平军余党侯成带率领广西天地会举行武装起义，先后攻入梧州、郁林、容县、兴业、陆川、博白等地，并在梧州打败清军，歼灭清军一千五百余人。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广西天地会又发动起义。光绪三十年（1904年），起义势力控制了庆远、南宁、梧州、思恩、柳州、潯州等府的广大地区，全省响应，使清朝统治陷入所谓“防剿俱穷”的境地。这次起义坚持了三年之久，使人心大为振奋，参加起义的天地会群众后来都成为同盟会屡次发动西南边境起义的骨干力量。

除广西天地会起义之外，在光绪三十年（1904年）一年里，河南、贵州、安徽、江西、浙江等省，均爆发了洪门起义。这些起义与兴中会策动的武装暴动遥相呼应，标志着洪门大展宏图的时机已经来临。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同盟会宣告成立。在这个全国性的统一革命组织的组织和领导下，各地洪门的反抗斗争走上了一个新的阶段，开始了为最后埋葬清王朝而血洒沙场，建立功勋的战斗历程。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秋，同盟会员刘道一、蔡绍南自日本回国，在湖南醴陵、浏阳一带宣传革命，准备起

义。当地洪门首领李经其、龚春台、肖克昌等积极响应，定于翌年年初举行武装起义。但事为浏阳县知县所闻，派兵搜捕，李经其被追溺水死难。革命党人以事机泄露，仓促提前起事。龚春台驻浏阳，发布檄文，称“中华民国军南军革命先锋队都督”，浏阳洪门及醴陵防军群起举义，头缠白布，手执白旗，悉称革命军。革命军陆续占领浏阳之麻石、文家市、金刚头，萍乡之上栗市、桐木和宜春之慈化等地，众至数万人，安源矿工闻风响应，络绎不绝地投向革命军，长江中下游同时震动。革命武装起义爆发后，清政府大为恐慌，急令两江总督端方、湖广总督张之洞及湖南巡抚岑春蓂会合各省清军向革命军进攻。萍、醴一带革命军与清军苦战月余，刘道一、肖克昌和蔡绍南等先后牺牲，清统治者屠杀萍、醴一带人民万余名，把革命起义残酷镇压下去。

但是，清政府的屠刀没有吓倒革命党人和洪门弟兄。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同盟会又在两广地区先后发动了“黄岗起义”、“惠州七女湖起义”、“防城起义”及“镇南关起义”。在四次起义中，洪门兄弟与清军浴血奋战，表现出顽强的战斗精神。同年，浙江的洪门兄弟还积极参加了徐锡麟、秋瑾发动的武装起义，四川的洪门兄弟对黄复生、谢伟颢的起义之举，也给予支持与配合。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在同盟会发动的“钦廉上思起义”、“云南河口起义”与光复会发动的“安庆熊成基起义”中，云南与安徽两地的洪门兄弟均是基于力量，表现出极大的革命热情。

这些起义虽然都失败了，但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仍然不屈不挠，继续联络和策动洪门举行起

义。宣统二年（1910年）二月，同盟会发动了“广州新军起义”。失败后，又于宣统三年（1911年）四月发动了“黄花岗起义”。特别是在“黄花岗起义”中，洪门兄弟表现出的舍身救国和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惊天地，泣鬼神。这次起义，总计牺牲八十余人，后经收殓尸骸七十二具葬于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大多是洪门中人，他们英勇斗争、壮烈牺牲的事迹，震动了全国，推动了全国革命的发展，鼓舞了中国人民的革命精神，成为全国革命爆发的前奏。

宣统三年（1911年）四月，清政府颁布了一条“铁道国有”政策，假借“国有”为名，将川、汉、粤汉铁路出卖给英、美、德、法四国，因而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反抗。湖南、湖北、广东、四川等省人民先后起来进行保路斗争，其中四川的保路运动最为激烈。在这场斗争中，四川哥老会与革命党人都乘机积极筹备起义。七月，川督赵尔丰下令枪杀请愿人民数十人，造成了骇人听闻的成都大惨案，成为哥老会与革命党人发动起义的导火线。哥老会首领秦载赓、侯宝斋各率华阳、新津洪门兄弟，星夜驰抵成都附近。革命党人龙鸣剑、王天杰亦起兵荣县，突入资州，向成都进攻。七月十六日，起义各军发动了对成都的围攻。嗣因成都清军抵死守御，双方相持不下，于是各路起义军决定暂时撤围，转战全川各地。侯宝斋所率洪门兄弟陆续攻占双流、新津、邛州等地；王天杰在荣县宣告独立，建立了革命政府；秦载赓所率洪门兄弟则占领资阳、井研、威远等地。不久，由湖北调入四川的新军在资州杀死端方，举行反正。接着，同盟会员吴玉章在内江宣布起义。于是，一场革命风暴席卷了巴山蜀水。

在这场革命风暴中，哥老会与革命党人积极配合，充当了中坚力量，“众兄弟振臂一呼，四方响应”，使这场革命风暴犹如风驰电掣，穿过三峡，推动了武昌起义的爆发。

宣统三年八月十九日（1911年10月10日）晚，武昌起义爆发，敲响了清王朝的丧钟。各地洪门闻风纷纷响应，首先是湖北鄂北襄樊一带的江湖会立即起义响应，接着湖南首先独立，“各属哥弟会党，风起云涌”，革命团体共进会首领焦达峰任都督之后，湖南更成了“洪家天下”，随之陕西独立，“所有要位都在不识字的哥老会人手上”，“财政和兵权都在哥老会手中”，陕西也成为“会党世界”。其他省市如山西、云南、江西、上海、贵州、江苏、浙江、广西、安徽、福建、广东、四川等，也大多是由洪门首先发难而直接推动了当地的光复独立。于是，统治了中国二百六十多年的腐朽清王朝，便在这一迅速发展起来的革命形势面前土崩瓦解了。

1912年元旦，孙中山在南京宣告中华民国成立，标志着清王朝的灭亡，从此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在中国历史上树起了一座名垂千古的丰碑。在这座丰碑上，也镌刻着洪门的功绩，它将永远受到中国人民的钦敬与纪念。

（四） 洪门的堕落

早在辛亥革命时期，洪门本身固有的落后性与消极作用就已露端倪，诸如飞扬跋扈、聚赌斗殴等破坏社会秩序之事时有发生。不过，当时洪门的斗争目标比较明确，又有革命党的领导，这些不法行为与其英雄业绩相比，仍属

末节。

民国建立以后，洪门自认为清朝已被推翻，可以居功自傲，随心所欲了。在这种形势下，洪门这个从封建社会土壤中成长起来的民间结社，由于其本身的历史局限性，决定了它在失去了明确的斗争目标后，不可能走上一条崭新的道路，必然要走到它的反面，用其固有的破坏本性去报复整个社会，以发泄其对钱财权力的贪欲和对一切新生力量的仇视。

民国初年，新旧势力斗争激烈，社会动乱不安，洪门乘机兴风作浪，又给社会造成新的灾难。在浙江杭属武康、钱塘一带，当地洪门时常聚众数千人，分路出发，白昼肆劫。在湖南各县也“时闻抢劫，不曰土匪为害，即曰会匪以谋”。贵州也是洪门横行，掳掠奸淫，波及全省。广东洪门强迫人民入会，惨杀掠夺，时有所闻。这些地方的洪门，已不异于明火执仗的土匪。在四川与苏、浙、皖地区，当地洪门甚至“假立前清旗号”，掀起一股股复辟逆流。曾在清末率领人民反洋教而闻名的四川哥老会首领余栋臣，啸聚党徒数千，自称“忠勇将军”，倡扫新政，恢复清朝言论，禁剪发，免厘税，跨州连乡，煽动连合，且勒派军资，搜括军火，数县骚动。江苏的“九龙山会”，以南京城西二十八里八百桥附近的西羊山和城外六十里的竹镇集为据点，上联衙厅差警，下至一般无赖匪徒，声势浩大，党羽千人，白日结队横行。他们还在上海、安庆、大通等地设立机关，暗中进行活动，宣称所奉山主为“王儒同大佛”，预备闹事。安徽的“大把子香会”，其宗旨全为图谋不轨，反对共和。该会头目刻有伪印，上书“黑龙山大皇帝等字样”。“海龙

会”据点设在芜湖，活动于芜湖至上海的长江沿线。他们声称“现在民国是我们建造成功的，到如今我们都无事可做，非推翻民国不可”。这些地方的洪门已完全丧失了民国前的革命风貌，变成旧势力疯狂反对共和，企图恢复帝制的帮凶。

民国初年，洪门紧步青帮后尘，大量涌入近代都市。由于洪门已经堕落，因此很容易与城市中的地痞流氓融为一体。他们与青帮竞相作恶，大凡承运鸦片、包揽赌场、争霸码头、贩卖人口、杀人越货等无所不为。许多洪门分子从中攫取了大量不义之财，整日沉湎于烟赌嫖饮之中，成为罪恶深重的黑帮分子。

洪门的罪恶行径，为社会所诟病，被人民所唾骂，但却博得军阀的青睐，纷纷援为己用。四川、贵州、陕西等地军阀都拉拢过洪门队伍，用来加强自己的势力。

抗战时期，活跃在沦陷区的洪门分子大多投靠日本帝国主义的怀抱，不少洪门分子当上了汪伪政权的特务。马啸天、苏成德等洪门头子更在南京成立了“乾坤正义山”，以培植爪牙，发展势力，为日寇侵华效劳。上海洪门头子李炳清、白玉山等人拼凑“中华洪门联合会筹委会”，企图拉拢各地洪门，共同充当日寇走卒。

抗战胜利后，曾经附逆的洪门分子，当然站不住了，而从内地前来接收失地的洪门分子则大有人在。他们大开山堂，广收弟兄，仅以南京为例，就有蔡良弼开的“真武山”、汤成道开的“天蜀山”、蒋锄欧开的“丽华山乡”，特别是从四川来宁的专业洪门山主张树声开的“长白山”，声势颇著。1949年后，洪门中罪大恶极的分子被镇压，各地

洪门组织均自行瓦解。

当然，民国以后的洪门中，也不乏坚持革命与保持民族气节者，如既为洪门又是青帮的徐朗西，在1916年春陈其美遇难后，曾发誓：“吾惟愿继公之志，而慰公之忠魂”，表示追随孙中山致力国民革命。又如1923年洪门领袖向松坡至沪后，召集旧人创立“五圣山”，对抗北洋军阀。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向松坡又利用“五圣山”组织上海市民义勇军，投身民族斗争。再如，1935年崔锡麟等在上海创立“五行山”，“取意用金木水火土的物质力量来消灭日寇，收复东北”。上海“八·一三”抗战期间，该山堂策动洪门中人进行抗日活动等。但是，正如洪门在辛亥革命时期的不法行为与其英雄业绩相比，只属末节一样，民国以后洪门中的这些革命行为与其罪恶活动相比，恰恰颠倒过来，也属末节，改变不了人们对它的恶劣印象。

（五） 海外洪门

18世纪中叶洪门建立不久，即开始向海外传播。其足迹遍及东南亚、北美、英国及日本等地，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终于形成一支强大的海外洪门势力。

与国内洪门一样，海外洪门从其建立伊始首先就是一个华侨、华人的互济互助团体。清中叶以来，东南沿海一带的破产劳动者，不堪清朝统治者的剥削与压迫，纷纷飘洋过海，到异国他乡谋生。他们乍到异域，人地生疏，不仅衣食无着，而且经常受到殖民主义者和种族主义者的排挤、欺凌甚至屠杀。在这种情况下，海外洪门就承担了保

护华侨、华人生命安全和提供衣食住行与介绍职业的责任，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生存自卫组织，因而深受华侨、华人的拥戴，争先加入当地洪门，促使当地洪门迅速发展壮大。

海外洪门脱离了国内封建统治者的束缚，得以充分发挥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与改造自然的聪明才智，为侨居地和移殖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受到当地人民与政府的拥护和尊重。

在反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斗争中，海外洪门常常是首当其冲，谱写了一曲曲令人振奋的凯歌。1777年，印度尼西亚洪门首领罗芳伯，以天地会的名义，自称大哥，建立起有自己行政管理系统和武装力量的“兰芳公司”，又称“兰芳大总制”。这个既是经济组织又是政治实体的“公司”，同荷兰殖民主义者的武装力量展开了长达一百零八年的殊死斗争，延缓了殖民主义者对整个东印度群岛统治地位的建立。1896年，菲律宾三合会领袖侯亚保率领洪门兄弟参加阿圭那多将军领导的反对西班牙殖民主义的独立战争，屡建战功。1899年，侯亚保被任命为革命军南线副司令。独立战争结束后，侯亚保又被任命为国会议员和退伍军人协会负责人。侯亚保逝世时，菲律宾政府为缅怀他所建殊勋，特举行国葬。抗日战争时期，菲律宾洪门建立“华侨抗日锄奸义勇军”，与当地人民并肩作战，并配合盟军参加解放首都马尼拉的“王城战役”，协助美军第十一空运师扫除南吕宋残敌，均取得战果，受到美军统帅史迪威将军的称赞。

海外洪门在为自身生存斗争的同时，也为当地的经济的发展立下了杰出功劳。在开发西加里曼丹、吉隆坡和美国

西部、加拿大南部等地的过程中，都留下了洪门兄弟的血汗。美国境内有四分之一的洪门兄弟参加了太平洋铁路的建设，1870年洪门兄弟占美国加州近百分之三十的劳力，1872年洪门兄弟生产的蔬菜占加州蔬菜总产量的三分之二；整个70年代和80年代加州的花生大部分是由洪门兄弟生产；整整四十年之久洪门兄弟成为加州果树园的主要依靠；整个80年代洪门兄弟占加州葡萄园工人总数的百分之八十至八十五，1900年加州的葡萄酒产量占全美的百分之八十，著名的“丙樱桃”和“柳澄”都是洪门兄弟培育的；1879年洪门兄弟占加州捕虾业劳力的百分之五十，1880年洪门兄弟占加州捕鱼业劳力的一半。后来为美国创造巨大财富的加州农产品和渔业，可以说是洪门兄弟在当时奠定的基础。加拿大的情况也大致如此。洪门兄弟对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和南部经济的发展也作出了巨大贡献。为表彰洪门的功劳，加拿大政府把加拿大洪门的发祥地百驾委路致公堂（1863年建），列为该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为建造铁路的洪门兄弟立碑记功。

此外，海外洪门还为各地、各国的多元文化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它们创办的报纸杂志、学校和书社，在介绍中华文化中，备受各方赞扬。广泛流传于东南亚和南北美洲的中国武术，多是洪门兄弟传播出来的，其中最为著名的是“洪拳”和“五祖拳”。新加坡的“玉明研究社”，马来西亚的“徐金栋健身院”，印度尼西亚的“庐国定国术馆”，菲律宾的“光汉国术馆”、“光华国术馆”、“明谦国术馆”，均为“五祖拳”的衍流。

海外洪门虽然远离祖国，但时刻关心着祖国的命运，始

终保持着海外赤子的爱国传统。

早期来到异国的洪门兄弟，仍信守洪门“反清复明”的宗旨，甚至不远万里，冲破艰难险阻，潜回祖国发动反对清朝的武装起义。1850年，从新加坡回到闽南的陈庆真等人，在厦门旗杆脚五祖庙内建“小刀会”，起义失败后，转到海澄、同安两县交界处，重建“小刀会”。不久“小刀会”组织遍及闽南各县。清政府严令闽浙总督查办，1851年1月1日，陈庆真不幸被捕，次日遇害于厦门。1853年，闽南“小刀会”在黄德美、黄位的领导下在海澄再次起义，转战闽南多数府县并攻占厦门。起义军击溃了闽南的清军水师，并建立政权达半年之久。

1899年，澳大利亚洪门首领谢纘泰在香港结识洪秀全侄子瑛王洪金福，决定召集海内外洪门兄弟在广州发动起义，准备成立“大明顺天国”，“行欧洲君民共主的政体”，“由人民公举贤能为总统”。后因广州陶德洋行告密，起义尚未发动，即告流产。

由于海外洪门始终奉行“反清复明”的宗旨，因此当孙中山先生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战斗口号时，就立即得到海外洪门的广泛响应和支持。许多海外洪门兄弟积极回国参加起义，不少洪门兄弟为建立中华民国英勇捐躯。

在民族危亡关头，海外洪门更表现出极大的爱国热忱。抗日战争期间，马来西亚“致公堂”领袖宫文森独资创建“文森队”回国参战，成为广东东江人民抗日游击队的一部分。菲律宾的洪门组织动员大批青少年回国参加抗日武装，美国、加拿大等地的“致公堂”成员也纷纷回国参加抗日

救国活动。

海外洪门除了直接派人参加国内革命与救亡活动外，更大量的爱国行动，则是慷慨解囊，资助革命及通过新闻、报刊声援国内的正义斗争。

辛亥革命时期，美国和加拿大的“致公堂”专门建立了“洪门筹饷局”。加拿大“致公堂”还发生多起变卖“致公堂”会所支援革命的感人事迹。在“致公堂”的带动下，许多侨商也都自动汇款支援国内革命。如加拿大洪门为支援黄花岗起义，筹饷达七万元以上，占全体华侨捐款首位。对此，革命党人黄兴等曾给予高度赞扬，表示“不胜感服”，认为“热度之高为海外所未有”。

1925年10月，美洲和香港、澳门的洪门代表，在美国旧金山举行洪门恳亲大会，决议以洪门致公堂为基础，组织华侨政党——中国致公党。该党成立后，继承洪门传统，仍以各种形式支援祖国的正义斗争。抗日战争时期，以司徒美德先生为代表的致公党领袖，重建“洪门筹饷局”，改名“华侨筹饷总会”，募集捐款五千四百多万元，并和当地华侨一起认购数以亿计的爱国抗日公债，捐赠许多飞机、坦克、救护车和大批衣物。

与此同时，海外洪门充分利用自己掌握的舆论阵地，在革命重大关头和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挺身而出，或口诛笔伐，或伸张正义。辛亥革命时；檀香山洪门机关报《檀山新报》刊登孙中山先生亲自撰写的《敬告同乡书》和《驳保皇报》两篇文章，批驳保皇派的谬论，指出革命与保皇“理不相容，势不两立”。要求海外华侨“划清界线，不使混淆”。加拿大致公堂机关报《大汉报》与当地保皇派机关

报《日新报》论战，“彼此驳论二百余续，为海外两党最持久之文战”。如此等等。此外，海外洪门一直关心祖国的建设，不断派人回国，或访亲拜友，探根寻源，或洽谈生意，投资设厂。

海外洪门之所以能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进步，主要因为海外洪门不是国内洪门的简单横移，而是海外新环境和新条件下的产物，它不仅同国内封建势力及其他反动势力的联系较少，而且没有直接卷入国内的政治斗争之中，它所受到的影响，主要来自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与资本主义的经济生活，因此它的历史命运则与国内洪门截然相反，仍然有着生气勃勃的向上力，继续为侨民地、移殖国的繁荣发挥自己的作用，为祖国的富强和世界和平作出新的建树。

勿庸讳言，海外洪门毕竟源于国内，移植国外后，不免带去一些封建主义的消极东西，如开山堂的神秘性和人身依附关系等，加之山堂林立，派系繁多，彼此之间经常发生摩擦与争斗。又如在早期的猪仔贸易中，有些洪门中的败类充当殖民主义的帮凶。再如有些堂口的头子利用所掌握的财力、人力开设赌场、烟馆、妓寮，还有些人对华侨小商小贩进行勒索等等。这些都在当地人民和华侨中留下了不好的印记。但这些丑行劣事与其对所在国家及祖国的贡献相比，只不过是小小的支流而已。

结 束 语

写到这里，是否已将这种传统文化的产生、发展及其蜕变过程说清，期待人们评论。但至少有一点是可以从小书中看出，作为一种传统文化，民间宗教与结社曾寄托了封建社会广大民众的宗教情感和要求现实解救的美好愿望，也曾激励以农民为主体的人民群众的反封建反帝斗争，为中国历史写下了灿烂篇章；进入近代社会以后，面对世界进步潮流大势，民间宗教与结社却仍固守愚昧落后的思想阵地，迅速变成一种有害于社会的传统文化，又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累累劣迹。

然而，这决非笔者撰写这本小书的最终目的。笔者试图通过这本小书，既为人们献上一把正确认识民间宗教与结社的钥匙，也向人们说明尽管历史不会倒退，但固旧和囿于积习却是一种最可怕的力量。据笔者亲自调查及所接触的资料，在当代中国的华北、东北、华中、华南、西北、西南及台湾等广大地区，民间宗教与结社活动还较活跃。如龙华会、天地门、混元门、还乡道、大佛教、大乘教、梅花拳、普渡道、魔公道、真空道等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白莲教变体，如今又以民间音乐、民间花会的形式，气功、体育的形式，在民间仍有活动。而青帮的变种台湾竹联帮因杀害著名作家江南，使人们感到它的淫威犹在。台湾红帮则以“中华民国事业建设促进会”的社团形式获准公开亮

相，并打算将“扮演更开放、更积极的角色”。香港黑社会也向大陆某些临界区域渗透发展组织。大陆内地的青红帮，虽没有敢像在台湾、香港那样公开活动，但秘密从事帮派活动，破坏社会秩序之事也时有所闻。这些事实充分证明了这样一个道理：作为一种对中国人影响极深的民间宗教与结社，是传统文化中最顽固最落后的营垒；攻破这个营垒，清理这种文化，不是一蹴而就之事，需要人们付出巨大的代价。唯有此，方能使人们在精神上获得一个全新的世界，向人类憧憬的锦绣前程迈进。